



## 目 录

### 专 论

- 3 冯绍雷 / “王车易位”后的俄罗斯走向及其构想中的对外战略

### 苏联解体：中国学者笔谈

- 14 盛世良 / 亲历苏联解体  
18 左凤荣 / 退出冷战：戈尔巴乔夫的主动选择  
21 余伟民 / 苏联解体的制度因素与行为因素

### 苏联解体：原因篇

- 25 E·普里马科夫 / 苏联为什么会终结？  
40 C·卡拉-穆尔扎 / 苏维埃制度崩溃的原因之初步分析  
59 Д·谢泽 / 从勃列日涅夫的“干部锻炼”到戈尔巴乔夫的“迭次更换”——苏联1985-1989年间罗名制的动荡不稳

### 苏联解体：影响篇

- 90 徐坡岭 韩爽 / 中东欧独联体政治经济转型20年：约束条件与转型政策、策略选择  
105 庞大鹏 /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国民心态  
118 郑润宇 / 从俄罗斯全球战略视角剖析俄哈关系模式  
133 胡 彦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刘 军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23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1 年第 5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 **Фэн Шаолэй**

Курс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и её внешняя стратегия после «рокировки»..... (3)

### **Шэн Шилян**

Свидетель развала СССР ..... (14)

### **Цзо Фэнжун**

Выход из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активный выбор Горбачёва.....(18)

### **Юй Вэймин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и поведен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развала СССР..... (21)

### **Е. Примаков**

Почему скончался СССР?..... (25)

### **С.Г. Кара-Мурза**

Причины крах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троя: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 (40)

### **Д. Сельцер**

От «Кадровой Закалки» Л.И.Брежнева К «Кадровой Чехарде» М.С.Горбачева:  
Дестабилизаци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СССР (1985-1989) ..... (59)

### **Сюй Полин, Хань Шуан**

20 ле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и СНГ: условия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и выбор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и стратегии ..... (90)

### **Пан Дапэн**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енталитет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 (105)

### **Чжэн Жуньюй**

Анализ модел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118)

# 俄羅斯研究

2011 年第 5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 *Feng Shaolei*

Russia's Trend and Its Foreign Policy in Concept after Castling ..... (3)

### *Sheng Shiliang*

Living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14)

### *Zuo Fengrong*

Retreat from Cold War: Gorbachev's Initiative Choice ..... (18)

### *Yu Weimin*

System Factor and Behavior Factor of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21)

### *Y.Primakov*

Why the Soviet Union Ended?..... (25)

### *C.Kapa-Myrsa*

Causes of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Primary analysis..... (40)

### *D.Seltser*

From Brezhnev's "Cadre Training" to Gorbachev's "Cadre Replacement" --- Unstable "Nomenklatura System" from 1985 to 1989 in the Soviet Union ..... (59)

### *Xu Poling, Han Shuang*

20-Ye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 Constrained Conditions and Transition Policy, Strategy Selection..... (90)

### *Pang Dapeng*

National Mentality of Post-Soviet Russia .....(105)

### *Zheng Runyu*

Analysis of Russia-Kazakhstan Security Mode from Russian Global Strategy Perspective..... (118)

专 论

## “王车易位”后的俄罗斯走向 及其构想中的对外战略\*

冯绍雷\*\*

2011年9月底，在梅普合作关系出现关键性转折以后，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活是将面临一个新的局面，还是维持既定格局？俄罗斯的对外布局是将随之发生新的变化，还是延续原有的政策方针？在这一背景之下的中俄关系将会有怎样的新机遇和新问题？这些都是值得加以关注和及时估量的紧迫问题。鉴于当前各项安排尚处于过程之中，众说纷纭，笔者尽量选择若干关键信息，并依靠近年来多次的实地访问，写就此文，以求教于国内外同行。

### 一、对于梅普政治的基本判断

在梅德韦杰夫于2011年9月24日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名普京作为2012年总统候选人、以及普京表示一旦当选将提名梅德韦杰夫担任新内阁总理的信息公布之后，一项人们讨论和争论多时的政治安排终于尘埃落定。今后至少6年、甚至12年的时间里，如果俄罗斯各项内政外交处置得当的话，有可能在一个政治强人的统率之下，朝向完善国家构建和社会经济稳定的复兴之路推进。从时间保障来看，按照修改后的俄罗斯宪法，原来四年一届的总统任期，已改为六年一任，并规定可以连任两届。

由普京担任统一俄罗斯党总统候选人的角色，并不太出人意料。首先，这一段时间以来，普京不仅以其持续领先的民意支持率表明了在俄罗斯的人气之旺，而且也以其历练多年的成熟经验和施政风格，实际上主导和带领着俄罗斯抵御了国际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谱系”（项目编号：11JJDGJW003）的阶段性成果。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金融危机对于俄罗斯的冲击。在国际舞台上，普京依然是最受国际舆论瞩目的俄罗斯政治家。从此前四年的情况来看，与梅德韦杰夫相比，普京的政治理念重点在于推动俄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延续较长时间的稳定。从普京最终能够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这一点来看，其政治理念看来是获得了多数的赞同，虽然梅德韦杰夫以及他更多主张的发展自由和民主、进一步深化政治改革、包括调整与西方关系的政治立场，也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特别是在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中间。但相比之下，对于普京政治理念的支持，在俄罗斯还是占据优势。实际上，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位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分别代表了俄社会历史发展中互相补充、互相支撑的紧密关联的两个方面。只不过普京所主张的“发展、稳定和安全”较之梅德韦杰夫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和进一步的改革”，有更广泛一些的民意支持。

## 二、梅普“矛盾”有被夸大的可能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之间的最新政治安排，表明了这两位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像此前大量媒体所渲染的那样，两人之间曾展开过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梅普“矛盾”有被夸大的可能。大体上，对于2008年以来的梅普合作曾经有过这样三种类型的判断。

第一种判断，认为梅普之间在政治思想立场和政策方向上存在着根本分歧，“双头马”（tandem）政治将由梅德韦杰夫在2012年继续担任总统一职而告一段落。根据目前出现的政治结果，可以基本上排除“梅普政治歧见无法调和”这样的判断。9月24日，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两人的正式讲话，表明了当前宣布的关于由普京担任总统候选人的安排乃是几年之前他们两人之间的商定。而且此项安排确定之后，梅德韦杰夫坚定地表示将接受这一安排，确认自己和普京乃是“有20年交情的亲密同志和伙伴，确实不是竞争对手”。<sup>①</sup>可见，梅普两人之间尚可以就最为敏感和核心的政治问题进行直接讨论和交流，并得出意见相仿的结果，而且不违背两人当年的“约定”。

第二种判断，是关于梅普之间是否确实存在过对于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歧见。一般认为，这大体上有两种可能的状况：

其一是，两人之间确实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梅普两人可以通过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私交情谊，或者通过作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沟通，经过协商得出共识。

另外一种情况是，无论梅普两人是否存在政治歧见，他们各自的团队和助手阵

---

<sup>①</sup> Медведев создаст “больш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Утро. 15 октября.2011.

营里的一些人较多地以自己的理解来看待梅普两人之间的关系，不断放大各种有关“分歧”和“竞争”的道听途说。事实上，大概除了梅、普本人，很可能谁都不确切地知道最近三、四年间两位领导人的个人关系的详情。

与此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西方舆论和政治决策层对于梅普关系的高度关注。西方非常愿意看到一个比较接近于自己的立场、比较愿意与西方积极调整关系的政治家来担任俄罗斯总统。在俄罗斯与西方高层的交往中，以及在西方舆论的环境中，这种来自外部的影响不可否认地存在着。这样，俄精英内部的意见对立与外部影响相互强化，非常容易形成一种“高层歧见”的印象。2010年以后，俄国学者多次警告，引起人们不安的“高层歧见”，以及正在出现的决策层思想动荡的状况，确实是一种一度令人担忧的迹象。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安排，不同于梅普两人先前的宣示，即，追随梅普的人士曾一再透露，2012年以后，“梅普合作”将不会延续，梅普两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在对方担任总统的情况下担任政府总理一职。但现在，梅德韦杰夫将被提名担任普京治下的总理一职的安排表明，这是双方顾全大局实行政治妥协的结果——即使是这样，也还是说明两人之间虽有歧见，但完全具有可协调性；另一种解释是，两人完全可以放手实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以推进他们的共同理念。

客观地说，在过去三四年间，梅德韦杰夫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普京理念的思想路线，并没有超越梅普两人同属于自由主义思想阵营这一界限。从两人的表现来看，梅德韦杰夫强调自己属于“民主的自由主义”，而普京则认为自己比较倾向于“保守的自由主义”。普京曾经几次亲口表白，他是“自由主义者”。而2008年以后在“瓦尔代”会议上的一次表白，他也明确地称自己是“保守主义者”。<sup>①</sup>实际上，这只不过表明他是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中比较赞成传统理念的一翼而已。这说明，两人依然同属于一个大的营垒之中。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转型中大国来说，在现有的五花八门的政治谱段中，两位最主要的政治领导人能够保持同属一个营垒，而又以不同的侧重点在相互协调的情况下实施国家治理，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从行事风格来说，普京对于不同政治思潮的接受程度可能要超出我们的想象。多年来，他所从事的内部工作要求注重实际效果、减少意识形态趋向的惯性，也进一步造成了普京的思维定势。在以往的三年多时间里，普京完全可以与一个看似意识形态立场与自己有所不同，而实际是自己老同事、老朋友的国家元首一起工作，今后，他将更加具有这样的心理基础和掌控能力。

第三种判断，从今天的结果再回过头去看以往这三四年的梅普双头政治，有理

---

<sup>①</sup> 2008年9月11日普京在瓦尔代会议上的发言。

由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梅普合作的整个进程乃是出于“理性考虑”的政治安排。

近一年多来，当舆论越是怀疑梅普之间关系将要崩盘，越是预言梅普之间必有一争，甚至表现出对于梅德韦杰夫的同情和支持之时，实际上，越是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来考虑梅普“矛盾”被故意夸大的可能性。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普京在近四年前，在一片劝进声中，在他本人完全有可能轻而易举地通过修宪而延续其总统任期的时候，却坚定地推举梅德韦杰夫继任总统。应该说，他对于梅普两人未来关系的各种可能性是有着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在法律许可和职权范围之内，梅德韦杰夫的独立性和影响力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对于普京来说，这可能反而是显示其政治家气度的机会；特别是在普京本人可能已经不太方便对以往政策作较大改变、而实际上又需要有所改变的情况下，由梅德韦杰夫出面进行调整而以观后效，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安排。同时，既然已经同意让梅德韦杰夫成为一个行事独立的总统，那么普京合乎逻辑的表现就应该是更为放手，无论是内部事务还是对外事务。越是这样的真切表现，越是能够达到两人原本需要的超乎常规的密切配合的目的。

这样的总结并非只是为了简单地评判以往判断的孰是孰非，而是希望对于判断今后俄罗斯的政情发展能有所帮助。事实上，只有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梅普两人之间关系发展的空间和谱段，才能够对未来俄罗斯政局的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 三、普京最终被提名主要是俄罗斯当前局势使然

普京之最终被推举为统一俄罗斯党的总统候选人，从更深层次看，主要是俄罗斯当前所面临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局势使然。

从国内政治走向来看，新世纪以来的俄国政治，基本上是按照对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政治有所调整的方向发展的。虽然依旧维护着多党体制，实行着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制度，但政府的行政权力大大加强了，地方势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寡头财团的代表人物霍多尔科夫斯基（М.Б.Ходорковский）作为一种政治象征，被押上法庭，受到了严厉制裁。尽管有人认为，这种状态属于一种“有弹性的威权主义”，然而，得到统一俄罗斯党和人民统一战线支持，又得到其他若干党派认同的普京本人，的确享有较高的民意支持率。目前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为 68%，梅德韦杰夫为 62%，这是权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最近几个月来维持不变的纪录。<sup>①</sup>

根据 9 月 24-25 日的一项权威民调：什么将是俄罗斯人的最大忧患？高居榜首

---

<sup>①</sup> Левада-центр: рейтинг Медведева снижлся перед съездом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а у Путина был прежним// Газета. 29 Сентября 2011.

的是通胀，53%；其次，住房问题，52%；公共服务水平，52%；低下的生活标准，51%；酗酒，48%；贪污腐败，42%；失业，40%；寡头对俄罗斯国家生活的干预，20%；军工业的状况，19%；经济与环境，18%；人口下降，17%；恐怖主义威胁，17%；提高工资水平，13%；民主和人权，11%。这项在46个地区、138个观察点、对1600人所进行的误差为3.4%的最新民调表明：无论民主和人权问题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但在当下俄罗斯人的心目中，这只是一个他们最不担心的问题。<sup>①</sup>

从经济上来看，目前俄国内最大的争议之一是，未来究竟是能够在传统能源资源经济的模式之下取得可持续的发展，还是走向创新型的“斯科尔科沃”（СКОЛКОВО）模式——这后一种模式显然是梅德韦杰夫所推动的。而客观上，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的趋势以及新兴经济体后劲巨大的需求，使得俄罗斯经济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力仍然能够有所回升。所以，俄罗斯目前并不太担心欧债危机的冲击。据估计，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4.1%，但通胀水平降到了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低点7%。<sup>②</sup>俄罗斯大概在明年之后能够实现“无财政赤字”运行。这些变化大体上都使得普京所主张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现状的经济政策稍占上风。

在社会发展领域也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现象。在苏联解体和上世纪90年代初推行市场经济以来，一个具有俄国特色的新兴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他们要求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也要求社会的稳定发展，在这方面表现出与其他国家同类阶层相同的一般倾向。同时，他们对于各个领域的社会生活也都不同程度地起着推动作用。俄罗斯的社会分化程度确实在扩大，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尤其是每年大约70万以上的人口下降，影响着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来自高加索地区的恐怖威胁，以及普遍存在的犯罪现象，都干扰着俄国社会的稳定。然而，尽管依然面临着种种困难，整个社会的基本心态仍然是不愿意回到前苏联僵化保守的旧体制。

上述国内局势至少表明，既定的政治局面并没有大幅度地从根本上加以改变的需要。这无疑是普京参选总统、以及继续与梅德韦杰夫搭档治理国家的有利背景。总体说来，有以下进一步的理由支持上述判断：

第一，梅普之间无论是否存在歧见，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处于可协调状态。进一步说，也不排除梅普之间更为紧密合作的很大可能性。至少从时间来看，修改后的俄宪法规定，原定四年一届的总统任期，改为六年一届，而且可以连任两届。这就使得俄政治决策层有可能在一个比较宽裕的时间里施展抱负，

---

①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 Гла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траны - Инфляция, Жкх И Уровень Жизни. Пресс-выпуск №1855. Москва, 5 октября 2011 г. <http://wciom.ru/index.php?id=459&uid=112035>

② В.В.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м форуме ВТБ Капитал «Россия зовёт!». 6 октября. 2011. <http://premier.gov.ru/events/news/16653/>



可以从更加长远的战略高度进行谋划，而不受限于选票、政治更替等因素。

第二，客观上已经存在着的一个一定程度上“人造”的二元政治的局面。这一局面正在活灵活现地得到展示。在普京被确定提名为下届总统候选人之后，精英阶层不再需要为“站队”问题而颇费踌躇。而且，梅普两人之间可能的继续合作，将在本届选举中最大程度地取得民意的支持，最为广泛地吸纳选票，从而为争取今后尽可能长久的政治稳定局面提供基础。

第三，尽管“王车易位”之后的俄国政治依然存在着挑战，但是普京的主导地位显然将成为一个基本的格局，这使得俄罗斯的领导阶层有可能腾出手来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紧迫实务。普京曾表白过的“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奇迹般的俄罗斯”的承诺，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兑现。<sup>①</sup>

第四，有可能组成一个更能够贯彻普京意图的内阁班子，或者是行政工作团队。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库德林的去留问题，并非如事发后国外媒体传播的那么严重。普京在确定被提名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即明确表示：库德林是他的私人朋友，仍将留在经济团队中工作。但同时，他又坚决地维护被库德林批评的浩大的国防开支计划。<sup>②</sup>恰恰在这个关键点上，梅普观点一致。

第五，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政治竞争以及政治可替代性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向西方证明俄国式民主政治的合理性。从理论上说，这将有利于俄罗斯政治声望的提升，也便于俄罗斯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手法来拓展其国际空间。

#### 四、俄罗斯今后几年政治、经济和外部环境的总体评估

首先来看政治状况。

虽然普京几乎已经毫无疑问地将成为今后六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俄罗斯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一结果体现了当前俄罗斯国民的政治心态与选择，但这并不等于俄罗斯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转型期的政治问题。

其一，总的判断是：俄罗斯的政治格局，特别是当前的梅普、或普梅合作，能够适应现阶段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但如果不在体制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提供更大的空间发挥尽可能多的社会各阶层的作用，那就很难断言现有体制能够确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持续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具体而言，在目前条件下俄罗斯的“垂直系统”能够有效地维持和进行管理，并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应付“不同意见的部

---

① “普京豪言壮语：给我20年 还给你奇迹般的俄罗斯”，《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3日。

② В.В.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ом форуме ВТБ Капитал «Россия зовёт!». 6 октября. 2011. <http://premier.gov.ru/events/news/16653/>

分”<sup>①</sup>，而且近期也不可能发生任何灾难性的政治革命，但如何在较长时段内维持和巩固其政治合法性、进一步扩大政治支持率和政治动员能力，仍然是对“王车易位”之后的新政权的考验。

其二，普京本人获得了近三分之二的俄罗斯居民的支持，但是，俄罗斯的现代政党体系并非一统天下。“准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无意识形态”和缺乏严格组织纪律约束的“俱乐部风格”，使其基础难以像传统的民主集中制政党那样稳固。也正因为如此，普京要大力推动建立人民阵线来弥补统一俄罗斯党的不足。同时，久加诺夫（Г.А.Зюганов）的俄罗斯共产党、日里诺夫斯基（В.В.Жириновский）的自由民主党、米罗诺夫（С.М.Миронов）的俄罗斯公正党，包括反对党“右翼联盟”等，虽然还难以形成真正的联盟来对付“准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但是，有可能出现的挑战是，随着普京政权的相对稳固，执政集团越来越从至少是形式上的“二元政治”演变为“一元政治”，反对党的力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其合作，在极端情况下，这支力量在数量上并非绝对没有可能形成对现执政集团的挑战。

其次，从国际格局角度的分析。

未来若干年，俄罗斯将面临诸多国际竞争，这包括来自西方的依然抱有冷战意识形态和主张限制和削弱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那部分政治力量的压力；也包括在国际经济格局转换过程中，客观上出现的对俄罗斯传统产业部门提出的挑战。但是，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并不存在任何特别严重的、危及其生存的外部威胁——无论美国和欧洲在延续不断的危机态势之下都自顾不暇，国际恐怖主义并不会把主要矛头对准俄罗斯，中国更不会挑战俄罗斯，相反，是要坚定地与其发展全方位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俄罗斯并不需要为应对战争和保卫国土而去从事大规模的战略与军事动员与部署，而能够有时间和精力聚精会神于国家的发展。<sup>②</sup>这是未来若干年中对俄罗斯非常有利的一个方面。

俄之所以要在今后十年拨出7000亿美元巨资用于军事开支，主要是为了提升大大落后的军队装备，同时力争确保在国际军火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军工发展带动民用。总之，积极防御的色彩要大大高于进取型的拓展军事实力的涵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政治领导阶层发生的现在这种程度的变换，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俄罗斯总体的国际环境。因此，俄罗斯除了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对外政策作出一定的调整以适应变局外，并无必要大幅度地调整基本的对外方针。

最后，俄罗斯经济显然将对未来政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一，在较好的外部市场行情之下，俄罗斯经济的增长速度估计依然会保持在

<sup>①</sup> “Russia Should Not Miss its Chanc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2011, Nov.7-11, Moscow, pp.14-15.

<sup>②</sup> Ibid, p.20.

4%上下。这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除了上述人口下降因素的严重制约之外，成系统的腐败现象、基础设施的严重隐患、超过人们想象的各地区间的严重差异、包括产权问题实际上仍然未能得到解决——这些是造成对于外资的吸引力低下、乃至成为当前俄罗斯总体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二，一些基本数据表明，俄罗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然有着相当大的瓶颈制约，例如，储蓄率不到 20%，近期内达不到人们所渴望的 25-30%的水平。<sup>①</sup>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创新水平按各种主要指标统计，都排在世界平均的中下水平。<sup>②</sup>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经济的竞争力总体上无法与德国相比，而产品的数量规模又无法与中国抗衡。<sup>③</sup>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俄罗斯一些地方的经济原始化的状态依然存在，自然经济的传统还经常可以在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看到。

其三，俄只有大刀阔斧地改变经济政策，真正改善投资环境，重新分配能源资源的利润，以及与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公司组成联盟，才能够摆脱以上困境。但这样一个艰难的过程，至少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新的总统任期延长到六年的一个客观背景，也是民众对普京“王者归来”的最大期待之所在。

其四，大体上说，可以预期一个技术继续现代化的过程将在俄罗斯延续，人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为现代和舒适。但是，仅有一小部分技术来自自主创新而多数现代技术依然要依赖从国外引进的局面，无论是在技术工艺、出口市场、还是在生产领域，几乎都存在。作为最主要经济部门的资源采掘业和过境业务，以及相关的粗加工产品，还难以在短时期内被其他更先进的产业部门所替代。被认为比较先进的宇航、化工、武器制造、原子能、医药等部门，还难以立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还不过是整个世界产业链中的几个环节而已。因此关键在于，俄罗斯如何能在近期继续运用其资源能源优势，为未来势必要来临的经济格局变换及时做好铺垫。

## 五、未来俄罗斯局势发展的若干判断

在梅普合作的政治格局确定之后，在今后三至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段里，俄罗斯国内局势和对外发展将会有怎样的前景呢？

第一种可能性：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维持现状。

---

① “Russia Should Not Miss its Chanc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2011, Nov.7-11, Moscow, pp.16-17.

② Anders Aslund, Sergei Guriev, Andrew C.Kuchin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CSI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enter, Washington,D.C., 2011, Jun, pp.95-123.

③ 2011年7月和9月间俄罗斯学者在与笔者交流中所谈及的一种观点。

这样的发展前景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的可能性较大<sup>①</sup>，但在中长期会发生改变。有鉴于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尚需时日，因此，较多依赖于世界行情的俄国经济维持和延续现有的水平，将成为主要的可能。从外部政治环境来看，来自国外的威胁处于较低水平，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这样一种状况和来自内部“基层”的政治压力不大，形成匹配，使得俄有可能获得一个较为和谐的发展空间。就社会层面而言，现有的社会服务水平尚可以继续保持一段时间，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包括中产阶级上升的速度都将有所减缓，这有利于避免社会差距过于拉开。从长时段看，维持现状会形成惰性，并孕育社会不满，但是，2-3年内的近期威胁不大。这样一种维持现状的格局不仅具有物质性的条件，而且也确有其存在的心理土壤，其中包括：对于普京和现政权的较高信任度、爱国主义情绪的上升、对于无论是帝国时期还是前苏联时期稳定生活状态的怀念。但是很显然，维持现状的状态在一段时间之后会积累起并导致一系列矛盾的尖锐化，因此，这样的模式估计不能够持久。

#### 第二种可能性：威权现代化模式的实施。<sup>②</sup>

有学者认为，威权现代化模式实际上在苏联晚期是有可能出现的，遗憾的是未能得见。在普梅关系被确定之后，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于是，人们从各个角度预言这样一种威权模式的较高的出现概率。从理论上说，威权模式在转型国家的历史上反复而且普遍地出现过多次。一般而言，其特征是：其一，保持政治领导阶层较为长期的相对稳定；其二，政党模式中出现一党独大，而其他政党虽具有影响力，但无法与主导政党相抗衡；其三，存在着无定型的意识形态，不主张过于激化思想路线的对立；其四，军队和强力部门抱持一定的职业化倾向，但主要依执政党的意向行事；其五，媒体和公共生活具有一定的自由度，但以不损害稳定的政治格局为度；其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以国家主导，寡头集团和私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威权体制之下的经济往往具有一定的发展和增长空间。

从稍后几年的态势来看，这种威权模式如果在俄罗斯出现，其积极方面，是有可能导致国家在现实存在的具有一定竞争性的财产结构基础之上形成一个长远的战略发展计划，同时又不会在现代化路线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在国家重要产业领域，如石油、天然气部门，国家长期投资的政策将发挥巨大作用，同时在有效利用国际

---

① 前文所注Valdai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俄罗斯发展前景的第一种“the Inertial model”预测模式，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一种“停滞模式”。因此，本处沿袭其意，但主要强调俄罗斯发展前景的延续性，而不是其“停滞不前”的含义。

② “Russia should Not Miss its Chanc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2011, Nov. 7-11, Moscow) 的报告中提出了“The Inertial scenario”, “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 “Liberal-democratic reform”, “democratic revolution”, “Hard-line authoritarianism”等五种发展前景的预测，本文取其“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名称，除了注释所表明处之外，其内容为本文作者的分析。

资本的背景下进行产业结构的更新。大规模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借助国外资本对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这种模式要求政治相对集中、民族主义高涨、舆论工具具有有效的动员能力，同时要求决策阶层具有坚定的政治意志，以面对内外挑战。因此，需要实现类似彼得大帝、斯托雷平式的集权但面向改革的政策。有专家认为，这样的威权模式在当下立即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只有在大约两、三年之后，保持现状的模式出现了问题并无以为继的时候，才会被接受。这样的发展方向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威权体制，基本上是保守主义背景下的自由主义政策路线。

总体上说，这一模式被采纳的概率较大，但是，如果这样的一种发展模态因各种原因在执行一段时间后无法持久的话，那就会有比较激进的其他趋向取而代之。

第三种可能性，激进主义的发展前景。

所谓激进主义的发展前景是与这样几方面的原因有关的：第一，前面曾提到，西方的一部分政治力量始终希望出现一个他们所想象的主张交好西方、大幅度推动民主的早先的梅德韦杰夫式的政治领袖。如果今后几年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深化，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形势愈加恶化，受俄罗斯影响的能源资源市场的行情继续大幅度看涨，加上西方国内政治角逐激化，将促使西方的这部分力量进一步对俄施加影响。第二，俄国内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围绕着未来俄罗斯经济的定位与走向急剧分化，同时，俄国内主张进一步接近西方的力量抬头。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主张与欧美结盟、以自由主义—民主改革为口号的政治力量会推动建立进一步民主化的多元政治结构，包括竞争性的政党体制、独立的司法结构、保护人权、地方政治系统的更加多元和开放，以及进一步的非斯大林化。表面上看来，这种模式似乎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实现，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模式要求对俄罗斯现有政治结构作根本性的激进改变。

而激进主义路线的另一种可能，则是上述激进民主改革路线的难以为继，并随之发生社会动荡，由此导致向更强硬的威权模式急剧转化。在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俄国内经济随之发生动荡、抵制现有政治集团的意向尖锐化、精英阶层大幅度地依赖外部势力等背景之下，俄执政阶层将不得不实行这种强硬的管理模式。<sup>①</sup>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模式不太可能在俄出现。因为很多人都明白，如果出现这种模式，那么在短期控制局面之后的效应，就很可能是再次出现“解体”式的革命。

按笔者的理解，对于俄罗斯来说，人们比较乐见的模式应该是，从政治上看，在确保长期稳定的前提下，政治上允许保持一定的竞争性，甚至出现两到三个竞争

---

<sup>①</sup> 前文所注瓦尔代报告中，提出的后三种模式，即“自由民主化改革”、“民主革命”、以及“强硬威权主义模式”，本文认为并不可能单独出现，而总体上仅可能在社会政治激进化的态势下才能出现，并相互依存，因此本文将其归为一类“激进主义的发展前景”。

性的政党，尽管这两三个政党还难以和主导的执政党竞争。笔者一直以为，这样的局面有可能在俄罗斯出现，但这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式的完全自由竞争式的多元政治，而是类似于现有的“二元政治”的一种延续。90年代以来，这样的一种政治发展已经有过多次尝试，虽然这在目前依然需要时间才能稳定下来。这样的“二元政治”可能会是目前俄罗斯政治格局中的一个主要成份。

政治局面的稳定将为俄罗斯提供发展经济的良好机会。因为取得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步骤是寻求取代能源依附性模式的新的产业格局，而稳定的政治局面将决定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经济布局 and 各项政策安排。这并不是简单地确立私有产权等措施所能够解决的，其中关键的步骤，很可能在于俄罗斯能否形成若干新的产业领域，如汽车产业、大飞机产业、乃至现代化农业。另一个堪称核心的战略选择，便是能否成功地实施西伯利亚的开放、开发战略。这是确保有更多的外资进入、以及长时段确保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所有权的确立。虽然以往多年也有过一波又一波的开发西伯利亚战略，但这次可能成功的关键在于：东亚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稳定存在，有可能为其开放开发战略提供一个公平、互利、多元、创造性的外部环境，而俄罗斯又能够同时从内部提供一个强势的政治推动与控制。正如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所言，“俄罗斯实在是面临着一个绝好的机会”。<sup>①</sup>这是各种重要的趋势在同一个历史关节点的交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性机遇。

在外交上，在一定时期内，俄罗斯会沿着梅德韦杰夫时期的调整，进一步修补与西方的关系，但不会如同90年代初期那样接近西方。“与欧洲结盟”的纲领提出后得不倒回应，便是这条道路在目前形势下无以为继的证明，而重启美俄关系也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这是因为有若干背景和行为逻辑在起作用。同时，俄罗斯也不会简单地重复以往和中国的政策关系，一个新的空间是，在“现代化伙伴关系”的概念下寻求对华合作的新途径；另外一个重要空间在于：中国未来若干年持续不断的国内城市化进程和筹划中的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重新开发、开放这两个历史过程的历史性相遇。这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加具有互补性的互动过程，同时将使中俄关系大大地提升层次，也呼唤着更具有远见和深度合作的长远战略。最后，2012年以后，中俄两国将按照既定程序同步发生的政治领导阶层的重要更替，会成为这一历史性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保障。

（责任编辑 陈大维）

---

<sup>①</sup> Sergey Karaganov, “Russia’s Asian Strateg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 July 2011.

## 苏联解体：中国学者笔谈

# 亲历苏联解体

盛世良\*

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已经20年。从不同视角，对苏联解体原因有几种标志性看法：社会主义制度先天不足、斯大林模式“原罪”、戈氏“叛变”、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等等。应该说，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是一系列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内因一：思想僵化，害怕改革

1964年我到新华社从事俄文翻译，译得最多最苦的是苏联领导人的长篇讲话和大块文章，动不动就是三五万汉字，引用马列原著几十处。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引经据典，才能证明自己是“真马列”，似乎马列本本就能提供一切难题的现成答案。

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对理论加以修正和发展，在实践中改革和创新，总结、归纳、升华出新的理论，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然而，苏联领导思想僵化，害怕创新，一次次地错失改革的良机。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在军事共产主义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新经济政策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社会开始恢复生机。然而，这一政策很快被放弃。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这本是一次改革良机。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苏联外部威胁消除，本可调整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1953年斯大林逝世，也是一次改革他所留下的模式的机会。1950-1960年代，在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取得一定经济效果的背景下，东欧多国尝试变革，企图摆脱控制，然而却遭到苏联出兵镇压。此后苏联在改革方面更加谨小慎微。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大见成效，苏联不少有识之士对中国经验很有兴趣，但高层依然无动于衷。记得有一次采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葛罗米柯会见中国代表团时，葛罗米柯就曾板着脸说：“我对你们的改革毫无兴趣。”

### 内因二：政治领域的缺陷

我1978年到莫斯科任记者，发现书店里很少见到俄罗斯和外国古典文学作品，

---

\* 盛世良，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充斥书架的是苏联领导人的文集。在苏联，这些书都成了马克·吐温百年前在《赤道环游记》里讽刺过的“经典著作”——“所谓经典著作，就是人人交口称赞但又谁都不看的书”。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苏联理论脱离实际。

二是领导脱离群众。80年代，一位英国记者在同我聊天时刻薄地形容苏联社会状态：“领导装模作样地坚信马列，群众装模作样地拥护领导，领导又装模作样地做出受拥护状。”群众对这些口头马列、昏庸垂暮、无所作为的领导人，早已厌倦。结果是，“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下了禁共令，竟无人誓死捍卫苏式社会主义。

三是残酷斗争，镇压异己。十月革命后，政治斗争不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列宁同代的政治领袖逐一被打成反党分子。肃反、大清洗，“医生事件”、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事件……不断“继续革命”，大量消灭党的忠诚干部，并殃及无辜。据苏联解体后克格勃公布的数字，苏维埃政权在73年里共处死了350万人（帝俄时期的1826-1905年杀害的政治犯只不过894人）。某些“持不同政见者”仅是反对苏式社会主义，就被驱逐出境，强化了苏联的负面形象，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

四是扩张无度。苏联成立时，对民族主义、分立意识估计不足，联盟宪法为共和国独立留了后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引起地方不满，滋生分离主义情绪，为联盟解体留下隐患。苏联继承沙俄扩张传统，二战前后陆续把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收归版图，进而在波捷匈保罗阿和东德扶植亲苏政权，把苏式社会主义强加给经济比其发达的多数东欧国家，还要把亚非拉“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最后发展到武装入侵阿富汗。这不仅遭到周边国家的反对，而且给敌对势力指责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加深了分崩离析的危机。

### 内因三：经济竞争力弱

俄罗斯1913年曾向荷兰出口黄油和鸡蛋，搞社会主义半个多世纪后，粮食和肉奶都要进口。1950年代，苏联人均GDP与日本差不多，苏联解体时，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1978年我到莫斯科后听到的第一个政治笑话就是讽刺苏式计划经济的：

红场阅兵，依次出场的有装甲车、坦克、自行火炮、战术导弹、中程导弹、战略导弹，杀伤力一件比一件大。最后上场的是两个夹公文包、戴眼镜的小矮个。勃列日涅夫问：“这哥俩的杀伤力居然超过战略导弹，是什么人？”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不是我的人。”乌斯季诺夫：“也不是国防部的人。”这时，愁眉苦脸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开口了：“是国家计委的……”

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在实现工业化和赢得二战胜利方面功不可没，但弊端不少，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零星变革，没有触动其本质。

产业比例失调。第一和第三产业严重落后。工业内部，重工业过重，轻工业畸



轻。消费品工业落后，影响生活水平提高，造成进口依赖。

经济军事化。二战后，苏联误判形势，准备再打世界大战，卷入对美军备竞赛。军工占产值四分之一。由于体制问题，苏联的军工综合体难以像美国那样助推民用经济，而是成为经济的沉重负担。

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苏联盲目自满：“凡是苏联的，就是最好的”；在解体前又盲目自卑：“苏维埃政权等于非洲穷国加导弹核武器”。

苏联坚持不与国际接轨，工业产品执行本国标准；铁路坚持 1500 毫米的宽轨制；为了隔绝“敌对宣传”，苏产收音机的超短波长于其他国家。1980-1990 年代，苏联错过了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

苏联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竞赛中日益落后，生活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 **外因：阵营内耗与“和平演变”**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尽管也你争我夺，但一旦面临“赤色国家”威胁，必定党同伐异，齐心协力搞“和平演变”。

社会主义国家则“与人斗其乐无穷”。首先是党内斗，其次是国内斗，随后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斗。苏联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批中国“教条主义”，“惟我独革”。

我 1964 年到新华社从事俄译中工作后，经手翻译的苏共中央决议就有这样的奇怪规定：自留地上不得种经济作物，盖园地小屋不得超过一层；农户最多只能养一头带小牛的奶牛，不得养役畜；农户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的只能是剩余的自产品……这是因为，苏联怕中国说它搞修正主义，“三自一包”。中国反修，虽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正确成分，但主要是以极左反左，客观上使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改革心存疑虑。

阵营内斗的最高境界是出兵“保卫社会主义成果”。50 年代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事件”，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在一定程度上是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改革苏式社会主义的小心尝试，但都遭到残酷镇压。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和平演变”始终是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是，这仅是外部因素，只有像苏联末期那样具备内因的条件下才会起作用。

### **内因四：“戈尔比”和舆论失控**

1985 年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宣扬“改革和公开性”，开始轰轰烈烈地“改造”社会主义。这位“年轻的改革家”获得了国内自由派的拥护，“戈尔比”受到美国和西方的热捧。苏联人心被搞乱：此前的苏联领导人到底是“伟大领袖”还是“民族罪人”？社会主义是需要改革还是应该彻底放弃？

1988 年 3 月 13 日，《苏维埃俄罗斯报》整版发表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来信《我

不能放弃原则》。这位列宁格勒工学院的女教师批评苏联的改革和对斯大林的态度，认为苏联在“背离社会主义”，对斯大林的批判“有诸多歪曲和片面性”。

4月5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也用整版篇幅发表编辑部文章，批判安德烈耶娃“试图修正党的决议”，是“反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行动宣言”。

当时的苏联大众传媒多数控制在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派”手里。渲染社会主义缺陷、鼓吹西方自由民主的报纸处于绝对优势。力挺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公开性”的《消息报》和《劳动报》发行量超过2000万份，《论据与事实》周报创了世界报纸发行量纪录——3500万份。相比之下，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仅发行700万份，“老保”《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行500万份。

在“改革派”的舆论压力下，安德烈耶娃只能落得个被“批倒批臭”的下场。苏联媒体几乎成了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一统天下。

### **根本原因：丧失执政能力**

然而，不管思想多么杂，舆论多么乱，直到1991年“八一九”，苏联“亡党亡国”依然可以避免。最可怕的是，苏共丧失了执政能力。

首先，苏联人代会于1990年3月废除了苏联宪法第六条——苏共领导国家政权，苏共领导自我放弃了执政权力。其次，“八一九”事件以实例显示苏共领导彻底丧失政治决断力和行动能力。1991年8月19日，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人民书》，随后的行动却软弱无力。

我谨以亲历作证。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是在当天清晨7时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电话后，才知道苏联出事的。我立即赶往市中心了解情况。在自西向东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库图佐夫大街上，我的汽车越过一列军车。事后我了解到，这是进城的第一列戒严军车。也就是说，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发布《告苏联人民书》数小时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进入市中心，无论是克里姆林宫还是叶利钦的所在的白宫，或是总参谋部和陆军司令部，我都没有见到任何动静。叶利钦的车队招摇过市地开往白宫，未遇到任何阻拦，紧急状态委员会听任叶利钦组织抵抗，听任叶利钦的拥护者策反戒严部队。当天傍晚，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委员会主席、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在会上双手颤抖，其余成员目光茫然，对救党救国大业既无信念，又无决心。次日清晨，我在市中心看到，奉命进城戒严的列别德和格拉乔夫部队已经倒向叶利钦，坦克上插的不是苏联红旗，而是旧俄罗斯的三色旗，坦克炮口不是对着白宫，而是朝外。这时，苏联领导人已完全丧失了保卫政权的决心和能力。“八一九”暴露了苏联中央政权的虚弱，共和国领导人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火速脱离联盟，纷纷宣告独立。至此，苏联解体不可避免。

# 退出冷战：戈尔巴乔夫的主动选择

左凤荣\*

美国人一直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对抗了几十年，双方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恶化了国际环境，造成了许多矛盾与冲突，损害了世界和平。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便是改善苏美关系，试图摆脱冷战的桎梏。

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政策固然与苏联的经济困境有关，因为苏联国内问题成堆，军备竞赛使苏联经济不堪重负，里根又要加紧实施于1983年3月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如果苏联应战，就意味着开始新一轮军备竞赛，这必将增加苏联经济的负担。但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苏联也可以继续举全国之力，通过制造外部威胁，动员人民继续为强国目的牺牲自己的利益。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研究表明，结束冷战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对世界形势和苏联自身地位的现实主义分析。苏共把战胜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为此，长期把国家的发展战略建立在增强军备上，并随着实力的增强，到处插手，鼓动其他国家走苏联式的发展道路。戈尔巴乔夫看到，这条路行不通。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就强调：出现了涉及文明社会存在基础本身的全球范围内的矛盾和问题，如环境、大气层和海洋的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强调“解决全人类和全球的问题光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是不行的。这需要世界范围的合作，需要大多数国家密切的、建设性的协作。”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又系统地论述了其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理念有这样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他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了核时代，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它只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第二，在关于时代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问题上，他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当今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观点，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取代不了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需要长期共处。苏联放弃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大目标，努力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处、共存、合作之路。第三，戈尔巴乔夫认为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世界经济联系正日益国际化，苏

---

\*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联要发展，必须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第四，在国家关系上，他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第五，在价值观方面，他放弃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承认全人类价值优先于民族、阶级等价值。苏联不再用阶级斗争的态度对待一切国际现象，不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看成是国际社会演进的动力，不再把和平共处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些新观念的核心，是要改变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关系，率先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戈尔巴乔夫为结束对抗和冷战做了大量工作：如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从阿富汗撤军，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不再到处支持革命和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美关系的改善，这主要是苏联努力的结果。据谢瓦尔德纳泽回忆，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首先研究了对美关系，认识到美苏对抗对苏联的巨大危害。于是，“我和戈尔巴乔夫决定：应该不管用什么代价也要找到与美国人的共同语言。与他们达成协议！他们也曾说这种竞赛对他们也不利。我和我的外交部、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在几周内制订了与美国人接近的政策。”苏联新领导人与美国人开始打交道时很艰难，里根在与谢瓦尔德纳泽会面时，看着谢瓦尔德纳泽，然后说：“我知道，你是邪恶帝国的代表，但是我不得不跟您谈话，讨论全球问题。”他以为谢瓦尔德纳泽会立即站起来离开，但谢瓦尔德纳泽微笑着对他说：总统先生，这是您的成见，过一段时间，您会相信，我们不是什么邪恶帝国。您会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然后会去苏联。但是，里根回答，这只是神话，任何时候都不会发生。正是在苏联积极主动的工作下，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日内瓦、雷克雅未克、华盛顿、莫斯科等一系列会晤，里根不再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他们之间签署了销毁中导条约，签署了《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些都是开创性的，人类终于开始销毁自己制造的杀人武器，这有助于消除世界核战争的威胁，对此，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曾给予高度评价。

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冷战也宣告结束。1989年12月，苏美首脑在马耳他会晤，布什表示美国支持苏联的改革。他还表示，鉴于苏联发生的变化，美国打算与苏联就签订新的贸易条约进行磋商，美国政府打算采取措施终止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效力，决定废除限制向苏联贷款的史蒂文森—伯德修正案，重新考虑对苏联要求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立场。苏方则重申，新的政治思维是尊重每个国家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自由选择，实际上表明苏联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为响应苏联的裁军建议，美国宣布削减在亚太地区驻军的15%，撤销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销毁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等。马耳他会晤确认了两国关系中对抗时期的结束，相互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这也成为标志着冷战结束的重要事件。在东欧发生政权更迭、德国实现统一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进行干涉，彻底放弃了“勃

列日涅夫主义”和“有限主权论”，给了东欧人民以选择的自由。

总之，在冷战结束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起了重要作用。他主动放弃了对美国的冷战政策，放弃了维护势力范围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在德国统一和东欧政权更迭的问题上，没有进行干涉。持续半个世纪的、以意识形态对抗为特征的冷战走向了终结。戈尔巴乔夫是冷战结束的关键性因素。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许冷战不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结束。

对于戈尔巴乔夫主动退出冷战的政策，各方评价不一。西方和东欧自然欢迎，许多苏联人则予以谴责，A·利亚霍夫斯基在《阿富汗战争的悲剧》一书中认为，“苏联共产党的最后一位‘领袖’和他的‘杰出的同志们’以自己的‘英雄壮举’给原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和俄罗斯造成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巨大损失：放弃了对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总结和雅尔塔——波茨坦宣言体系；破坏了战略实力平衡，使其有利于西方；瓦解了华沙条约和几十年欧洲安全体系下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使前苏联加入了由美国发号施令的针对一些友好国家采取政治和经济制裁的国际体制；苏联军队实际上从德国的溃退最终为苏联解体创造了条件。”这种谴责实际上是在维护苏联的霸权。以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自然会作出不同的评价。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为本国的利益服务的，评价戈尔巴乔夫退出冷战的政策也应从这个根本点出发。从苏联的长远利益来看，退出冷战，结束军备竞赛，与发达国家、邻国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有利于苏联专注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戈尔巴乔夫改善了苏联遭受全世界谴责、陷入孤家寡人的处境，改善了与中国、美国、欧洲大国的关系，减少了军费开支，裁减了庞大的军队，从而减轻了经济负担。有许多人谴责戈尔巴乔夫在裁减军备上让步过多。但是，这些毁灭人类的武器既不能吃，也不能用，维护起来还需要庞大的费用，销毁也没什么不妥。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充分利用外交的积极成果来促进本国的经济改革。囿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戈尔巴乔夫仍反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改革已经突破了所有制界限、努力发展商品经济之时，苏联仍自恃为先进，仍排斥私有制和价值规律。直到 1990 年年中，在经济危机严重、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才开始制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但由于内部纷争激烈，未能达成共识。

当然，戈尔巴乔夫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许多构想也未变成现实。美国以冷战的胜利者自居，为了控制欧洲，仍不断制造苏联（俄罗斯）是威胁的神话，使冷战结束后的欧洲并没有真正消除冷战的分界线，共同的欧洲大厦并未建成。受制于国内尖锐的政治斗争，戈尔巴乔夫的外交目标常常难以达到。戈尔巴乔夫给东欧人民选择自由的权利并没有错，这是符合东欧人民愿望的。但是，1989 年东欧的剧变对苏联造成了很大冲击，叶利钦等反对派受到鼓舞，把夺取政权作为主要目标。为了

夺取政权，赶走戈尔巴乔夫，他们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甚至不惜令国家解体。不认同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共产党人组建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对戈尔巴乔夫施压。1990年6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成立、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通过，成为摧毁联盟大厦、打断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决定性因素。

在现今的俄罗斯，除了少数共产党人谴责戈尔巴乔夫出卖了东欧外，大多数人对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政策还是持认可的态度。2007年2月10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在谈到冷战时强调：“不要忘记，柏林墙的倒塌成为可能，是由于历史性的选择，其中包括我国人民——俄罗斯人民的选择，由于选择了民主和自由，选择了公开性和与欧洲大家庭全体成员建立真诚的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在迅速发展，世界经济被分割成两部分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各国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都在加深，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的文明成果得到了更好的交流。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新安全观、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等等正在变成实践。结束冷战，消除核战争的威胁，可以说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大功劳，应该予以肯定。

## 苏联解体的制度因素与行为因素

余伟民\*

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视角加以解释，但是离开具体历史场景的一般意义的解释会流于抽象，反而模糊了具体的原因。就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而言，在讨论其发生的原因时，哪些因素表现了长期历史进程的发展趋势，那些因素作为过程性历史运动的力量组合发挥作用，都需要放到苏联国家体制的建构和历史演化中作具体的分析。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一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国家体制。苏联的前身是1917-1918年间在战争与革命中解体的俄罗斯帝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曾一度接受帝国解体的现实，苏维埃政权承认了大部分从帝国版图分离出去的“独立国家”，苏维埃俄国所继承的沙俄帝国遗产是一个版图已大大缩小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之所以接受这一现实，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在国力空虚、外敌入侵、国内战争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下，苏俄政府不仅无力阻止帝国解体的客观趋势，甚至被迫签订割让国土的布列斯特和约以求生存；另

---

\* 余伟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中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口号和革命胜利后发表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都明确赋予各少数民族自决乃至分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种政策取向不仅具有宣传的功能，而且也吻合于当时以世界革命的逻辑发动俄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然而，形势的变化不久就改变了苏俄领导人在民族自决和国家版图问题上的想法。世界革命浪潮的低落和国内战争中红军向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推进，从必要和可能两个向度促使苏俄领导层重新考虑俄罗斯与其他民族地区的关系，并把重建统一的多民族欧亚大国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决议，要求在原帝俄版图上建立苏维埃国家联盟，由此开始了筹建“苏联”的过程。

为了区别于沙俄帝国，“苏联”被设计为一种以民族主体为地域单元的特殊联邦体制（每个地域单元都有特定的民族标记）。一方面，苏联要表达各民族平等的理念，因此各民族地区以民族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形式“自愿”加入苏联，并享有退出联盟的宪法权利；另一方面，苏联要承担重建大一统国家的使命，为了确保“世界革命基地”的稳定和安全，国家的政治结构不能实行联邦制原则，只能是高度中央集权。这就形成了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矛盾。

在苏联筹建阶段，这一矛盾已经围绕着宪法草案的制订展现出来，并引发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争论。斯大林主张用中央集权原则直接处理国家体制问题，提出所谓“自治化”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原独立的民族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用扩大俄罗斯联邦的方式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无需改变苏俄的政治架构，即可将莫斯科的中央权力延伸至并入的民族地区。列宁反对这一方案，认为这将导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破坏各民族“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他从维护苏维埃政权的民族平等理念出发，要求建立一个各民族共和国平等的联盟。

其实，列宁并不否定联盟国家的中央集权体制，他一贯主张党的统一和党对国家的集中领导，在党的组织系统中绝不搞“联邦化”，只是在国家体制的形式上，列宁反对俄罗斯民族的地位高于其他民族。因此列宁和斯大林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政治策略层面。斯大林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于重建大俄罗斯国家的目标坚定不移。从他的“自治化”方案以及为这个方案辩护的言论来看，将已经获得独立的各民族共和国的主权收回乃是维持和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必由之路。他甚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无须隐讳大俄罗斯主义的正面功能，否则就是“虚伪”的“民族自由主义”。列宁当时正处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内在冲突之中，他一方面需要顾及政权的现实利益，另一方面又担忧苏联重蹈沙俄帝国覆辙。正是基于这种矛盾心理，列宁在苏联的建构问题上，既坚持中央集权制（通过党的组织机制来实现），又希望避免帝国的复活，因此他特别注意在联盟的建立过程中抑制大俄罗斯主义倾向，有时甚至故

意站在维护独立的民族主义一边，以维持两者间的平衡。斯大林后来接受列宁的建议，保留了“虚假的”法律来满足加盟的非俄民族共和国希望享有的平等和自由退盟的权利。

然而，这个法律上遵循民族平等原则的联盟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体系，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实施国家领导权，各加盟国的国家主权在实践层面已被剥夺，“共和国”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这样的制度性安排所建构的联盟国家是形式上的联邦制，实质上的单一制，始终存在着宪法权利与实际权利的张力。缓解体制的结构性矛盾需要特殊的控制机制，因此在苏联国家的实际治理中，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维系大一统国家的必要前提，政治体制和国家体制形成难以分离的联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具有与沙俄帝国同构的体制特征，恰如沙皇专制制度是俄罗斯帝国的支柱，党国一体、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亦是苏联大一统国家赖以存在的制度架构。如果说当年沙皇统治的垮台导致俄罗斯帝国的瓦解，那么，对斯大林模式的实质性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苏联国家体制的动摇。这就是我们在 1985-1991 年间看到的历史场景。也正是在这种制度结构的内在矛盾和体制的联动效应中，我们看到了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逻辑。

然而，历史运动的客观逻辑并不注定演化出一种“必然”的结果。即便在苏联国家体制的建构中已经埋下了日后走向解体的因素，但这些因素的激活及其具体的演化过程却是取决于历史运动中发挥选择作用的人的行为及其“合力”。

1985 年启动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真正触及政治体制的深层次社会变革，其目标是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的基本问题，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在一般情况下，打破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权力垄断是走向宪政民主的必要步骤，也是在法治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因此具有正面的历史效应。但在苏联的特殊国情中，当维系大一统国家的中央集权政治架构动摇后，依附于政治体制的联盟国家体制也随之动摇，原本“虚假”的宪法权利从政治控制的松懈中获得了实践自由。于是，1940 年被强制入盟的波罗的海三国率先举起分离的旗帜，要求“退盟”独立，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也随之跟进，甚至俄罗斯联邦也发表“主权宣言”，15 个民族主体国家纷纷宣布自己的主权地位，联盟国家体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这种局面是领导改革的戈尔巴乔夫等人始料未及的，而缺乏统筹全局的应对机制也给一些有政治野心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提供了借“独立”谋取权力的机会。1990-1991 年，围绕苏联国家体制的前途出现了不同取向的三种力量的博弈。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改革派提出“更新联盟”的构想，即在确认各加盟国主权的基础上缔结一个新的联盟条约——“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此举当时获得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的赞同，1990 年 9 月，成立了由各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



11月23日，新联盟条约草案公布，供全民讨论。12月召开的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围绕是否保留联盟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重新起草新联盟条约，并将是否保留联盟的问题提交全民公决。1991年3月17日举行的全民公决结果显示，76.4%的投票人赞成保留经过革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国议会拒绝执行全民公决决议，这些国家的公民被禁止参加投票）。7月底，新联盟条约草案修订完成，预定8月20日正式开始签署。但是，以亚纳耶夫为代表的一部分企图维持原苏联国家体制的党、政、军领导人在新条约签署前夜发动了一场政变，以阻止原联盟国家向新联盟国家的转型。“八一九”政变的失败，表现出维持旧体制已失去民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社会的主流已不愿意为了维护苏联国家体制而让政治体制倒退到斯大林模式。但另一方面，“八一九”政变也使戈尔巴乔夫“更新联盟”的构想流产，与政变者的企图相反，此举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因为正是在应对政变的过程中，以叶利钦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崛起，他们作为原加盟共和国的领导者不愿意继续成为联盟中央政府之下的第二层次领导人，因此决定利用政变失败后中央权力的失控完成各自的“独立”。当年12月，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首先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继而11个原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签署《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告以非联盟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取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此结束了苏联69年的历史。

上述过程表明，苏联解体既是国家体制内含的结构性矛盾激化所使然，也是人们在应对社会矛盾运动时各种选择较量的结果。如果说前者与改革进程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历史运动的客观逻辑；那么，后者则反映了改革进程中各利益群体的目标动机和行动能力。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必然要求重构联盟国家体制，因此“更新联盟”是符合改革趋势的选择，也符合多数社会民众的愿望（当然，波罗的海三国这样的被强制入盟者是另一种立场）。如果这一进程得以完成，则联盟国家体制将以新的形态继续存在（国名可能改变）。这也许是摆脱帝国传统、走向现代联邦制国家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正面效应可以在政治体制和国家体制层面同时得到展现。然而，“更新联盟”的选择当时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阻力，一个是保守的维持旧联盟的势力，另一个是“激进”的反联盟势力，两者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通过似乎相反的政治行为组合成阻止新联盟诞生的“反重构”力量。这两股力量的叠加压倒了主张重构联盟的力量，使历史运动的合力定格于“反重构”的矢量线。于是，在三种力量的博弈中，新联盟胎死腹中，旧联盟正式解体，历史运动在1991年冬季这个时间点上将上述政治行为的较量结果聚合为一个震动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

（责任编辑 陈大维）

## 苏联解体：原因篇

# 苏联为什么会终结？\*

E·普里马科夫\*\*

**【内容提要】**1991年3月17日全苏公投仍有高达76%民众支持保留共同国家。但不到9个月之后，别洛韦日森林声明即宣布苏联终止存在。假如在公投举行以后，不是采取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方针，而是循序渐进地建立一个“软”联邦，一开始仅限于建议签订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的协议，分离主义者的目的就不会达到。“8·19”事件更多是起了雷管的作用。先前的发展方式挖了苏联的墙角。导致苏联垮台的深层次经济原因体现在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构性危机上。而由国家结构中长期缺乏联邦制引发的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危机，是苏联解体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保留苏共作为确保苏联统一的机制，其必要条件是党本身的民主化。制约苏共民主化的主要力量是党的机关，它实际上处于选举出来的党的机构之上。在帮助苏联走出经济困境方面，西方甚至“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而困难至极的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苏联的解体。

**【关键词】**苏联解体 “8·19”事件 联邦制 原因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5-0025-(15)

这个问题被提起的次数非常多。可以大胆地认为：大多数俄国人，还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很多民众都怀恋这个已不复存在的伟大国家。

从1991年3月17日76%参加全苏公投的人表示支持保留苏联，到同年12月8

\* 本文为普里马科夫2011年5月付印的新著《Мысли вслух (M.: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1)第四章 (Почему скончался СССР?)》。经作者授权，由《俄罗斯研究》独家中文发表。

\*\* E·普里马科夫 (E. Примаков)，俄罗斯前外长、前总理，俄罗斯工商会前主席。

日来自别洛韦日森林的声明宣布苏联终止存在<sup>①</sup>，其间只有 9 个月不到的时间。公投是全民表决：有 12 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除外）的 1.49 亿人参加。参加别洛韦日森林“表决”的有两位总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Б·Н·叶利钦（Б.Н.Ельцин）、乌克兰总统Л·К·克拉夫丘克（Л.К.Кравчук），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С·С·舒什克维奇（С.С.Шушкевич）。据在场的人说，他们喝了不少酒，借以壮胆。阴谋与临时兴起的混合酿造了一场政变。

对于要理解已发生的一切而言，哈萨克斯坦总统 Н·А·纳扎尔巴耶夫（Н.А.Назарбаев）2009 年给我讲述的一个情节是很有意思的。据他说，叶利钦在启程参加“三人会晤”前曾对纳扎尔巴耶夫说，他此去是为了把坚持己见的克拉夫丘克带回来签署保留共同国家协议的。当时，协议已经准备好了。按照这一叙述来判断，要么，解体苏联的想法是在三人到了别洛韦日后产生的（可信度很少），要么，阴谋家们担心计划泄露，秘而不宣，他们知道，有一批强有力的人支持保留经过改革的苏联，这些人会坚决抵制他们。但是，人们没有抵制。事件发展到那个阶段时，决定权仍在最高统帅戈尔巴乔夫（М.С.Горбачев）手中，他可以命令白俄罗斯军区包围别洛韦日森林，甚至不用逮捕，而只须从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那里没收匆匆拟就的文件，并把他们“打发回家”。从当时在别洛韦日森林的人的回忆来看，“签字者”们自己也担心事件会发生这样的转折。但是，在经历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事件、特别是返回莫斯科后与叶利钦进行的令人屈辱的接触后，戈尔巴乔夫，这个原本就从未展现过坚强意志的人，被击垮了。

那个时候，对公投的问题，“您认为，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更新后的平等主权共和国的联邦（其中，各民族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将得到充分保障）加以保留是必须的吗？”有不少人愿意给予正面的回答。经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通过的这一表述，把保留我们生活了 70 年的国家的必要性与对它进行重大改革结合在一起。但是，别洛韦日密谋 13 天后，在阿拉木图，11 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还是签署了声明，支持别洛韦日协议，宣布成立没有任何共同机构（立宪、行政和司法机构）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并且如此之顺利？一大批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认为，原因在于吓坏了无数人的八月事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将国家权力夺取到自己的手中。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根据。社会上绝大部分人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视为会让国家倒退到集权制度的人，并正确地

---

① 别洛韦日森林位于白俄罗斯，是自然保护区。1991 年 12 月 8 日，俄、乌、白三国领导人在位于别洛韦日森林的维斯库里国宾馆内签署了宣告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译者注。

认为，为了保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不会考虑推出结构性改革措施。克格勃、军队和军工综合体的领导人，加上其他一些代表人物试图夺取政权的做法，自然促进了苏联的瓦解。人们时常引用吉尔吉斯总统А·阿卡耶夫（А.А.Акаев）的话：“根据来自莫斯科的阴谋家们的命令，比什凯克郊外的卫戍部队在给坦克发动机加热，这时，还能有什么主权？”<sup>①</sup> 政变期间，8月24日通过的乌克兰独立法令被提交给乌议会。法令起首句是：“鉴于1991年8月19日在苏联发生的政变所引起的威胁到乌克兰的致命危险……”

但是，就像呈现出来的情形告诉我们的那样，政变更多是起了雷管的作用：先前的发展方式挖了苏联的墙角。

既然我谈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我想反驳那些认为是阴谋家们和戈尔巴乔夫一起上演了一场戏的人。这绝对与实际发生的一切不相符合。当由昔日的亲密战友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来到戈尔巴乔夫度假的佛罗斯，要求他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并宣布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时，戈尔巴乔夫拒绝了。当然，他可以坚持要和他们一起返回莫斯科，召开最高苏维埃，但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这一冒险的步骤。或许，谨慎占了上风，因为他担心受到对自己的肉体迫害。

我与各位分享一些我个人获得的印象，因为我自己也得以参与到后来的事件中。我和В·В·巴卡津（В.В.Бакагин）是苏联安全委员会中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极少数人中的两个。8月21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И.С.西拉耶夫（И.С.Силаев）给我们打电话，建议坐俄罗斯飞机去佛罗斯见戈尔巴乔夫。坦克开始从莫斯科的大街上撤走，显然，政变告吹了。比我们乘坐的俄罗斯飞机（同机还有А·В·鲁茨科伊（А.В.Рущкой）、Н·В·费多罗夫（Н.В.Федоров）<sup>②</sup>以及军官和冲锋枪手们）稍早一点抵达佛罗斯的，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小组成员，他们显然是决定来请求戈尔巴乔夫原谅的，不然，很难解释他们此行的动机。我们几乎是与他们同时从机场到戈尔巴乔夫别墅的。到此刻，政变彻底破产了。总统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得到了恢复，他立即开始发布命令，要求加强对克里姆林宫的保卫，采取其他措施，维护莫斯科的安全。

戈尔巴乔夫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同时坚决拒绝会见阴谋分子。他只对А·И·卢基扬诺夫（А.И.Лукьянов）是例外。他俩的谈话是当着我的面进行的——我想出去，但戈尔巴乔夫留住了我。此前，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暴怒：“你为什么不立即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你，一个我信任的人，（从戈尔巴乔夫嘴里迸出一句骂人的话），怎么

---

<sup>①</sup> Баймухаметов С. Бумеранг, или «Загадочный» крах СССР// Журналист. 2004. № 12. Декабрь.С.14.

<sup>②</sup> 当时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司法部长。

会和政变分子搞在一起？谈话结束了。出去，等待自己的结局吧”。也是在那儿，在佛罗斯，戈尔巴乔夫下令逮捕 А·В·克留奇科夫（В.А.Крючков），他是坐我们的飞机回莫斯科的，不过已经是被军官们押解了。

当我们和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时候，他的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娃（Раиса Максимовна），扶着楼梯的把手，慢慢地从别墅的二楼走下来。几天的强制性隔离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脸变得消瘦了，下眼泡肿起。

我们和戈尔巴乔夫一起飞回莫斯科，两个小时一直在说话。他不可能装，我也不是那种容易受骗上当的人……

八月政变在我国的历史中起了恶劣的作用。事变前，只有立陶宛和格鲁吉亚宣布独立。事变后，其余的共和国都群起而效之，大多数是立刻宣布独立的。如果采取果敢的措施，能够制止这一浪潮吗？政变的破产直观地显示了：谁想原封不动地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没有前途的。但是，是否还有可能保留一个共同的国家，而 12 个原来的加盟共和国能以另外一种身份存在其中（关于波罗的海三国已经不谈了——最高苏维埃正式承认它们退出苏联）呢？

М·С·戈尔巴乔夫有各种错误，但我相信，他还是希望通过签署联盟协议来达到上述目的的。可是，建议各加盟共和国签署一个保留共同经济空间的协议、而不是一个一般的政治性协议的时间错失了。我知道，在回顾历史过程时，用“假如发生了什么”这一表述法是不合适的。但是，假如在赞成保留共同国家的公投举行以后，不是采取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方针，而是循序渐进地建立一个“软”联邦，一开始仅限于建议签订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的协议，这样的话，分离主义分子就不会赢。

这样的想法曾一度在社会上酝酿。我保留的档案材料里，有 1991 年 4 月 16 日在 М·С·戈尔巴乔夫处开会的记录。在波罗的海三国人民代表中颇有影响力的爱沙尼亚经济学家 М·Л·布龙施泰因（М.Л.Бронштейн）说，在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需要区分确定经济协议和政治协议签署的时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沃伦别墅的“座谈”。当时参加的人有 С·С·沙塔林（С.С.Шагалин）、А·Н·雅科夫列夫（А.Н.Яковлев）、В·А·梅德韦杰夫（В.А.Медведев）、А·С·切尔尼亚耶夫（А.С.Черняев）、Г·Х·沙赫纳扎罗夫（Г.Х.Шахназаров）、Е·Г·雅辛（Е.Г.Ясин）等。一组人起草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总统报告。让我负责权力部分。我建议 М·С·戈尔巴乔夫在现阶段将问题归结到与各加盟共和国签署统一经济空间协议上。谈话时在场者中，许多人都支持这一想法。М·С·戈尔巴乔夫没有立刻否定这一建议，但第二天说，“不合适”。“为什么？”我问道。“那样的话，各加盟共和国将只停留在经济协议上，而不想签署已经准备好的联盟协议，大家都声明同意联盟协议”，戈尔巴乔夫说。没有考虑到各加盟共和国的现实立场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在保留统

一经济空间的情况下，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跨各共和国的机构——使用共同货币，会出现统一的中央银行；施行共同的关税政策和实践，会出现统一的关税机构，等等。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决在苏联空间保留共同国家的问题未能得到实现，而放置在苏联下面的有爆炸危险的“炸弹”则开始发生作用，这些“炸弹”有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内政外交的、战略和局势行动的。

有一批人力图把苏联破产的原因归结为改革时期的失败。包括有人提出这样的论据：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苏联在GDP总量上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他们却不说明，我们的GDP，根据官方统计，几乎只有美国的一半。B·M·库得罗夫（B.M.Кудров）教授（杰出的学者，我与他在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一起工作了多年）证实，即使按官方数据，在国民收入、工业生产、资本投入方面，苏美间的比例状况，在80年代初就要比以前差。此外，库得罗夫写道：“第一，苏联中央统计局有意识地将苏美在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总量上的比例提高了一倍。事实上，上世纪70—80年代，这一比例正好相应的是30%和40%……第二，有意识地提高了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一倍。第三，在苏联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材料中，军费开支数额被极大地降低，而居民实际收入、谷物收成和人均肉类消费等的统计数据则被极大地提高了”。<sup>①</sup>

导致苏联垮台的深层次经济原因，体现在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构性危机上。苏联时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苏联成了工业大国，开发了西西伯利亚最丰富的石油产地（直到今天，俄罗斯的石油也是从这些地方开采来的），实现了飞向宇宙，在核导弹方面与美国平起平坐。这一切都是在这样一种行政管理经济模式下取得的：它能够集中起国家被动员起来的力量和所有的潜力，建设完成这些重要的突破性工程。苏联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面普及中等教育载入了宪法，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得到发展。全国人民都在阅读，在学习。但同时，一系列满足人民日常需求的领域却走向衰弱。放眼望去，到处物品匮乏，商店货柜空空如也。这一切发生在人们觉得困难是应该可以被克服的时候，因为那样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为了实现诸如国家工业化这样的重要目标，乡村遭到破坏，农庄庄员处于没有权利的境地——他们没有护照，不能离开给他们规定的工作地点。而真正的重建国家（二战期间，她经历了可怕的牺牲和毁坏）的英雄壮举也已成为过去。人民经受住了这一切，指望这样艰难的道路能通向幸福的未来。而这一未来没有到来……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相符的时候，生产力会更为快速和有效地发展。按理，这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曾在苏联确立。但是，与这

---

<sup>①</sup>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6. 21 апреля.

一马克思主义原理显然相矛盾的，是苏联累进的落后：在非军事领域利用高科技成果方面、在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这表现得最不正常）都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是否想过改革经济模式，以克服这一落后局面呢？改革阶段，注意力曾集中在为此采取的措施上。1987年通过了苏联《国家企业法》，它开拓了在国家所有权领域生产活动主体通向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的道路。

1988年通过的《苏联合作社法》被赋予特别的意义。苏联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С·А·西塔良（С.А.Ситарян）是该法律起草委员会的主任，也是他向政治局作汇报的——这一点起了积极的作用。“没有公开地说，要有私人所有制，但是表达了在发展国家所有制的同时还要开始发展合作社所有制的想法，这是一个打破国家所有制是掌握国家资源唯一形式的重要尝试”，希塔良是这样描述苏联经济学家中进步分子的心情的。<sup>①</sup> 改革时期，另一个建议采取的变化是从总产量指标转向实现产量指标、转向作为生产动力的利润核算。

从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出发，并且考虑到当时在苏联有一批人正是根据“理论”来反对发展合作社，我在发表于《真理报》上的文章中写道：“在行政命令的经济模式条件下，这一角色（合作社——普里马科夫注）要么几乎被否定，要么沦为次要的、辅助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作出理论上的结论：必须逐步压缩合作社所有制，确立国家所有制一种形式，国家所有制据称是确定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唯一标尺……甚至像集体农庄这样一些生产合作社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生产的独立性，丧失了合作社的性质，演化成国营企业的一种变体”。<sup>②</sup>

我想提醒诸位的是，《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发表在上面的文章反映的是官方路线。在那个阶段，官方路线是运用“合作社”法，改革苏联的生产机制。

许多人指望，著名学者参与经济改革将会促进跨越式的成功，但他们等来的是失望。成立了由Л·И·阿巴尔金（Л.И.Абалкин）和С·С·沙塔林（С.С.Шаталин）领导的小组，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经济改革思想。但是，法规中的原则以及阿巴尔金和沙塔林小组提出的重要建议都没有得到落实。如果它们得以实施，应该能带来市场竞争、与国家调节机制并列的市场调节机制和经济自由。戈尔巴乔夫动摇着，他受到左右夹攻——右边指责他“改革力度不够”，左边指责他“让出社会主义阵地”。

与此同时，现实生活要求快速作出决定，通过活跃农业生产、贸易、服务来加快经济增长，为改善居民福利创造条件。这些任务没有完成。经济改革的努力进入了死胡同：如果工业的命令式调控受到动摇的话，那它并没有带来急剧的变化——

<sup>①</sup> Ситарян С.А. Уроки будущего. М.: Изд.д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0. С.73.

<sup>②</sup> Правда. 1988.20 марта.

这些变化能导致在大中型工业中、尤其是市场竞争中国家和私人的合作。

从国家预算里大量扣款加重了经济形势的恶化，平庸的反酗酒运动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些客观原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悲剧性事故、亚美尼亚的可怕地震和改革阶段正好遭遇的石油价格剧烈下跌等，从 70 年代开始，苏联已经坐到了“石油针尖”上。

不能不谈到的是，不仅在后来的改革时期，而且，在此之前，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就曾试图寻找到方法，走出行政命令经济模式的危机。但是，每一次的尝试都不成功。1965 年，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А·Н·柯西金（А.Н.Косыгин）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改革无果而终。1968 年，事实上放弃了将企业的经济刺激、工人对生产效益增长的兴趣和把利润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标准等摆到首位的做法。

柯西金改革是客观形势——此前 Н·С·赫鲁晓夫（Н.С.Хрущев）时期经济改革失败——发展的结果。在赫鲁晓夫当政的最后几年，“上头”就开始了摆脱唯意志论经济政策的斗争，其高潮是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集体农庄国有化、在地方上将党的机构分为管理工业的和农业的两部分。1962 年 9 月 9 日，《真理报》刊登了哈尔科夫大学教授 Е·Г·利别尔曼（Е.Г.Либерман）的文章，标题很有特点：《计划、利润、奖金》。文章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不仅如此，在国外，利别尔曼被称作是后来 1965 年柯西金改革的真正设计者，在国外的文献中，甚至出现了苏联经济“利别尔曼化”的术语。

这篇文章出现的时候，我正好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在发表之前，对中央发来的、指示要将其扩展为文章的利别尔曼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作了多大的加工。可以大胆地确认，这篇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正是因为中央政治局——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的一部分人坚持这样的观点：必须为统一计划补充运用刺激企业和工人的方法。利别尔曼本人也证实了这一点，几年后，我和他在开罗相遇，他在那儿任《真理报》记者。<sup>①</sup>

在苏联经济改革方面，我们显然是不走运的。主要是那些与当政者为加强自身权力而进行的内部政治斗争有关的主观因素导致了改革的收缩。政治局中的保守派，首先是 Н·В·波德戈尔内（Н.В.Подгорный）和 Н·А·吉洪诺夫（Н.А.Тихонов），极端仇视柯西金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又火上浇油。Н·Н·伊纳泽姆采夫（Н.Н.Иноземцев）当时和 Л·И·勃列日涅夫（Л.И.Брежнев）很接近。他告诉我，总书记担心“布拉格之春”对我国的影响，因而在态度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苏

---

<sup>①</sup> 利别尔曼教授是应 Г·А·纳赛尔的请求来到开罗并与之一对一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谈话（他们用英语交流），讲述苏联的经济改革。与在西方流传的看法相反，纳赛尔是一位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验非常感兴趣，其中的一些内容他想运用于埃及。



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前，勃列日涅夫对伊纳泽姆采夫说：“尼古拉，咱俩是前线战士——要坚决地打破经济上的枷锁”。后来的谈话，用伊纳泽姆采夫的话来说，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勃列日涅夫在任命吉洪诺夫代替柯西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时说的那句话很有名：“现在我对我们的经济很放心”。

但是，能使人放心的理由很少。柯西金改革遭遇收缩以后，苏联科技进步迟缓了，企业设备的磨损加大，劳动和技术纪律恶化，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当时关于这些，知道得并不多，但Ю·В·安德罗波夫（Ю.В.Андропов）即将采取措施实施经济改革。在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之后，他请来中央书记Н·И·雷日科夫（Н.И.Рыжков）、М·С·戈尔巴乔夫和В·И·多尔吉赫（В.И.Долгих），要求他们起草改革国家经济机制的建议。一些经济学家也被请来参与这项工作。工作组提出的综合性建议包括最大限度地发展企业生产自主，不仅在农业领域、而且在工业领域发展经济的合作社成分，将国民经济管理机构的重点从生产活动转向经济活动。Ю·В·安德罗波夫批准了结论性文件，当时，他已经住院了。他希望与工作组会面。但会见未能进行——Ю·В·安德罗波夫去世了。С·А·西塔良写道：“我现在确信，假如那时就开始实施我们的经济改革建议，那国家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但是，历史是无法假设的”。<sup>①</sup>

自然，每次改革在进行的时候也都会暴露出自身的不足，这次改革在开始之前和进行过程中也是这样。但是，通过定向消除这些不足和耗费以逐步摆脱行政命令模式的情况没有发生。

我不希望人们把我当作这样一个人：不仅看不到我国在苏维埃时期取得的成就（这样的人不多，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国人民被迫付出的代价上），同时否定苏联经济模式的正面性，首先是计划、工业政策、国家控制经济机制的能力。所有这一切（在没有进行任何使之适应市场条件的尝试的情况下）都被新自由主义者在90年代上半期错误地抛弃了。

我也理解，构建这种或者那种苏联经济模式的可能性都是有极限的。国家是在被敌对势力包围的条件下发展的——这是事实，而且，我并不认为，我们是造成敌对情势的主要原因，尽管我们自己也曾对此推波助澜。结果，生产能力、技术潜力、预算投资的大部分都用于装备军队。到最后，肩负着确保人们生机活力的生产和服务领域的发展也大受影响。同时，国家经济事实上处于孤立隔绝状态，靠自给自足发展——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降到最低，这极大地减少了通过竞争来获得科技进步的成果。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经济才进入半开放状态，不过，主要是靠

---

<sup>①</sup> Ситарян С.А. Уроки будущего. С.74.

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

纯粹的人的因素也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在“铁幕”倒塌之后，人们开始更多地去国外旅行，与来我国的人交往，对商品——包括必需品——始终匮乏的不满在增长。影子经济在扩大。杰出的讽刺演员阿尔卡季·拉伊金（Аркадий Райкин）出色地诠释了“匮乏”主题，在演出中展现了“社会中最受尊重的人”——商店经理的形象：与他结识、特别是与他发展友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性。

苏联公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符合分离主义者的利益——许多人相信他们：情况不断恶化，原因是俄罗斯联邦利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自然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种说法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特别有市场。各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以后，现实生活表明，这种观点与事实是如何地大相径庭——从所有指标来看，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要比新的主权国家好得多。2008年，俄罗斯人均GDP是乌克兰的3倍、摩尔达维亚的6.6倍，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的11—16倍。

1990年，格鲁吉亚电视台对我进行了采访。播出后，我的许多第比利斯朋友感到疑惑，甚至因我下面的话而责备我：“我知道，你们有极其出色的经济学家，让他们预测一下‘独立的’格鲁吉亚的贸易和支付的平衡，计算出国家对主要能源、原料、金属、食品的需求，让他们看看，这些需求中有多少是通过内部资源得到满足的，还必须花费多少钱按世界价格来购买其余的部分。如果还要加上维持武装力量、政府部门和海外机构的费用，还有用于教育、文化、发展社会领域的必须的开销呢？”

但愿人们不会责备我说，我曾经或者现在还反对格鲁吉亚独立。这里讲的，只是对在统一经济空间中存在着为格鲁吉亚带来的好处的清醒评价。在这一空间里，俄罗斯能够起中心作用。

毫无疑问，苏联解体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危机。它是由国家结构中长期缺乏联邦制而引起的。В·И·列宁（В.И. Ленин）不是从一开始，而是在他罹患绝症前的最后几年才明确地站在反对建立单一制国家的人一边的。这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其中不仅有对一批中央领导人（而且，一般来说，是非俄罗斯族的）对待“民族共和国人”的沙文主义态度的批评，而且明确强调联邦制。

接下去，“展示式的”、“橱窗式的”的联邦制方针取得了胜利，这种联邦制反映在一部接一部的宪法中。但实际上建立起来的是完全集中的、单一制的国家。加盟共和国只是被宣布为是拥有主权的、自治的。而事实上，一切或者几乎一切都听命于莫斯科。

不应该否认，苏维埃时期为发展各民族的文学、艺术、电影、戏剧、教育和卫生创造了条件。各加盟共和国知识分子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地方上，科学、工业得到发展。但一切都是由中央领导的。甚至在加盟共和国建设这个或者那个企业这

样的问题，也常常不是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而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讨论决定的。在这方面，在鲁斯塔维（格鲁吉亚）建钢铁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矿石也好、能产焦炭的煤也好，都不得不从很远的地方运来。但钢铁公司的建立能在“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共和国里培育并巩固起真正的工人阶级队伍。

中央还制定并发出必须无条件执行的干部政策。如果加盟共和国的一号人物，就像现在所说的，是“主体民族”的代表，那么共和国党中央的第二书记就都是由从莫斯科派出的“总督”担任。有时中央也派第一书记：卡加诺维奇（Каганович）、随后是梅尔尼科夫（Мельников）被派往乌克兰，勃列日涅夫先是被派往摩尔达维亚，随后去哈萨克斯坦，等等。“主体民族”人物一般不在加盟共和国克格勃的领导岗位上任职。但是，党的机构和克格勃是各加盟共和国实际上的主人，这一点谁都清楚。还有什么可说的，不光是主席，就是共和国政府成员、国内大企业领导，都是由莫斯科任命的。事实上，稍微重要一点的任命，都要和中央商量。

这样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改革时期。例如，1986年，Г·В·科尔宾（Г.В.Колбин）被推举担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科尔宾当时任乌里扬诺夫州委书记，此前与哈萨克斯坦没有任何关系。Н·А·纳扎尔巴耶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说实话，没什么可讨论的，我们中没有人了解他。所有的人都陷入到某种被催眠的状态。党中央全会也是在这样一种中了魔法般的状态下进行的，全会过程用了18分钟。所有的人都举手赞成，科尔宾成了第一书记。盲目听从中央综合症、战时心理综合症（‘我们——只是党的战士’）又占了上风。谁也没有想过后果，而后果很快就显现了”。<sup>①</sup>当地居民举行了群众游行和集会，反对对科尔宾的任命。为了阻止游行和集会，当局出动了军队。

议会“联邦垂直线”事实上是怎样运作的呢？每个共和国都有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下发的、以来自莫斯科的工作人员代替加盟共和国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调配名额（任命候选人与纯形式上的代表选举是一致的）。例如，当决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应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后，我就由吉尔吉斯选出了。完全可以理解，差额候选人是没有的。

俄罗斯也开始加入到“自主大游行”当中是理所当然的。要独立，反对消融在联盟里的心情，又加上了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团结在自己的管理机构下的愿望。当自己的广袤地区——非黑土地带、外乌拉尔、远东——陷于经济衰退的时候，俄罗斯还依然作为供应者——俄罗斯民众对此的不满也在不小的程度上表现出来。

我记得在政治局讨论这些问题时的情形。首先听到的是这样一种担忧：俄罗斯

---

<sup>①</sup> Назарбаев Н.А. Без правых и левых.М.,1991. С.179.

的分离会削弱、可能还会摧毁苏联赖以存在的“俄罗斯核心”。这是现实的威胁。但是，那些被加盟共和国“主权化”扯动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里传播的情绪也是现实的。成立俄罗斯共产党的问题成为中心问题之一。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除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外，尽管是形式上的，都有自己的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一员。俄罗斯则没有，因为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总是担心（并非没有原因），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会导致另一个中心的出现，而这个中心，无疑会与苏共中央平起平坐，或者将后者置于次要地位。

正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建立一个与苏共中央平行的中心”成了苏联时期最可怕的罪名之一。对 1949-1950 年间捏造出来的“列宁格勒事件”所牵涉到的人——列宁格勒市的党政领导，就提出了这样的指控。对季诺维也夫（Зиновьев）和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的审判也与此有关。过去，这样的指控都是无中生有。但这次，为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而发生的运动成了现实——它眼看着在扩大并且开始获得组织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对立是无用的。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中央候补书记，包括我在内（当选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 И·К·波洛兹科夫（И.К.Полозков）后来也写到过这一点）都赞成正式支持建立俄共的主张。也有人不同意，但是支持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人取得了胜利。中央政治局没有反对大多数党员群众的意志，但这在客观上加强了苏联国内的离心倾向。不过在当时，其他的解决办法确实没有。

这时出现了俄罗斯的另一中心，以 Б·Н·叶利钦为首，他确定的目标是：先在越来越无组织的苏联的框架内、然后则是在没有苏联的情况下，通过俄罗斯成为主权国家，最终获得权力。叶利钦赢得了争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斗争，随后成为俄罗斯第一任总统。1990 年 6 月 12 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的声明，声明中强调俄罗斯联邦法律优先于苏联法律。

从这一刻起，考虑到俄罗斯在苏联经济和政治中的真正地位，可以现实地说，国内存在着两个中心。我能够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1991 年 8 月 22 日夜里，从俄罗斯回来后，就在机场上，戈尔巴乔夫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我，说早上 9 点在克里姆林宫里等我们。我们急急地集合在一起，首先讨论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选。选择了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М·А·莫伊谢耶夫（М.А.Моисеев）和克格勃副主席 Л·В·舍巴尔辛（Л.В.Шебаршин）。这两人都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关系，也不参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对立。舍巴尔辛领导侦查部门，知识丰富，有经验和智慧。总而言之，候选人是合适的，戈尔巴乔夫也认可了。但是，后来知道，只过了一昼夜，情况就变了。因为，叶利钦（照理，对此他是没有任何

权力的)任命了其他人。戈尔巴乔夫同意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私人关系,因为一些“信任的联系”稍稍得以缓和,但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双方圈子里有影响的人物加重了两人间的不和。

这一切都是在党(它是把苏联团结为一个整体的力量)的作用衰退的背景下发生的。我敢肯定,即使在1990年3月14日苏联宪法第六条(“苏联社会的领导和管理力量,其政治体系、国家和社会机构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被取消以后,苏共也能起这样的作用。但是,保留苏共作为确保苏联统一的机制,其必要的条件是党本身的民主化。而民主化也会导致思想多元化和多党制。

在民主化条件下,苏共在全苏多党制的天地里依然能够成为主要力量。这是有重要基础的。在改革时期,要求苏共民主化的表述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包括第19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但是,为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中做到这一点,需要打破对党员基本群体的束缚,坚决废除存在了几十年的体系,该体系依仗党的机构的无限权势,将党的纪律解释为不可以表达未被党的文件或领导人奉为准则的想法。

制约党民主化的主要力量是党的机关,在斯大林时期,它实际上位于选举出来的党的机构之上。Л·А·奥尼科夫(Л.А.ОНИКОВ)在党中央工作了30年,对党内生活了如指掌。他说,选举出来的党的机构成员有时接触不到机密文件的内容,但机关工作人员却能看到。党的机关这种居于首要地位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党的区委、市委、州委,还涉及到中央委员会成员。例如,“真理报”主编А·М·鲁缅采夫(А.М.Румянцев)将自己一篇纪念出版日的文章初稿寄给中央委员会(根据章程,作为中央委员,他有权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后,收到了信使转来的中央总书记助理所作的重大的内容上的修改。鲁缅采夫撤下了已经排好的文章,并就此给中央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很快,他便被从“真理报”调往科学院了。

在改革已经开始之后,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还试图把一份最高苏维埃各委员会领导人的推荐名单硬塞给作为苏共中央委员的我(我当时担任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做的。

当对于党内事务进行民调成为可能以后,苏共中央属下的社会科学院在1989年5月举进行了一次劳动群众的问卷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怀疑党能进行自身改革。而73%(!)的共产党员认为,在党的机关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的品质和才能都是中等和低下的,<sup>①</sup>而正是他们在管理着党的事务。

各级机关人员都担心,党的民主化不仅会使他们失去发号施令的权力,还会使

---

① Бойков Ж.Ю., Тощенко Ж. Посмотрим правде в глаза// Правда. 1989.16 октября.

他们失去他们享受的特权，所以他们反对党的民主化，并在总体上反对社会改革。而戈尔巴乔夫则怕触动已经形成的党的机制。28 大上实现的组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新原则成为唯一的“创新”：政治局成员中的主要部分由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组成。显然，党的领导的权力下放被看作是顺应时代的表现，这一时代的特征是各共和国的独立。然而，按担任职务原则组建党的最高机构的做法削弱着党作为国家统一者的作用。

1990 年 1 月，“苏共中的民主平台”建立起来了，它支持党内的重大改革。但结果发现，这一平台不仅在党的机关中没有根基（这可以理解），在党员群众中也没有根基，党员群众距自我组织还很远。存在了半年多一点时间后，“民主平台”退出苏共，还是没有达到宣布所要达到的目标。

在失去由宪法保障的社会主要角色的地位之后，党无法通过民主途径再次获得这一地位。事实上，苏共并未准备好认同在党内存在着思想观点不同、但同样追求改革的力量，认同党外的政治多元化。新的思想基础的缺失也负面地显现出来了，无法用“带有民主特征的社会主义”一类的箴言来代替这一基础。

党的队伍，特别是在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即 28 大以后开始瓦解。后来，戈尔巴乔夫承认，没有坚决地进行苏共民主化是个错误。他也拒绝对党进行划分，从中区分出“改革派”成员——200 万至 300 万人。

外部力量在苏联解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和许多人一样，在生活中遭遇过美国削弱、动摇苏联的企图。其他一些国家也曾酝酿过类似的目标。但是，一个核大国的衰颓未必合它们的意思——这个大国以打破稳定或者在几个脱离苏联的原加盟共和国的土地上保留核武器相威胁。要知道，这一切都可能在苏联解体的情况下发生。对这种前景的担忧令我国的许多敌人却步。

同时，在帮助苏联走出经济困境方面，西方甚至“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困难至极的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苏联的解体。1991 年 7 月，我作为“夏尔巴人”<sup>①</sup>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各国元首和各自的“夏尔巴人”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们隔开，讨论的记录只得由我和其他“夏尔巴人”自己来做。我觉得，“七国集团”方面的讨论是事先设计好的，善意是无疑的。完成制定“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条约”后的狂喜和为此对戈尔巴乔夫和布什的祝贺，对苏联遇到困难同情，对戈尔巴乔夫的赞扬语非常到位。但是，没有关于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经济支持的谈话。而且，美国和它的伙伴们显然都没有想过要讨论这件事。然而要知道，许

---

<sup>①</sup> “七国集团”以及后来的“八国集团”国家领导人的助手。每位可以有一个“舍尔帕人”。这一名称源自尼泊尔、印度的舍帕尔人，他们在当地作为向导和脚夫，协助他人攀登喜马拉雅山。

多人的多少希望与此相联啊……

我想用杰出的俄罗斯作家 А·И·索尔仁尼琴 (А.И.Солженицын) 的话来结束这篇关于苏联解体的文章。索尔仁尼琴, 自然是很难被认为会对共产主义和苏联式的集权实践怀有好感的。他说: “一直觉得: 哪一天苏联瓦解, 将会是多大的喜悦啊! 可结果弄出了这样可怕的瓦解, 以至于没有喜悦可言。这样郁闷地看着屏幕”。

(贝文力 译)

---

**【Abstract】** In the referendum of the Soviet Union, on 17th, March, 1991, 76% of the population still vot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union. While, no more than nine months later, Belovezhskaya Forest Statement stated that the Soviet Union ceased its existence. Provided that a soft federation was established gradually, rather than policy of founding a sovereign state union being adopted, separatists would not reach their aims. “8•19” Event was more of a detonator. Previous development mode undermin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viet. The deep economic reasons on the breakdown of the Soviet are reflected on the structural crisis of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And another paramount reason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is the relation crisi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allied republic countries, which was triggered by the lack of the federation in the country structure in the long-term. The mechanism of retaining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s assurance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has its prerequisite as democratization of the Party itself. The main force that restraine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Party comes from the organs of the Party, which were abov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elected Party. As for helping the Soviet out of economic predicament, the West even “did not move its fingers”, while the austere economic situation, to a large extent, doom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Key Words】**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8•19”Event; federation system; reason

**【Аннотация】** 17 марта 1991 г. на Всесоюзном референдуме 76% населен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выступали за сохранение единой страны. Но менее, чем через 9 месяцев после этого в Беловежском соглашении было объявлено о том,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кратил сво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Если бы после референдума не придерживались принципа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сувер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а шаг за шагом создавали «мяг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и 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только подписали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оздании еди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тогда бы цель сепаратистов не осуществилась. Инцидент 19 августа сыграл важную роль детонатора. Предыдущие

подходы к развитию прорубили щель в стен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Это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глубин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ичины крах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тразились в кризисе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ризис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отсутств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центра с федеральными республикам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является другой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ой причиной развал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условием сохранения КПСС в качестве механизма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единств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являлась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 самой партии. Основной сдерживающей силой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являлись партийные органы, которые фактически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д выборным партийным аппаратом. В вопросе оказания помощи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юзу в преодолен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трудностей Запад «даже пальцем не пошевелил».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слож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основном обрекла участ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азвал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нцидент 19 августа,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ичины

---

(责任编辑 常喆)



## 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C·卡拉—穆尔扎\*\*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周到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20世纪60—70年

\* 本文为卡拉—穆尔扎2011年4月出版的新著《危机中的社会科学》(Кризисное обществоведение.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Курс лекций. Москва: Научный эксперт. 2011)中的第21讲。经作者授权，由《俄罗斯研究》独家中文发表。

《危机中的社会科学》采用了讲座体，其核心观点是：苏联解体及当代俄罗斯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理性（实用的、科学的）的社会科学之不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工业社会的核心知识应该是理性的、科学的，仅拥有传统的知识并不够。而苏联的社会科学从方法论上讲更接近于自然哲学，而不是科学。它未能预见到20世纪末期给苏联体制带来灾难的系统性危机。后苏联时期的社会科学同样深陷危机，甚至无力解释现实问题。因此，应该建立起新的社会科学体系。

\*\* C·卡拉—穆尔扎 (С.Г.Кара-Мурза)，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理论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 20 世纪 20 至 50 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关键词】** 苏维埃制度 苏维埃构想 苏联解体 原因

**【中图分类号】** D503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1)05-0040-(19)

---

## 导 言

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什么是“苏维埃制度”以及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维埃制度的合法性遭到动摇，在公众意识中不再积极友善地认同其存在？在 16 世纪，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sup>①</sup>就明确了——政权的维系在于武力和认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sup>②</sup>将此理论进行了发展和补充——认同应当是积极的。如果民众消极地支持着一个政治体制，那么这就足以使一些有组织的相关力量推翻这一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1990—1991 年，苏联民众的公众意识并不是反苏联的。人们希望苏联社会结构的主体予以保留并有所发展，但是这种希望是消极的。所以，这种社会结构注定走向灭亡。

我们有灾难的经验、苏维埃制度失败的经验。20 年来，我们明白了很多。然而，

---

①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人物，其名著《君主论》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译者注

②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意大利著名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文社科多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葛氏提出“霸权”（Hegemony）概念，认为统治阶层不能单靠力量（force）维持其权力，他们必须要使人民对现存的情况产生同意（consent），甘愿接受统治阶层的统治。为此统治阶级必须考虑被统治者的利益，注意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然后对人民作出让步（concession）。——译者注

仍然有一系列未解之谜，不过，我们有办法去解开它们。对此，我会用粗线条去绘制我们这幅画，而不是使用细节去描绘。细节将在整个课程过程中予以补充。

叙述的困难在于，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这要求我们努力去摆脱固有的条条框框。官方苏联史“爱护”着我们，让我们不去进行深刻的思考，并用简化的、使人平静的刻板公式来教育我们。而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甚至没有从内战中得到教训。例如，我们没有思考，为什么两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内战中分属不同阵营。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受业于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国民经济学院，而普列汉诺夫认为十月革命是反动的。难道这还没有代表性吗？我们现在才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亚洲的力量”，而当时，孟什维克认为自己是“欧洲的力量”。

叙述是困难的，因为我们通过教育所获得的是西方概念的语言（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而非西方社会的疾病和快乐无法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但是，让我们一起努力，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来看待苏联的灾难，并用自然的语言，而非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讲述。

总之，是关于过去的那些事。

## 苏维埃制度与苏维埃构想

苏维埃制度（советский строй）——这是俄国所担负的、并在其历史文化轨迹中蕴含的文明构想的实施。应当区分苏维埃构想（советский проект，关于美好生活及其实现道路的概念）和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在实践中具体表现）。虽然，构想中所设计的许多内容由于历史环境无法实现，但是，其中很多仍得以实现——甚至今天仍是成功的。另外，还应当明白一点。苏维埃制度存在了 70 年。但在动荡的 20 世纪，其跨越了好几个时代。苏维埃制度在一些困境中的稳定性和在另一些困境中的脆弱性说明了很多关于人、社会和国家的问题。

苏维埃构想——这不仅是社会构想，还回答了处于“西方的锤子与东方的铁砧之间”（Д·И·门捷列夫，Д.И.Менделеев）的俄国，由于其横跨欧亚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的存在问题。一边是强大的西方，其对存在问题的回答是市场化的社会和理性人、个体——新教改革的核心之一；一边是正在崛起的强大的东方，我们仅仅刚开始了解其对于存在问题的回答。

苏维埃构想影响到了所有大的文明构想：帮助了西方社会国家的发展，打破了殖民体系，抵消了法西斯主义的诱惑，为现代形态下亚洲文明的巩固和自我意识贡献颇多。

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它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社会 and 人的新状况。苏维埃构想“疲劳过度”了。在这种情况下，它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另一方面也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社会三股力量的联盟：一部分苏联共产党成员、一部分知识分子（“西欧派”）和一部分犯罪分子。

无法从构想被扼杀的事实中得出可以认定其错误的结论。通常，带斑疹伤寒的虱子叮咬了聪明、强壮、漂亮的人后，这个人会死去。无法就此人的品格、甚至是健康状况得出任何结论。从苏联灭亡的事实中，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苏维埃制度的防护体系不坚固。这一结论很重要，但是在此之上，无法与苏维埃制度的其他体系建立关系。

给苏维埃制度加一个标签并没有意义——诸如，社会主义、“兵营式封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等。这些定义只会导致繁琐无益的争论。我们将从表面现象出发：苏维埃制度是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国家安排好生活——具有自己的经济类型、国家类型和国家社会生活类型。我们知道，人们怎么生活、患什么病以及害怕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以简单而生硬的概念看，这一体制的主要结构是怎样被摧毁的以及其结局，从其中应当认识到苏维埃制度并构建出它的形象。

苏维埃制度是怎么出现的？我们不准从古代开始追溯这一问题或是深挖几个世纪，即便其根源确实在那个时代。从 20 世纪开始就够了。虽然，20 世纪初的俄国已处于早已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但其仍是一个传统社会（而非西方社会、公民社会）。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虽然带着伤痛，但掌握并同时“消化”了西方的制度和技术——而并未丧失自己的文明特性。这是基础性的论题，这一论题在 20 世纪所有社会冲突时期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时至今日，其仍在延续着争论。

1905-1907 年的俄国革命是传统农民社会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破坏行为（反对解放农民）而引发的世界革命的开端。在西欧，这些“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或者是反革命、旺代农民起义<sup>①</sup>的类型）遭受失败，而在远离世界中心的边远地区——获得了成功或者影响到了历史进程。这包括发生在俄国、中国、印尼、印度、越南、阿尔及利亚、墨西哥的革命，以及近些年发生在古巴和伊朗的革命——遍布所有的“非

---

<sup>①</sup> 旺代位于法国西部，根据不同的地形被划分为上旺代和下旺代两部分。下旺代临近海岸，主要由沼泽地组成。上旺代则是森林稠密的地区，大部分人口散居在各个相互隔绝的小农场和村舍里。这里同外部的交往并不多，新思想很难渗透到这些地区来。这些纯朴、强悍、迷信宗教而又忠于旧秩序的旺代农民，对于与他们的地位无关的革命是无法理解的。更何况大革命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夺走了他们精神上的慰藉者。“旺代农民起义”从 1793 年 3 月 10 日下旺代的马什库尔起义和上旺代的圣弗洛朗起事开始，到 12 月 23 日旺代军被彻底击溃为止，历时 9 个月，辗转了旺代、曼恩—卢瓦尔、普瓦图、昂儒、布列塔尼、诺曼底等广大地区。这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发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旺代农民的“愚昧”、“保守”。从最直接的现象看，它实起因于共和国政府的政策与农民的传统情感之间的冲突，共和国政府的过激政策无疑应负一定的责任。——译者注

西方”世界。

由马克思主义者于 20 世纪初所建立的模式，对理解俄国而言，是合乎逻辑的：俄国应当走同西方一样的道路。而创造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概念的民粹主义者（在他们之前的巴枯宁）没有采用这一模式。但是，民粹主义者被马克思主义者击败了，并在 20 世纪初，民粹主义者的继承人分成了宪政民主党人（资产阶级自由派—西欧派）和社会革命党人。

在 1905 年革命过程中，列宁（В.И. Ленин）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关于俄国模式的论述，并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将农民阶级视作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力量的观点。这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决裂。在 1908 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Лев Толстой как зеркал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一文中，列宁对俄国革命进行了新的论述，认为这不是为资本主义消灭障碍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农联盟的革命，其目的在于争取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孟什维克们不接受这一理论，与布尔什维克的冲突加深了。

在资产阶级自由派革命（1917 年 2 月）后，二月革命被十月革命所扑灭、以及“二月与十月”内战之后，没有自由派装饰的传统社会以苏联的形象得以在俄罗斯复现。很大程度上，苏联社会比革命前更加传统（更加具有公社性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社会对于启蒙和现代化的理想更为开放。

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在 1905-1917 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20 世纪 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在这些时期，选择的范围十分小，机会的走廊十分狭窄。环境的压力比理论学说（这些学说调整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并被用来为选择进行辩解）更为重要。选择的主要因素是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1941-1945 年的卫国战争和战后恢复时期成了对苏维埃制度所有子体系的可靠测试。

## 经济类型

有关苏联经济体系的描述不清，难以理解。就其实质和范畴的讨论从 1921 年一直延续到斯大林去世。在讨论进行了 30 年之后，也就是直到 1954 年——斯大林去世之后，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才编写成功，这说明用价格理论去思考苏联经济是多么不容易！苏联经济的现实并不见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作为意识形态而被官方接受的理论框架下，无法成功解决这些矛盾。由于客观原因（执政党以及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是马克思主义培养的）以及政治合理性的要求，摒弃理论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社会学体系。

因此，20世纪50年代所运用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伪市场”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显然是一种无法与经济现实相匹配的理论模式。当Н·И·雷日科夫（Н.И.Рыжков）政府在1989—1990年，通过立法破坏苏联经济体系时，其并不清楚，这将导致何种后果。在高校和大众政治教育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产生了巨大的意识形态效果。直到斯大林死后，劳动价值理论成为官方的理论，并开始流行一种观点——苏联的工人创造剩余价值，所以，他们就成了剥削的对象。尽管违背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开放”成了下一个（合乎逻辑而又不可避免的）步骤，而剥削阶级则是国家公仆（苏共特权阶层<sup>①</sup>）。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开始接受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的反苏理念。

苏联经济的整套学说是错误的。政治经济学将经济视作在买卖基础上运作的平衡器。但也有其他的经济类型，在这些经济类型下，价值和努力是不断累积的，而得不到交换——因为所有的参与者被当作一个整体。这样的例子有家庭经济和农民庭院经济、苏联计划经济。这种没有买卖的资源累积使苏联经济在1941—1945的浩劫之后得以快速恢复。194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超过战前水平（能不能向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推荐这一做法？）。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因为从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是，专业化和分工——效率的源头。这个合理的推论具有原理性，我们忘了，整合（соединение）与协作（кооперация）——也是效率的源头。怎样的组合更加有利——这取决于具体情况。结合俄罗斯的实际，较之交换和竞争，整合与合作更具有效率；它们在经济中具有优势。苏联经济的能力就在于此，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这一点。

经常有人说，苏联经济的缺陷在于其国有制。是的，国有制影响了一些方面的发展。但是，国有制过度根本不是体制的恶疾，进一步说，并不是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体制的崩溃。改革结束前夕，所有制问题并没有波及社会大众，也不能成为否定苏维埃制度的原因。甚至今天，在大众意识中，主要的生产资料并未实现私有制。

按自身标准看，苏维埃制度是非常有效的。根据“价格—质量”关系，整个经

---

<sup>①</sup> 苏联特权阶层是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地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这个特权阶层，俄语中是用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这个词来表示的。从字面上来说，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nomen”，意思是人名名单或者品名清单。借用到俄语中，这个词指的就是职务名册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讲，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作为集合名词，也可以指上级任命的干部。这个术语最初是指在各个领导机关之间进行的职能分配。在进行职能分配时，这些机关必须进行任命的高级职务也被分别作了登记。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面。有学者按照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原则曾将此概念译为“罗名制”。本文因其特指纳入“罗名制”体制中的官僚而统一译为“苏联特权阶层”或“苏共特权阶层”。——译者注

济为之努力而制造出的复杂商品在全世界都无出其右（例如，武器、铝、药品、地铁）。

坚信苏联经济落后的神话。这是意识形态的神话，从来没有任何明确的指标和标准作出这样的评价，对此从来没有专家的正常讨论。源于我自己对于西方农民经济的了解，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将这些农民置于与我们的集体农庄农民相同的自然和资源条件下（土壤、机器、基础设施、道路等条件），他们（西方的农民）的产出低得多。

如今很明显，俄罗斯农民较之西方农民更能适应俄罗斯的条件。俄罗斯农业由苏联模式转型为西方模式导致其产量下降了 50%。在转型后的 15 年里，从未达到过苏联时期的水平。估计在现有制度下也达不到苏联的水平。

有一个明显的指标：集体农庄每 1000 公顷土地有 11 辆拖拉机——欧洲的一般标准则为 120 辆。有别于欧洲的是，苏联的农村总是在对城市进行补助。粮食（谷物）进口是苏联富裕的标志，而今天大量的粮食进口则是贫穷的标志。

苏联经济被军备竞赛所耗尽——这几乎是公认的论断。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是宣传蛊惑的结果。苏联经济可以胜任军备竞赛：根据 CIA 估计，军费开支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在下降。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用于军事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5%，1960 年——10%，1975 年——6%。在改革前夕，武器采购约合苏联居民终端消费的 5%。这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制度崩溃的原因。

石油价格波动也未发挥重要作用：苏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开始一直稳定在 3%—4% 的年增长率。在那些年的技术体系中，其增长受制于劳动力储备的不足。但，这种稳定的发展快于美国。

## 分配和消费

分配的类型源于苏联的所有制关系，这种类型包含了平均主义的成分——不仅按劳分配，还按照“人头”分配。其机制为：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较低的食品价格、较低的交通和文化产品价格。通过这些渠道，人们作为公社（苏联）成员获得最基本的福利。人们理应拥有这样的民法权力。所以，根据公有制，每个人会有相同的红利。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苏联成了收入差距小、公平程度高的“中产阶级社会”。20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十等分系数在 3.0—3.5 的幅度内波动。

在苏联，基本的物质需求得以满足，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同等资源潜力和发展水平所能达到的程度更高——经济非常节约。对于理解苏联经济而言，开始于 1989 年、

目前仍在进行的试验十分重要。试验的目的在于——将苏联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在试验过程中，获取了大量经济理论方面的新知识。只有在打破某一物品时，才能知道其内部构造并获得基础性的认识。

1988-1990年，对金融体系和消费市场的破坏引起了休克，政客们借此消灭苏联。危机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而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的。消除计划体系（无论是谁干的）导致了这一结果——在细节上，一些更糟了，一些更好了。叶利钦以其力量反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压力，延缓了破坏苏联经济结构的速度。

##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摆脱20世纪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就像完全摆脱动员状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这些政治危机的严重性由于冷战而深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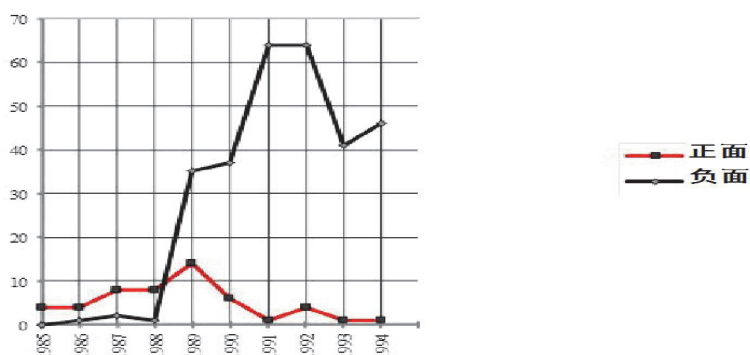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起，在社会一部分群众中，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消灭苏维埃制度的方案。19世纪中叶，在自由派—西欧派流派中，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流派中，俄国文化中就具备了这一方案的基础。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六十年代人”更新并发展了这些基础。然后，三个不同政见者派别——社会主义者—西欧派（萨哈罗夫，А. Д.Сахаров）、保守“民族主义”者（索尔仁尼琴，А. И.Солженицын）以及爱国者—民族主义者（沙法列维奇，И. Р.Шафаревич）也进行了更新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革命理论为基础，确定了新时期反苏斗争的操作法——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通过“分子侵入”意识，摧毁苏维埃制度的文化霸权。

知识分子精英，包括苏共精英（苏共特权阶层），走上了与西方左翼相同的道路。欧洲共产主义者（西方三个主要共产党的领导层——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意识到，由于其文明的排斥性，不可能将苏维埃构想照搬到西方。当他们持反苏立场——排斥苏维埃制度和苏联本身时，他们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导致了这几个政党的垮台。当我们的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越过“第一个”苏维埃构想时（正像孩子必须越过父亲一样），同样持反苏立场。这导致了苏联的崩溃（在此，我们不谈其中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贪赃枉法那部分的作用）。

虽然，在研究改革时，有很多“空白点”，但有一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改革——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场革命违背了劳动大众的利益和理想。没有苏共上层对于媒体的绝对控制，这场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1988年，反苏出版物的“水龙头被打开”，积极评价苏联的出版物、甚至结构性批评苏维埃制度的出版物减少并被过滤掉（参见下图）。





图一 《旗帜》和《新世界》杂志上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数量

——改革一开始受到社会的热情支持，因为社会发展超出了苏维埃制度在第一阶段建立的政治结构。正如列宁和斯大林与预料的那样，被迫于第一阶段建立的封闭的执政阶层（特权阶层）导致了等级关系的恢复。然而发生了中断，正是那部分有机会成为国家财富所有者的“特权阶层”掌握了进程。

——改革是冷战的一部分。美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将其视作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

## 得到的结果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经济体系遭到破坏（“私有化”），接着发生了灾难性的危机。出生率下降以及死亡率升高，是民众对于改革的本能反应。

应当提醒一下，通过下列项目而节约出的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资金都被消耗于俄罗斯的改革。这些项目包括：

- 停止军备竞赛；
- 停止阿富汗战争；
- 停止所有大型投资项目；
- 缩减社会项目
- 15年里，90%的人口消费水平骤降。

同时，实际上，所有基本建设投资都进入了国家的固定资产（工业、农业综合体、交通和建筑业。1987年前，这些固定资产包括巨大的总额（1991-1996年，这一“节省”达到3.5万亿美元）以及从居民那里夺走的储蓄（4500亿美元）。

不仅这些资金被断送，而且国家的所有黄金储备被挥霍一空，同时，出现了大

量的债务（目前大约为 5000 亿美元）。

这些损失的主要原因——不是偷窃，也不是资金输出（虽然这两项数额巨大），而是经济的停顿。

所有大的技术性系统，即国家命脉所在（动力、交通、供暖），都建于苏联时期。所有这一切与西方市场经济下的系统都不同。

15 年来，已经很清楚，现在的经济体系无法包含这些——在市场关系下，它们太贵了。它们正在不断退化或是遭到破坏。同时，市场无法建立相应规模的新的市场化的体系。国家掉进了历史的陷阱——恶性循环，在现在的经济体系下，不可能摆脱这一怪圈。

既不按照公社类型（苏联式），也不按照公民社会类型（西方式），那么目前的政治制度无法构建稳定的生活。然而，很多苏联的子系统安然无恙并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稳定性。大多数国家部门的工作人员、经济领袖、民众正不顾市场学说，保护着这些子系统。在苏维埃制度走出阴影的地方（例如，白俄罗斯），事业蒸蒸日上。

整个文明毁灭是不大可信的。因此，在俄罗斯或长或短的混乱之后，苏联制度的各种社会形式将会占上风，哪怕甚至是以资本主义的形态出现。

现在，让我们转向灾难的原因。原因有很多，我们将挑出结构性因素。

## 国家危机 代际更迭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苏维埃制度瓦解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意识状况。安德罗波夫（Ю.В.Андропов）对此清楚地下了定义：“我们不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会”。1970-1980 年间，这种状况恶化了：无知变成了不解，接下来又转化成敌意，在一部分精英中甚至达到了偏执的程度。

无知导致领导层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无知以及社会本身导致无法看到改革时按社会制度变化而开始的行动的危险性，也就是说导致了无法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在“人民生活中心”成长起来的一代党的领导人走了。这一代党的领导“了解社会”——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上学来的，而是从自己个人及周围人的经验中得知的。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明晰、未成文的，但它对于这代人以及前几代人来说，是那样亲近、明白、清晰、不可磨灭。把这种认知系统化并“写下来”，在当时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代人背负着巨大的生活、工作负担。由于这种认知没有形成对应的文本形式，渐渐地就变得艰涩难懂了。

大部分新一代领导人是第一代党员知识分子的子女。在他们身上，对苏联社会

的成型的认知已经取代了那种不清晰的认知，而后者他们仍可以从自己的家庭中获得。

建立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创作中的杰作。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甚至可以在不了解具体问题的实质的情况下回答一切问题。这是一个伪宗教的体系，有了它，人们就不用去寻找其他知识源泉，也不用去抉择了。

苏联在 1930–1950 年间积蓄的发展惯性，继续牵引着国家在原先的道路上前进了 20 年。而党的高层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是他们掌控着这些进程。事实上，社会学给党的高层提供的精神工具，甚至不允许他们看到发生在社会中的这些进程，更不会让他们理解并掌握它们。

问题不在于党的领导层犯了哪些错，而在于它作出了哪些决定？问题存在于党的领导层不具备认识现实的相应条件。这就像一个统帅在准备一场大的战役时，突然发现他的地图与地形不符，是另一个国家的地图。

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就在戈尔巴乔夫于 1989–1990 年间给党的机构和经济管理体系带来冲击的时候，这种毁灭具有了雪崩的特点，甚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无知还是确实带有摧毁苏联体制的目的——已经不重要了。

高层人士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有时你会觉得是在和外星人说话。从 1985 年到 1989 年，我与苏共中央科学部——它的“智囊团”——即所谓的顾问小组联系紧密。我担任过 2010 年前苏联科技进步综合规划第一卷筹备工作组负责人，当时会定期与中央科学部讨论工作进展。他们是一群受过教育的聪明人，忠诚于社会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他们影响科学政策的制定，却完全不了解苏联科学的起源与特性，也不了解其社会体制以及其优势和劣势的根源。他们是通过西方的参数和指数看到苏联科学的，就像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的科学。当我讲解关于有三个世纪历史的苏联科学现实的简单事物时，他们聚在一起睁大眼睛听着，就像听从未听过的有趣童话故事一样。

在其他领域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党的高层知识分子不知道也不明白苏联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军队、学校的特点。党的领导层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彻底的改革重组，切断了他们重要的生存支柱，就像不懂解剖学的人开始给人做复杂的外科手术。

同样重要的还有，党的知识分子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像西方政党知识分子一样）学习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包含了隐藏的但却强大的反苏倾向。那些真正通过这些教材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苏维埃制度是不正确的。知识分子中的部分激进分子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公开宣称苏维埃制度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对马克思所有概念的歪曲。可以被称为“反苏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

完整的社会学支系成熟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分党的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甚至相反地，对苏维埃制度的批判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他们深信，这种批判是为了改正苏维埃制度的缺陷，使之与真正的马克思的学说相符。但这种批判对于苏联社会是致命的。虽然应当承认，社会上“拥护苏联”部分的建设性批判，在改革时期也曾被利用来达到反苏目的。想避免这种利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批判推翻了苏维埃制度的合法性，并断言可以建立一个比这个好得多的制度——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由于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批判的，其他的知识分子，即使感觉到了这种批判的深刻错误，也找不到词语或逻辑来反驳它——他们没有其他语言。

改革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数以万计的工作在苏联的专业马克思主义者中，大部分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转向反苏势力一边了，而且是很轻易地就倒戈了，没有任何心理斗争。不能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是没有道德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知识并没有妨碍他们转变立场，而是起了促进作用。他们断定：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苏维埃制度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应该回到资本主义，用尽它的潜能发展生产力，然后再参与到“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去。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看来已经对这个教条式的幻想失望了，但事情已经完成了。

俄罗斯教授 B·B·罗扎诺夫 (B.B.Розанов) 说，俄罗斯文学扼杀了俄罗斯君主制。这言过其实了，但其中包含了真理的实质。根据类推法可以说，是苏共中央下属的社会科学院及其党校网络扼杀了苏维埃制度。

## 二十世纪 70—80 年代的思想危机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这轻率和突然只是表象。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 年才成熟。为什么从 60 年代起苏联社会开始累积一种感受——生活安排得不正确？为何出现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现在是这样看待它的。

20 世纪 60—70 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在过去 30 年里，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70% 的人都开始居住在城市。70 年代，在苏联社会新的客观特征下隐藏着主要的、隐性的危险——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几乎是消失。当时，官方的苏维埃社会学认定（大多数人也真诚地认为），这个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在理性观念中形成劳动者关于平等正义的自然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然而，这个论断是错误的。

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公社农民共产主义（общинный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коммунизм）。西方哲学家有时加上“古老的”这个词，并说它是“被覆盖了一层西方思想的薄膜——马克思主义”。赞同公社共产主义的列宁理解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公社共产主义视为自己的敌人，并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与之进行了内战——也明白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世界主义者也将其视为自己的敌人，胜利的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他们这一派，在内战最后的战役中——即发生在1937年—1938年间的镇压行动中被打倒了。

20世纪60年代，这些思潮的新一代继承者登上了舞台，他们在知识分子和已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新的年轻一代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因此，改革是20世纪俄罗斯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一革命曾经为了工业化和战争要将人民统一起来而一度被“冻结”。自觉的改革先锋是托洛茨基主义精神上的继承者，在最小程度上，也是自由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精神上的继承人。他们自己却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不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他们要是知道的话，这个反苏集团很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公社农民共产主义是一个大的文化现象，是对“地球上神的王国”的探索。它赋予苏联的构想以弥赛亚特征，而这又注定了对斯大林的崇拜，这是30年里苏联构想实质的表现。顺便提一下，反苏的构想也具有弥赛亚特征，而且对斯大林的憎恨带有不合理的成分。

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时代更替的过程中，农民共产主义理念逐渐失去效力，在接近60年代的时候耗尽了自己的潜能，虽然其中最重要的原理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一直保持到现在。为了巩固苏联社会，保持政治体系的领导权，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基础，其中苏联构想是用理性的语言来叙述的，而不包含对潜在的弥赛亚感觉的呼唤。但是老一辈却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还存在着无意识的布尔什维主义。而新一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解决这个（只从直观理解的）问题的对策，可那里根本就不可能有答案。这在党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思想危机。

在赫鲁晓夫（Н.С.Хрущев）的思想动荡之后，苏共中央被迫采取了这样一个决定——通过“拧紧螺帽”，转向“伪斯大林主义”，从而“冻结”思想危机（苏斯洛夫<sup>①</sup>时期）。这只是拖延时间，而无法解决根本矛盾。没有为了定期分析和思想基质的现代化而稍作喘息。我认为，在正常制度下，苏共中央的领导已经无法应对形势了。为了解决这一紧迫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辩论。但如果领导放松管制，那么在辨

---

① 苏斯洛夫（М.А.Суслов，1902-1982），苏联党务和国务活动家，1952-1953和1955-1982年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主席团委员，1947-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是苏联意识形态的负责人，被称为苏联制度的“灰衣主教”和苏联的“常胜将军”。——译者注

论中就会失败——党的知识分子中的第二梯队（像保文<sup>①</sup>、布尔拉茨基<sup>②</sup>、扎格拉京<sup>③</sup>这类人）已经被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渗透了。在公开的辩论中，他们是想附和反苏一方的，正如我们在改革时期看到的那样。

在勃列日涅夫（Л.И.Брежнев）逝世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权力集团——戈尔巴乔夫（М.С.Горбачев）、雅科夫列夫（А.Н.Яковлев）、谢瓦尔德纳泽（Э.А.Шеварднадзе），是在世界观真空及思想停滞的情况下组成的，当时已被反苏维埃主义渗透。认为苏维埃制度“不正确”的观点，自1986年起成为正式论断，很快，改革也被宣布为是革命，也就是说，其目标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

在老一辈人的大众意识中，苏维埃制度缘何是合法的？凭的是对群众社会苦难的记忆。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安排好生活的两条基本原则：痛苦的最小化和享受的最大化。苏维埃制度的缔造者们是从第一条原则出发的。

20世纪70年代，在许多方面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苏联的全新一代，开始成为社会上主要的活跃分子。这是一群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甚至没有看到过群众社会苦难景象的人。

西方——“三分之二的社会”。另外三分之一穷人的苦难显而易见，并使“中产阶级”团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支持对社会苦难的集体记忆，而苏联在70年代就丢失了这种记忆。青年人已经不相信还存在着那些苦难了。

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个就其自身特点而言无人知道的富裕社会。至于它将如何运转，老一辈的直觉和经验也好，当时的社会科学也好，都说不上来。这就是教训：不是在困难和物资紧缺时期，而正是在富裕社会丢失了对那些苦难的记忆时候，最主要的危险在等待着社会主义。对它们的抽象认知是不起作用的。

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苏联的构想首先是从农民的俄罗斯的处世哲学中成长起来的。一些认识由此而来：什么是人所必需的？什么是所希望的？什么是（多余的）虚荣？在革命和崩溃的过程中，这个构想变得严厉，

---

① 保文（А.Е.Бовин，1930-2004），哲学副博士，苏联与俄罗斯记者、政治学学者、外交官。苏共党员，1991年8月19日宣布退党。1981年获得苏联国家奖章。1972至1991年担任《消息报》政治观察员。苏联解体前一周被任命为苏联驻以色列大使，直至1997年退休。其后重新担任《消息报》政治观察员。——译者注

② 布尔拉茨基（Ф.М.Бурлацкий，1924-），哲学博士，苏联政治学学者，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政治学系荣誉教授。曾在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及工人阶级政党联络部工作。1969-1972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1982年起担任《文学报》政治观察员，1990年3月至1991年8月任该报主编。——译者注

③ 扎格拉京（В.В.Загладин，1927-2006），历史学副博士，哲学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1979至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事委员会秘书，苏联议会小组副主席。1988-1991年出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译者注

受到压缩了。“不需要的”需求的承载者死亡、逃往国外或者被现实改造。在某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需求的统一”。

与此同时，当生活进入和平轨道并越来越城市化的时候，“被认可的需求”的狭小范围开始限制、然后是压迫社会越来越多的不同部分。对于他们来说，西方是最理想的、童话般的乐土，在那里他们被限制的需求能得到尊重甚至受到珍视。

农民生活与“城市生活”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它保障了对精神方法的强烈“需求”。耕地、种植、收获、建造房屋和吃饭、生育和死亡——所有这些在农民那里都具有礼拜式的意义。大城市的生活剥夺了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自然资源，同时制造了压力，因为城市空间与时间的安排违背人的自然节律。这种压力压迫，而弥补它——是人的生活需求。

所有文化在工业化进程中都艰难地经历着城市化危机。在西方，严重的不平等、必须为了生存而奋斗、然后是建立大众文化、微不足道的大众需求和各种离奇的替代品转移了人们对于危机的注意力。大量学校用拼凑起来的文化来教育大多数儿童与青少年，这种文化严重降低了人的精神追求。

苏联的领导没有同意这种会导致年轻人需求降低的做法，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依据西方经验的相似提案也出现过。这一决定使我们社会的长久生命力得以保持而没有降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保持这一方法）；但是在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他们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的神魂颠倒。以前的领导（以及苏联人中的以前的几代）不理解他们由于无法满足其“对其他生活方式的渴求”而导致的不满。没有人想过那些当时苏维埃制度能够很好地满足的需求（当靴子挤脚时，没有人会去想大衣多么御寒）。

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改革中的文化项目是硬性的，群众意识受到震荡了。人们作出相关理性推断的能力，尤其是使用抽象概念的能力被破坏了。他们很难弄清自己的兴趣或者预见危机。

这种认识的薄弱——是过度家长制作风的缺点。这导致生活繁荣时期社会意识幼稚化。人们不再珍视前辈们创造出的财富，将其视为不灭的、“上天给予的”东西。社会条件被看作自然现象，就像空气一样，不会消失。它们好像不受你的社会态度的影响。

有人说，群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竞争、个人主义暴利）占了上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通常，他们只是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也没有习惯和能力去自我组织。拒绝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印章完全不能说明深层意识（期望）发生了根本改变。

在群众意识中，苏联式的劳资关系被认为是最好的，而在改革过程中甚至成为

更加吸引人的。1989年，在受访者中，平均有84%的人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证所有人都有工作，而在1991年11月，这种信念在反苏宣传中成了主要的攻击对象之一，这样表示的人超过90%。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的公民态度与意见最大的一个国际研究项目，是《新民主标准》（«Барометры новых демократий»）。自1993年起，俄罗斯有一个庞大的外国专家组在《新俄罗斯标准》（«Новый Российский Барометр»）这个共同研究项目框架下工作。

在这个项目的领导者Р·洛乌萨（Р. Роуза）和Кр·哈尔普菲拉（Кр. Харпфера）在1996年的报告中称：“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所有被调查者都积极地评价过去，而没有任何人对现行的经济体系给予积极评价。”更具体地说，对苏联经济体系的积极评价在俄罗斯占72%，在白俄罗斯——88%，在乌克兰——90%。对新政治体系的评价更有说服力。这些方针是稳定的，直到现在都被证实是正确的。

因此，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后一个话题将在以后作详细讨论，现在我们看看以下内容。Н·Я·达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将文化历史类型称之为虚拟的超阶级和超民族的社会文化共同性，这是文明主要特征的载体。在历史选择和过渡时期（包括危机、战争、革命），它是主要发展矢量的代表。达尼列夫斯基在这种类型中看见十分稳定的、代代相传的实质——体现在广义个体中的人民。

根据20世纪的经验，我们改变他的概念并且认为，文明是几种推出不同的文明方案的文化历史类型竞争（或者斗争，甚至连内战也包括在内）的舞台。这些类型中的一种（与盟友联合）成为特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在这一时期“代表”文明。

俄罗斯走过了艰难的20世纪，她所属的历史文化类型的形成过程早在1917年之前就已开始，最后是以“苏联人”定型的。我们可以描述苏联人的社会肖像——他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组织、劳动和创造力方面的能力。

苏联类型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世界观危机过程中衰落了，无法在改革时期重组并展现意志，后来被打入地下。但是，无论是苏共中央还是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或者是国家，都无法（甚至没有尝试过）在社会舞台上用与这个历史文化类型同源的类型来替代它，以继续实现苏联构想。相反，在政权和亲政权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帮助下，将一个截然相反的类型引到这个舞台上。我们可以详细描述这种在90年代替代“苏联人”的类型的特征。这也成了叶利钦体制的社会基础。这个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因为今天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历史类型是没有生命力的。它完全丧失了创造潜力，无法“支撑”国家。

(施海杰 陈亚梅 译， 贝文力、杨成 校)

---

**【Abstract】** It is startling at the imprudence and unexpectednes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but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is deific. It is not the so called “excessive state ownership” that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statement of Soviet with backward economy and being exhausted by arms race is mere deification in ideology. The fluctuations in oil price fail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oviet Union breakup either. In post-Soviet period, the crisis in Russia for quite a long time, was not passed on from the Soviet Union, but came into being i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re were only few citizens who cautiously denied the main basis for the Soviet Union system. To clarify the cause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t is required to break up the barriers of doctrine and platitude and ideological language, an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oviet Project* and its practical embodiment--*Soviet system*. The Soviet vision did not exterminate itself, nor degenerate or self-destruct, only with diseas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hich was that a series of system could not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society and the Soviet peopl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viet system, or Stalinism, took shape during the periods including revolution from 1905 to 1917, the Civil War, New Economic Policy of 1920s, collectiv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1930s, and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Due to environment of that time,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was restricted on specific design of system, only did with bases on real threat, resources potential, and inertia cultural environment shaped by the histor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oviet leadership failed to find proper way of getting rid of Stalinism and the status of mobilization development, which resulted in a sequence of political crisis, being aggravated by the Cold War. The Soviet Union was throttled more by itself than by its rivals in the Cold War. The legitimate crisis in Soviet became mature after being incubated for 30 years. The legitimacy of Soviet system in the early years originated from memories about tribula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of the socie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Soviet society has fundamentally changed in 1960s and 1970s. The urbanization has provided the objective prerequisite for the discontent of the Soviet, while an invisible risk was increasing, that i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Soviet system was dramatically

declining, even disappearing. Two generations of young people in Soviet consider there are no any guarantees for their lives, and they are infatuated by the reform, openness, the assembly, and cultural pluralism. The anti-Soviet action by the elite took advantage of the worldview crisis and intensified it. The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hip was not capable to promptly reveal or prevent the conflicts emerging in the society, nor could they figure out efficient ways to resolve mature problems. The fact that the Party's top strata has separated from the society reality of the Soviet, is appalling. The top level regarded themselves as the master of domestic process, yet the truth was that the situation was in control of carders from the bottom level. Therefore, the increasingly radical reform led by Gorbachev came into avalanche. In this sens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the consequence of civilization and worldview crisis. The essence lies in that the Soviet society and country failed to fulfill the mission of updating legitimate methods of social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 change, and to guarantee the continuity of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history type. The evolution took plac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coincided with the society being out of the status of mobilization development from 1920s to 1950s.

**【Key Words】** Soviet System, Soviet Project,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causes

**【 Аннотация 】** Крах СССР поражает своей легкостью и внезапностью. Официаль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была мифологизирована. Не огосударствление как тяжелая болезнь привело его к гибели. Отсталость хозяйства СССР и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измотала гонка вооружений - это миф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Не сыграли существенной роли и колебания цен на нефть.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кризис был создан при демонтаже совет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а не унаследован от СССР. Очень небольшое число граждан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отвергали главные усто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троя. Давайте сделаем усилие и взглянем на причины краха СССР без догм и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и не на языке идеологии. Надо различать советский проект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трой как воплощение этого проекта на практике. Совет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в главных чертах сложилась в ходе революции 1905-1917 год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НЭПа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920-х годов),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и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1930-х годо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На всех этих этапах выбор делался из очень малого набор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 Главны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выбора были реальные угрозы, ресурс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заданн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культурная среда с ее инерцией.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ССР не смогло выйти из

«сталинизма», как и вообще выходило из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оказался слож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Она была решена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СССР плохо и привела к черед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ризисов. Их тяжесть была усугублена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ой. СССР был убит противником в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хотя и руками «своих». Кризис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вызревал 30 лет. Легитимирован советский строй в масс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старших поколений памятью о массов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страданиях. По мере быстр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урбанизации в 1960-1970-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зменилось кардинально. Урбанизация создала и объективны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для недовольства советским жизнеустройством. Невидимая опасность — быстрое и резкое ослабление, почти исчезновение, прежней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троя.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СССР получил пару поколений молодежи, которые чувствовали себя обездоленными. Они были буквально очарованы перестройкой, гласностью, митингами и культурным плюрализмом. Кризис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был использован и углублен действиями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части элиты.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нов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не могло быстро выявить, и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назревающие в обществ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и найти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способы разрешить уже созревшие проблемы. Отрыв высшего слоя партии от реальност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трясал. Они считали, что они управляли внутренним процессом, а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ситуацию держали кадры низшего звена, что привело радикальную перестройку Горбачева к разрушению с лавинообразным характером.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крах СССР был следствием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Суть его в том, что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не справились с задачей обновления средств легитимац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я в процессе смены поколений, не смогли обеспечить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смене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типа, которая происходила в ходе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урбанизации и совпала с кризисом выхода общества из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1920-1950-х год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строй, советский проект, развал СССР, причины

---

(责任编辑 常喆)

## 从勃列日涅夫的“干部锻炼” 到戈尔巴乔夫的“迭次更换”

——苏联1985-1989年间罗名制<sup>①</sup>的动荡不稳

Д·谢泽\*

**【内容提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1985-1990年间，进行了苏共领导层干部的选拔和任命方面的改革。通过研究苏联以及地区（以俄联邦7个主体为例）领导层，旨在回答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学问题。戈尔巴乔夫用哪些方法形成了党内的职位等级制度？其“精英工程”的意义何在？其干部政策的动员和革新意向之间有何种相互关系？戈尔巴乔夫的干部政策实为“干部的迭次更换”和党内选举的一种结合。这两种实施干部政策的制度使得苏共急速瓦解，是苏联行政管理去党化的第一次浪潮。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 苏共干部体系 干部政策 机构管理的非党化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5-0059-(31)

### 导 言

行政精英部队的建设及持续不断的“清洗”曾经一直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任务。俄国的动员发展模式，即精英的征用模式，先验地型塑了这样的逻辑。“戈尔巴乔夫时代”是否成为一个例外？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否改变了什么？

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寻求牢靠的社会政治支柱是实质性的、至关重要的一项

<sup>①</sup>“罗名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在俄语中该词指的是职务名册或职务一览表。具体而言它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详细解释请参见本期第45页注释<sup>①</sup>。

\* Д·谢泽（Д. Сельцер），俄罗斯坦波夫国立大学人文教育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任务，而这一任务解决起来却并不容易。由于戈尔巴乔夫既未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也未在党中央委员会占主要地位，1985年，他既得不到高级领导阶层的支持，甚至也得不到各地区党的领导人的支持。因此，所有这些当前在位的人都不是他的亲信。他想要仕途升迁那就必须得替换掉这些人。相应的，总书记（指戈尔巴乔夫）的战略，尤其是在初始阶段，只能通过削弱在位者的势力以及将占据要职的人从位子上挤下来等方式来实施。那么任务很明确，那就是人为地将罗名体系运转起来，进行“干部的迭次更换”，打破已形成的关系网，中止非正式的纵向和横向的联系，清除党内各级的头等人物。总而言之，就是要动摇在数十年间形成的职位等级制度本身。策略上，这一任务通过社会政治鼓动会更易于完成。我们认为，正因如此在很多方面出现了改革的迹象。在那种形势下，改革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意味着大众参与政治的开始（他在其所有发言中都坚定不移地宣扬“党员群众的最高领导地位”），这使他获得知名度和公众的认可，并能自由地处理干部问题且不受来自政敌的攻击。

总书记的立场被置于社会期望之上。正如时间将会证明的，随着“新鲜”人对国家领导的到来，社会暗自对变革做好了准备。大事件频繁发生是国家发出的强烈的改革信号。处于动员发展模式范围内形成的失去创造精神的社会，准备好只接受“从上头下来的”提议。这项提议可以是一系列行动，哪怕其中的一个行动也一定能够觊觎“神圣的东西”，即国家的某个重要环节。正是“精英工程”这一手段将全社会的兴趣聚焦于改革之上，并发展对其的积极态度。

期待领导阶层的是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行动的纲要是这样的：苏联时期的“干部锻炼”（干部周期性的、有逻辑的的调动）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被“干部的迭次更换”（经常性的、无根据的调动）替换。后来则是被苏共中央委员会层面的“干部绞肉机”<sup>①</sup>（极为频繁的更迭）的方式替换。同时，戈尔巴乔夫注定要带来政治体制的本质性变革。在干部政策方面，表现在党委的选举制。

## 本文的任务

本文的任务是：第一，展示苏共地区及地方级领导层的变动情况，阐明其性质、因素、政策机制及后果。可以推断，“干部的迭次更换”动摇了罗名制度。第二，我们来看一看，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党机关的“无记名投票”是如何被组织的。我们可以推测，与苏共党内的“大清洗”同时开展的选举，是总书记发起的革新，尽管这一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危险性。1987年1月，召开了苏共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全

---

①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О. В.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 Издатель Соловьев А.В., 2004. С. 173.

体会议，会议的任务是推行行政管理机关的急剧民主化，这次会议正在改变将来的官员录用制度。而且，戈尔巴乔夫当时自己规定了谈话的基调：“改革的成功，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干部能多快和多深刻地理解变革的必要性……”<sup>①</sup>。党内计划推行选举，这并不是拒绝精英招募的动员模式，但却是迈出了革新的一步，长期来看会动摇以后“动员”模式的根基。

## 历史文献状况

苏联的去一体化及解体过程是各种主客观现象、因素、事件、决议纷繁复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被载入史册。但同时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历史编纂看起来并非是无可指责的。那么，其缺点在哪里呢？

第一，关于官僚领导阶层的产生<sup>②</sup>及其发展<sup>③</sup>的历史已经有所研究。发表了一些有关苏联晚期官僚领导阶层的著作<sup>④</sup>。在一系列著作中展现了苏共官僚领导阶层向新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Пленума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27-28 января 1987 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С. 41.

② Гимпельсон Е.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1917-1920 гг. М.: ИРИ РАН, 1998; Кислицын С.А. Эволюция и поражение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й элиты: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Изд-во НМЦ «Логос», 1995; Сажин А.И.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ПСС: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 Знание, 1989; Свириденко Ю.П., Пашин В.П.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Истоки, сущност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М.: ГАСБУ, 1995; Афанасьев М.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Попытка необходимых уточнений// Полис. 1996. № 2. С. 68-74; Бадовский Д.В.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От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к номенклатурной системе//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 12: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1995. № 1. С. 22-36; Бадовский Д.В.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литы в России – от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к «партии власти»// Полис. 1994. № 6. С. 42-58; Березкина О.С.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элит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1921-1927)//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1997. № 11. С. 56-64; Гимпельсон Е.Г. Советские управленц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и нравственный облик (1917-1920 гг.)//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 5. С. 44-54; Коржихина Т., Фигатнер 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 7. С. 25-38.

③ Пашин В.П., Свириденко Ю.П. Кадр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Методы подбора и воспитания. М.: ГАСБиУ, 1998; Бонюшкина Л. Опыт изучения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элиты (СНК 1937-1941 гг.)// Мир России. 1995. Т. 4. № 3-4. С. 108-130; Вишневецкий А.Г. Высшая элита РКП(б) – ВКП(б) – КПСС (1917-1989): Немного статистики// Население и общество: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Центра демографии и экологии человека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н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РАН. 1997. № 21. 4 с; Мэтьюз 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истемы привилегий в Совет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 № 2-3. С. 45-61; Сироткин В.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разрезе/ Через тернии. М.: Прогресс, 1990. С. 292-332; Он же.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Заметки историка// Вестник АН СССР. 1990. № 6. С. 12-26; Он же. Россия: «Царские и совет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я XXI. 1994. № 3. С. 46-58.

④ Мохов В.П.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России (1945-1991 гг.). Пермь: Перм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во, 2003; Он же. Тополог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ермь: Изд-во ПГТУ, 2002; Он же. Эволюц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1950-1990 гг. Пермь: Изд-во ПГТУ, 1998; Он же. Элитизм и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советск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элит. Пермь: Изд-во ПГТУ, 2000.

型俄罗斯社会精英的转变<sup>①</sup>。但是，除少数例外<sup>②</sup>，很少谈及“戈尔巴乔夫时期”官僚领导阶层所产生的变化，即其状况和走向。

第二，许多研究者效法沃斯连斯基（М.С.Восленский）<sup>③</sup>和М·吉拉斯（М.Джилас）<sup>④</sup>对苏联以及苏共特权阶层的这种收效甚微有谴责倾向。为什么？对于学者来说，借鉴那些曾是官僚人员，但在1950–1970年已成为持不同政见的人的态度和立场有何意义？这只会有害于严肃的科学探索。

第三，现代作者著作的通病就是立场观点的相似、经验基础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的狭隘，少档案及户外（社会调查）研究。

第四，带有描述性质并追求“全景”、“包罗万象”式观点的研究占主要地位。因此，这些研究更像大事记或教学参考书，但怎么也算不上是科学研究。

第五，在所有相关文献中，回忆录占大多数。这些回忆录是研究苏联的机制及其解体原因的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极好的辅助资料，但未必可以提到“科学研究”这一层面。

第六，我认为专著的数量之少是历史编纂的一大缺陷。产生了历史编纂的一个特例：有关苏联改革及其解体方面的分门别类的文章很多，而高水准的研究专著却非常少。这实为这一课题研究不足的直接证明。

第七，最后，没有通过戈尔巴乔夫的干部政策研究苏联解体过程的著作。

---

① Коваль Т.Б. Кто вы теперь, последние первые – первые или последние?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проса бывших первых секретарей райкомов КПСС г. Москвы)// Мир России. 1995. Т. 4. № 3-4. С. 56-107; Коткин С.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в бывшем СССР и сегодняшней Росси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8. № 2. С. 149-166;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О.В. Партийная элита в год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Под ред. О.В. Крыштановской. Вып. 1. М.: ИС РАН, 1991. С. 3-33; Она ж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тар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в новую российскую элиту//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995. № 1. С. 51-65;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О.В., Куколев И.В., Владыцкая В.А., Свищенкова Н.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тар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в новую российскую элиту//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 ИС РАН, 1996. С. 269-294; Кудеярова Н. Пер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элиты// Мир России. 1995. Т. 4. № 3-4. С. 46-55; Куколев И.В.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лит в Росс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997. № 4. С. 82-91; Мирский Г. Судьба советской элиты: Самоубийство ил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9. № 9. С. 79-82; Мясников О.Г. Смена правящих элит: «Консолидация» или «вечная схватка»?// Полис. 1993. № 1. С. 52-60; Салуцкий А. Кочующ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цекисты и академкраты)// 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1. № 8. С. 150-161; Чешков М.А. «Вечно жив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 6. С. 32-43.

② Волгин Е.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КПСС (1990-1991 гг.)//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 12.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2006. № 6. С. 26-36; Он же. КПСС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конец 80-х – начало 90-х годов)// Там же. 2004. № 3. С. 75-87.

③ Восленский М.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МП «Октябрь», 1991.

④ Джилас М. Лицо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а. М.: Новости, 1992.

国外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大卫·雷恩（David Lane）<sup>①</sup>、松里公孝（Kimitaka Matsuzato）<sup>②</sup>及其他作者<sup>③</sup>在当时严肃认真地将苏共总书记的政策科学思考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这些研究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首先是史料基础的单一化。究其原因，是外国作者不过是无法利用档案资料。

我们总的结论是：在事件已发生 20 年后的今天，在研究各种文献资料（调查资料、档案资料及回忆录）基础之上周密、深刻地探讨苏联的戏剧性解体是很重要的。本文将填补历史编纂的明显不足。

---

① Lane D., *The End of Inequality? Stratification under State Soci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1; Lane D.,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USSR*. London: Weidenfeld-Nicolson, 1970; Lane D., *The Roots of Russian Communism. The Socialist Industrial State: Towards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State Soci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78; Lane D., *State and Politics in the USS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Lane D., Ross C.,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Ruling Elites from Gorbachev to Yeltsin*, Basingstok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Lane D.,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 The Role of the Political Elite in Regime Disintegration”, *Political Studies*, 1996, № 44, pp.4-23; Lane D. Soviet Elite, “Monolithic or Polyarchic”, *Russia in Flux*, London, 1992, pp.2-59; Lane 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 The Role of the Political Elite”, *Europe-Asia Studies*, 1996, Vol.48, № 4, pp.535-549; Lane D., “Transition under Eltsin: The Nomenklatura and Political Elite Circulation”, *Political Studies*, 1997, № 45, pp.855-874; Lane D., Ross C., “The CPSU Ruling Elite 1981-1991: Commonalities and Division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995, Vol. 28, № 3, pp.339-360; Lane D., Ross C., “Limitation of Party Control: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in the USSR”,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27, №.1, 1994, pp.19-38; Lane D., Ross C., “The Russian Political Elites: Recruitment and Renewal”, *Postcommunist Elites and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Ed. by J. Higley, J. Pakulski & W. Weselowski.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p.34-66; Lane D., Ross C.,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Allegiance of Political Elite of the Supreme Soviet of the USSR: The Terminal Stage, 1984 to 1991”, *Europe-Asia Studies*, 1994, Vol. 46, № 3, pp.437-463.

② Matsuzato K., “From Communist Boss Politics to Post-communist Caciquismo – the Meso-Elite and Meso-Governments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1, № 34, pp.175-201; Matsuzato K., “From Ethno-Bonapartism to Centralized Caciquismo: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s of the Tatarstan Political Regime, 1990-2000”, *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 Transition Politics*, 2001, Vol. 17, № 4, December, pp.43-77; Matsuzato K., “Local Elites Under Transition: County and City Politics in Russia 1985-1996”, *Europe-Asia Studies*, 1999, Vol.51, № 8, pp.1367-1400.

③ Helf G., Hahn J., “Old Dogs and New Tricks: Party Elites in the Russian Regional Elections of 1990”, *Slavic Review*, 1992, Vol.51, № 3, pp.511-530; Clark W.A.,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Soviet Officialdom: Combating Corruption in the Political Elite, 1965-1990”,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rpe, 1993; Moses J.C., “Saratov and Volgograd, 1990-1992: A Tale of Two Russian Provinces”, *Local Power and Post-Soviet Politics*, Ed. by T.H. Friedgut, J.W. Hahn, Armonk & New York & London: M.E. Sharpe, 1994, pp.96-138; Moses J.C., “Soviet Provincial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ransition and Revolution. 1989-1991”, *Soviet Studies*, 1992, Vol. 44, № 3, pp.479-509.



本文作者在不同时期研究苏联的衰败及其解体问题，一系列学术论文<sup>①</sup>、专著<sup>②</sup>及博士论文成为了本项研究的前期成果<sup>③</sup>。

## 本文研究的客体及对象

研究的客体为 1985–1989 年期间苏共的干部政策，尤其是苏联、地区以及地方的苏共特权领导层的各级干部。研究的对象为苏共领导层有关干部问题的方针、所采取的实际行动，苏共各级特权领导层的状况、性质、更迭及行为，以及苏共机构内的选举。

## 本文研究的地理范围

本文从俄罗斯联邦七个区入手研究了面向全苏的“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干部政策。这七个区是：4 个州（梁赞、萨马拉（旧称古比雪夫）、坦波夫、乌里扬诺夫斯克）以及三个民族共和国（摩尔多瓦、乌德穆尔特、楚瓦什，之前为摩尔多瓦、乌德穆尔特、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 本文研究的史料依据

本文的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央、地区和地方档案文献，大多数资料未被用在各种科研、采访及调查材料中。

中央一级的档案资料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内（其前身为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中央党务档案馆，后来为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保

---

① Сельцер Д. Г. Суб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ая элита от М.С. Горбачева до В.В. Путина: общие подходы//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2.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2004. № 4. С. 63-8; Seltser D.G. Mutating Power: Tracking the Changes in Authority of the Sub-Regional Communist Party Nomenclature During Late-Stage Soviet and Post-Soviet Socialism (1985-2005)/ Seltser D.G., Crosston M.D.// Вестник Тамб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5. Т. 11. № 2 Б. С. 578-589; Сельцер Д. Г.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дестабилизаци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ласти в СССР// Вестник Тамб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Журнал Тамб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Г.Р. Державина. 2007. Вып. 1 (45): 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С. 42-53; Сельцер Д. Г. Конкурирующие элиты и выборы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2.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2007. № 2. С. 144-151; Сельцер Д. Г.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КПСС: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границах дозволенного// КПСС и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д ред. В.П. Мохова. Пермь: ПГТУ, 2007. С. 21-32 и др.

② Сельцер Д. Г. Взлеты и падени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Научная монография. Тамбов: ОГУП «Тамбовполиграфиздат», 2006.

③ Сельцер Д. Г.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1985-2005 гг., суб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уровень):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М.: МГУ имени М.В. Ломоносова, 2007.

存着完备的、独一无二的苏共及俄共局、州委（共和国委员会）书记处、州（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会议等的会议记录<sup>①</sup>。

在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其前身为苏共中央公共事务局日常档案馆，后为现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苏共中央各部 1984 年前的文献，包括党组织工作部 1985 年 2 月以前的文献都已解密并转移至阅览厅，这些使我们的研究机会大大减少。同时，在档案馆完全可接触到政治局、各届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苏共及俄共全会的正式工作文件<sup>②</sup>。具有特别价值的是宪法法院收集关于“苏共案”的文件时所形成的联合馆藏<sup>③</sup>。最主要的是，联合馆藏里保存有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其前身为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其前身为苏联外交部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其前身为苏联克格勃档案馆）以及其他档案馆的文件复本。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内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并且在其资料解密后成为展示苏联后期政治历史的最宝贵的文献资料来源。

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ГАРФ）（其前身为苏联国家中央十月革命、国家权力机构和国家管理机关档案馆（ЦГАОР СССР）），保存有大量另一种、“苏联”路线的文件。在俄联邦部长会议、俄联邦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央选举委员会、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及俄联邦最高苏维埃等的馆藏中发现有有关俄联邦法律草案文件、俄联邦宪法修正及补充文件、苏联（1989 年）和俄联邦以及地方委员会人民代表选举的相关文献以及各种公文处理文件，包括情报的、参考的及统计性质的文献资料<sup>④</sup>。

地区档案资料 我们在“国家档案馆”里的一篇文章中对各地方档案馆的信息潜力进行了总结<sup>⑤</sup>。大多数地方都沿袭苏联时代，保存有两个档案馆——国家档案馆的以及冠以各种名称的（一般为近代历史资料中心）前苏共州委档案馆。

---

①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ГАСПИ). Ф. 17–ЦК КПСС.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ГАНИ). Ф. 1–Съезды КПСС (XX–XVII); Ф. 5–Аппарат ЦК КПСС; Ф. 77–Отдел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партийной работы ЦК КПСС; Ф. 91–Российск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и учредительный съезд КП РСФСР (1990 г.).

③ РГАНИ. Ф. 89–Коллекция копий документов,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х при выполнении тематических запросов в процессе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й работы.

④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ГАРФ). Ф.А-259–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РСФСР; Ф.А-385–Верховный Совет РСФСР; Ф.А-385–Верховный Совет РСФСР; Ф.Р-5446–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Ф.Р-7523–Верховный Совет СССР; Ф.Р-7522–Центральная избиратель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выборам в Верховный Совет СССР (1937-1991); Ф.Р-10026–Съезд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РФ, Верховный Совет РФ и их органы.

⑤ Нащекин Е.О., Сельцер Д.Г. «Эпоха Горбачева» в провинциальном разрез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архиво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 2005. № 3. С. 57-63.

各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对弄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及最高领导层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在各地区和地方档案馆，较好地、系统地呈现了在各种会议上研究的问题，这些会议包括代表会议、全体会议、委员会会议以及苏共州委、共和国委员会、市委、区委书记处会议等。此外，那里还存有上级领导关于党的组织和思想工作方面问题的指示，党机关、苏维埃机关、经济部门以及基层党组织上下级之间、经济部门领导人之间的往来公文。在各基层党组织的会议记录中保存有一些珍贵的资料，其中包括党组织及党员领导人活动的审查资料 and 文件、关于各区党组织人员的组成及其活动的统计报告、关于机关人员和选拔干部的文件，还包括各种审查名单。

调查和采访数据成为史料库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时用于获得评价，这对于弄清已发生事件的实质及权力阶层内部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意义。许多不同时期的高层领导人物都曾被访问过：苏共各州、市、区委书记，各州、市、区委机关工作人员，各市、区行政机关领导以及各区、市苏维埃主席。

## 一、“干部的迭次更换”

1985-1991年期间地方范围内党内官僚领导阶层的干部变动情况见表1。

表1：苏共市委和区委第一书记的更迭情况表  
(数字不代表人数，而是指第一书记的换届次数)

地区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总计
梁赞	5	13	5	12	6	0	4	45
萨马拉	6	3	8	11	3	18	7	56
坦波夫	3	2	9	8	3	4	12	41
乌里扬诺夫斯克	3		8	4	2	9	1	27
摩尔多瓦	6	2	4	8	2	13	3	38
乌德穆尔特	3	6	7	8	2	20	2	48
楚瓦什		3	5	4	6	12	2	32
总计	26	29	46	55	24	76	31	287
%	9.0	10.1	16.0	19.2	8.4	26.5	10.8	10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以下各表同）。

梁赞州党内干部更换高峰期为1986年和1988年，萨马拉州、摩尔多瓦、乌德穆尔特和楚瓦什为1990年，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为1987年和1990年，坦波夫州分别

为 1987 年、1988 年和 1991 年。事实上，这只是“个别情况”。那么该如何解释清楚干部的变动呢？首先，应该用体制现状来解释。1989—1990 年政治改革前用俄国传统的中央集权、政策中心化、单一中心化来解释，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走出鼓动发展模式危机的出路就被认为是不断的进行官员“清洗”。还有用经济的复杂性来解释。改革进程中体制的现状表现为政治体制、精英招募机制的变化，党的去国家化，权力重新分配至苏维埃。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关于干部变动的解释，这些解释与体系的原因没有很大的关系，而成为了改革的新事物。

**解释 1** 1985 年 3 月 11 日 54 岁的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干部变动，即官僚领导层干部自然的年轻化。此外，新总书记喜欢任命那些他所信任的人担任领导职务。总书记的换届若无纵向调整过程就不可能动摇罗名制度的整个基石。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成为了变革的开端。

**解释 2** 党中央层面的变化——“干部绞肉机”。戈尔巴乔夫在其当政前三年开除了政治局和秘书处内 12 人，后来又开除了 32 人。由于这一点，他在官僚领导阶层内背上了一个叛徒的名声。1989 年四月的苏共中央全会是史无前例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辞退了 74 位中央委员和 24 位中央候补委员<sup>①</sup>。如此声势浩大的人员更换巩固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并导致了中央内部权力的重大的重新分配，并自动转为各地的权力再分配。中央各部部长对各地区党的领导人也有自己的态度。而对于州委第一书记那些老革命家们来说，越来越难证明自身的价值了。

**解释 3** 各州委第一书记团队的换届见表 2。

通过比较能解释很多问题。梁赞州和摩尔多瓦——百分之百相符。萨马拉、坦波夫和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乌德穆尔特和楚瓦什也几乎完全相符。官僚领导阶层内部及其在更迭中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独特的多边形关系，几乎总是交织着各种政治斗争。在各地，这些关键取决于州委第一书记。

苏共坦波夫州委第一书记 А·А·霍米亚科夫（А.А. Хомяков）成功地晋升为萨拉托夫州的领导人。1985 年 4 月 19 日，州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州执委会）主席 Е·М·波多里斯基（Е.М. Подольский）出任坦波夫州委第一书记，他曾着手更换下属各区领导人。地方范围内的革新与其说与国家利益有关，还不如说与人际关系有关。波多里斯基对下属各区年长的、有才能的领导人心存顾虑并且一直想把他们换掉。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苏共市委及区委第一书记的更换高达 43 次。

1986 年以前，苏共梁赞州委第一书记为 Н·С·普利耶热夫（Н.С. Приезжев）。后由 П·А·斯莫里斯基（П.А. Смольский）接任，斯莫里斯基因心脏病发作于 1987

<sup>①</sup>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О.В. Кто нами правит? С. 15, 17.

年逝世，然而在职期间他还是更换了 13 位第一书记。1987 年 6 月，Л·И·赫特鲁（Л.И. Хитрун）被任命为州委第一书记，开始了其一系列的“干部稳定”政策：1987 年撤换了 5 位第一书记，1988 年 12 位，1989 年 6 位。

表 2：苏共各州委第一书记的更迭情况表（“1”表示第一书记的更换）

地区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共计
梁赞 <sup>①</sup>		1	1					2
萨马拉 <sup>②</sup>				1		1		2
坦波夫 <sup>③</sup>	1						1	2
乌里扬诺夫斯克 <sup>④</sup>			1			1		2
摩尔多瓦 <sup>⑤</sup>						1		1
乌德穆尔特 <sup>⑥</sup>	1					1		2
楚瓦什 <sup>⑦</sup>				1		1		2
总计	2	1	2	2		5	1	13

在“摩尔多瓦事件”中，苏共市委和区委第一书记们于 1990 年将任职多年的州委第一书记 А·И·别列津（А.И. Березин）罢免。他们以及州委机关的个别工作人员发动普通党员给苏共中央写信，信中强调第一书记及其周围亲信持有反改革态度，不善于在各苏维埃委员选举中开展竞争。第一书记是一位任职多年且很有魄力的领导人，但他无力与其年轻的政敌相抗衡：由于执行总书记相应的干部政策，其在莫斯科的保护范围已急剧地缩小。1990 年，别列津的继任者 В·А·斯卡普佐夫（В.А. Скопцов）对第一书记团队又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① 1967-86—Н.С.Приезжев, 1986-87—П.А.Смольский (17.03.1931-19.06.1987), 1987-91—Л.И. Хитрун. Мы уточняем сведения по Ряз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Прежде мы ошибочно указали замену в октябре 1990 г.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обкома КПСС Л.И. Хитруна (См.: Сельцер Д.Г. Первые секретари ГК и РК КПСС (1991-1992 гг.):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или завершение карьеры// PRO NUNC: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ып.2.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и выборы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ах/ Редкол.: В.М. Юрьев (пред.), В.Ф. Пеньков, С.В. Самгин, Д.Г. Сельцер (отв. ред.). Тамбов: Изд-во ТГУ им. Г.Р. Державина, 2004. С. 135-156). Ошибка была связана с нахождением нами в РГАН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ссылки на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 8/44 от 23 октября 1990 г. «О т. Хитруне Л.И.» о е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и (РГАНИ. Ф. 4. Оп. 42. Д. 27. Л. 112; Ф. 89. Оп. 4. Д. 16; Архивы Кремля и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делу КПСС». Аннотированны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й в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й суд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делу КПСС»/ Сост. И.И. Кудрявцев; Под ред. В.П. Козлов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1995. С. 236).

② 1979-88—Е.Ф. Муравьев, 1988-90—В.Г. Афонин, 1990-91—В.С. Романов.

③ 1978-85—А.А. Хомяков, 1985-91—Е.М. Подольский, август 1991 г. — Ю.Н. Блохин.

④ 1983-86 — Г.В. Колбин, 1986-90—Ю.Г. Самсонов, 1990-91—Ю.Ф. Горячев.

⑤ 1971-90—А.И. Березин, 1990-91—В.А. Скопцов.

⑥ 1963-85—В.К. Марисов, 1985-90—П.С. Грищенко, 1990-91—Н.И. Сапожников.

⑦ 1973-88—И.П. Прокопьев, 1988-90—А.П. Петров, 1990-91—В.С. Шурчанов.

戈尔巴乔夫提拔的古比雪夫州委第一书记В·Г·阿福宁(В.Г.Афонин),是典型的“瓦良格人”,在其任职的两年间共撤掉古比雪夫和陶里亚蒂区委 29 位苏共区、市委第一书记。В·А·库兹涅佐夫(В.А.Кузнецов)对此作了准确的描述:“所有人都知道,В·阿福宁未从他之前的工作地莫斯科带来家人,也未带来任何家什。这只能说明一点:这位新领导人来萨马拉只是暂时的,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向莫斯科领导层汇报工作,然后回去后能够得到升迁。在他丝毫不器重最近几十年对州里事务有过影响的任何人”<sup>①</sup>。

1990 年是苏共市、区委第一书记频繁更替的壮丽尾声,同时该年也是州委第一书记更换的高峰期。顺便指出,在萨马拉州和楚瓦什州,区、市委书记更换并不频繁是因为那里的州委书记不经常被撤换。

**解释 4** 由于新总书记的上台,在各州委第一书记中出现了年龄断层,这也反映出在下属各地有相似的情况。是这样吗?多多少少存在那么些情况。尽管这对于第二轮的人事变动是最为公正的。戈尔巴乔夫在第一轮所提拔的萨马拉、坦波夫、乌里扬诺夫斯克各州新人只比其前任年轻 2 岁。在摩尔多瓦和楚瓦什也存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但未必就能把第一书记视为各代人的代表。梁赞州和乌德穆尔特是一个例外。这里的年龄断层事实上在第一轮的人事变动时就已产生。出生于 1910 年代的这一代人已退出了政治舞台。Н·С·普利耶热夫(Н.С.Приезжев)掌管梁赞州近 20 年,В·К·马利索夫(В.К.Марисов)为 22 年。而 А·И·别列津(А.И.Березин)领导摩尔多瓦共和国也已近 20 年。

第一轮人事变更中最奇特的一件事发生在乌德穆尔特。В·К·马利索夫(В.К.Марисов)的例子本身就是不同寻常的。这种年龄的各州委第一书记我们简直闻所未闻。罗名制度轻易地将党内领导人放到职位上,也会轻易地将其从岗位上赶下去。替换马利索夫的是 54 岁的 П·С·格里先科(П.С.Грищенко)。结果即为:三年间下属各区党委第一书记换了 21 任。

与此同时,除两人以外,各州委第一书记都不是非常老。А·И·别里津(А.И.Березин)经验丰富,在 40 岁时成为第一书记。如果从传统的官僚领导阶层的实践来看,40 岁算是很年轻的。И·П·普罗科别耶夫(И.П.Прокопьев)同样也不算老。“瓦良格人”А·А·霍米亚科夫(А.А.Хомяков)和 Г·В·科尔宾(Г.В.Колбин)被派往坦波夫和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去“挨时间”。他们是 М·С·戈尔巴乔夫的人,

---

<sup>①</sup> Кузнецов В. Сама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Хрон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1988-1995)//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хроника 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Т. 3: Сама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Яросла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 (Occasional Papers on Changes in the Slavic Eurasian World № 35). Саппоро: SRC, Hokkaido University, 1997. С. 16.

并本该适时到苏联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构内任职。第一轮任职的官员与总书记属于同一代人。各地区第四代党的干部开始接管权力。

在第二轮替换中第一书记队伍的年轻化更为明显。其中有三位生于 1947-1949 年。只有 Л·И·赫特鲁 (Л.И.Хитрун) 年龄高于其前任。然而这里要指出两点：第一、赫特鲁是由于前任的猝死而意外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二、赫特鲁是“瓦良格人”，是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1979-1980 年担任苏中央农业部副部长；1980-1986 年担任国家农业生产技术保障委员会主席；1986-1987 年担任苏联农机制造和饲料生产部长）。地区的反对因为“瓦良格人的入侵”被消除了。1987 年过去了，年轻的各地区党内领导人还不敢放开手脚开展工作，体系处于可控的状态，赫特鲁只不过是继承了州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表 3：苏共各州委第一书记的年龄表

地区	“停滞时期”州委第一书记	出生年份	第一轮人事变动时州委第一书记	出生年份	第二轮人事变动时州委第二书记	出生年份
梁赞州	1967-86 Н·С·普利耶热夫	19.05.1919- 15.12.1989	1986-87 П·А·斯莫里斯基	17.03.1931- 19.06.1987	1987-91 Л·И·赫特鲁	24.06.1930
萨马拉州	1979-88 Е·Ф·穆拉维约夫	16.06.1929- 20.02.1998	1988-90 В·Г·阿福宁	8.07.1931	1990-91 В·С·罗曼诺夫	29.10.1937
坦波夫州	1978-85 А·А·霍米亚科夫	25.08.1932	1985-91 Е·М·波多里斯基	5.07.1934	08. 1991 Ю·Н·布洛欣	3.01.1947
乌里扬诺夫斯克	1983-86 Г·В·科尔宾	7.05.1927	1986-90 Ю·Г·萨姆索诺夫	27.12.1929	1990-91 Ю·Ф·戈利亚切夫	11.11.1938
摩尔多瓦	1971-90 А·И·别列津	16.11.1931- 28.04.1998	1990-91 В·А·斯卡普佐夫	15.10.1939	无人变动	
乌德穆尔特	1963-85 В·К·马利索夫	23.10.1915- 18.01.1992	1985-90 П·С·格里先科	29.11.1931	1990-91 Н·И·萨波日尼科夫	5.08.1949
楚瓦什	1973-88 И·П·普罗科别耶夫	29.07.1926	1988-90 А·П·彼特罗夫	13.12.1933	1990-91 В·С·舒尔洽诺夫	19.01.1947

**解释 5** 上面所提到的各区第一书记在其所领导地区根深蒂固的问题，在原则上是很重要的。

表 4：苏共各州委第一书记的出处表（B - 瓦良格人，A - 本地人。）

地区	“停滞”时期	籍贯	第一轮人事变动	籍贯	第二轮人事变动	籍贯
梁赞州	Н·С·普里耶热夫	B	П·А·斯莫里斯基	B (1986-任州委第一书记)	Л·И·赫特鲁	B (1987-任州委第一书记)
萨马拉州	Е·Ф·穆拉维约夫	A (1952-大学毕业)	В·Г·阿福宁	B (1988-任州委第一书记)	В·С·罗曼诺夫	A (1961-大学毕业)
坦波夫州	А·А·霍米亚科夫	B (1985-任州会第一书记)	Е·М·波多里斯基	A (1956-大学毕业)	Ю·Н·布洛欣	A (自出生)
乌里扬诺夫斯克	Г·В·科尔宾	B (1983-任州委第一书记)	Ю·Г·萨姆索诺夫	A (自出生)	Ю·Ф·戈利亚切夫	A (1956-考入大学)
摩尔多瓦	А·И·别列津	A (自出生)	В·А·斯卡普佐夫	A (自出生)	无变动	
乌德穆尔特	В·К·马利索夫	A (1940-大学毕业)	П·С·格里先科	B (1985-任州委第一书记)	Н·И·萨波日尼科夫	A (自出生)
楚瓦什	И·П·普罗科别耶夫	A (自出生)	А·П·彼特罗夫	A (自出生)	В·С·舒尔洽诺夫	A (自出生)
总计		4A 3B		4A 3B		5A 1B

“瓦兰格人”在新的位置上是如何作为的呢？他对前任领导留的下属是多么节俭？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他不可能随身带来新的工作班子。然而他完全能够搞一次大规模的干部变动，包括下属各地方的干部变动。让所有干部“原地不动”的话，就会产生所有共和国领导都是本地人而各州领导都是“瓦良格人”的局面。第一轮人事变动给共和国带来了“瓦良格人”П·С·格里先科（П.С. Грищенко）（曾任苏联车里雅宾斯克州委第二书记、苏共中央指导员）。他在人事变动方面的活跃程度在前面已经讲过。1986年，苏共中央组织工作部副部长 П·А·斯莫里斯基（П.А. Смольский）被派往梁赞州以加强该州的工作。很快，各市、区委第一书记便更迭了 13 次（这是州层面变动次数最多的一次）。同样的情况在 В·Г·阿福宁（В.Г.Афонин）来到萨马拉州后也发生了。他曾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执委会主席及苏共中央化工部部长。第三轮人事变动中只有 Л·И·赫特鲁（Л.И.Хитрун）还未被本地化：中央对各区的“东征”完成了。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竞争政策的条件下，由于“瓦良格人”不了解当地的情况，也不了解当地人，他们开始不能掌控局势。此外，还由于党内竞争变得急剧激烈。“瓦良格人”即使有总书记的支持，但由没有关系网，就注定要失败。

**解释 6** 党机关的裁员、各职能部门的改组，使官僚领导阶层丧失了大好前途，并迫使其开始思考生活的安置问题。



苏共梁赞州委各部的改组并未伴随着任何争论，并且在 1988 年 12 月 17 日州委全会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州委机关人员缩减了 30 人<sup>①</sup>。

В·Г·阿福宁(В.Г. Афонин)在其担任古比雪夫州委第一书记时曾三次进行州委机关的人员精简，裁员后总人数由 257 人变为 108 人。自 1990 年中期到 1991 年 6 月，全州党组织的人数从 30.2 万人缩减到 21.7 万人。在苏共存在的最后几个月，每月缩减 1 万-1.2 万人。此外，许多党员脱离了与党的联系后，也不再缴纳党费。比如，1991 年 5 月只有 13.9 万名党员交了党费。也就是说，一年内该州党组织的人数缩减了一半<sup>②</sup>。

1990 年 11 月 2 日，苏共坦波夫州委通过了关于州委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降低 45%、市委和区委工作人员工资降低 50%的决议，并宣布即将对机构进行裁员和对州委结构进行改组。12 月 8 日，在州委全会上确定了新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编制。州委机关由 72 人缩减到 39 人（缩减了 45%多一点）。整体上来看，苏共在该州的处境不佳。退党的有 5012 人（占 5.1%），新入党 1087 人。退党人员中 56.4%为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30%为公职人员，13%为退休人员。州党员平均年龄为 50 岁<sup>③</sup>。

**解释 7** 1988-1989 年间的党内选举造成了苏共内部的政治竞争。党内关系、干部任命不再由各书记处和委员会掌控，反而处于了大众、党员、甚至是党外人士追求公共利益、参与政治这样一种范畴。选举导致了苏共地方、甚至是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自然的人事变动。1988 年在已经改选了的团队里地方的领导人其生存条件非常困难。

第一次变动是由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筹备和召开。根据业已形成的传统，在通过了关于在萨马拉州召开代表会议的决议后，立刻开始了代表的推举。在这里，协调的党的选举机制第一次出现了中断。高校党组织拒绝支持州委确定的候选人。大学里的党员教师感觉到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他们立即表达了对州委第一书记 Е·Ф·穆拉维约夫(Е.Ф. Муравьеву)的不信任。在 1988 年的 5 月末-6 月初，这项不信任案获得了萨马拉 11 所高校中约 7 所院校党组织的支持。州委第一书记当时还能够保住自己的职务。但到了 1988 年 7 月，在反穆拉维约夫的第一次群众集会上，聚集了将近 3 万人，要求其自动离职。一周过后举行的第二次群众集会，参加人数已经达到了近 7 万人。Е.Ф.穆拉维约夫试图向与会者发表演说并加以解释，然而他被人们不满的叫喊声赶下了台。第二天萨马拉市委第一书记 В·И·佐洛塔列夫

---

① Приокская правда. 1988. 22 декабря.

② Кузнецов В. Сама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Хрон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1988-1995). С. 17, 20.

③ Тамб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 1990. 5 ноября, 12 декабря.

(В.И. Золотарев) 被派往莫斯科去报告情况。一周以后, В·Г·阿福宁(В.Г. Афонин) 来到了萨马拉<sup>①</sup>。

**解释 8** 通过 1989 年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 一些杂七杂八的人也混进了高层。聚合物化学品科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党外人士 В·В·达维杜里阿尼(В.В. Давитулиани), 成了坦波夫苏联人民代表。梁赞州的党外工人 Н·В·马罗特科夫(Н.В. Молотков)、伊热夫斯克的苏联科学院乌拉尔分院物理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 Н·Н·恩格维尔(Н.Н. Энгвер)。他们都成了跨地区代表团的成员。苏联人民代表——第一书记们, 如今只能强颜欢笑并忍受与自己的政敌同坐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的会议厅(代表位置按地区安排)。各州委第一书记感觉到不小的威胁, 他们别无选择, 于 1989 年去参加竞选, 而这样一来, 他们与那些胜出的代表相比就没有优势了。

**解释 9** 因苏共结构组建产生了斗争, 民主主义非正式团体出现。众所周知, 苏共摩尔多瓦和坦波夫州委与地方分部“纪念碑”之间、梁赞州委和州中心城市选民俱乐部之间、乌德穆尔特州委与政论俱乐部协会之间的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冲突。

乌德穆尔特的情况颇为有意思, 那里很快出现了一些民族主义组织(1988 年成立“乌德穆尔特文化伊热夫斯克俱乐部”; 1989 年成立乌德穆尔特文化协会; 1991 年成立“乌德穆尔特人民党”; 1991 年成立“乌德穆尔特凯涅什”)和亲莫斯科的民主组织(1989 年成立政论俱乐部协会; 1990 年成立民主运动组织和民主俄罗斯组织)。

在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出现了各种非正式政治团体并存的奇特现象, 他们因为一个共同目标即与党内官僚做斗争而联合起来。民主思想与民族国家复兴的思想紧密交织在一起。而且, 与我们所研究的各州和共和国不同, 各组织所持的民主思想成为主要的建设性因素: 1989 年成立“党员和党外人士改革联盟”; 1989 年成立“选择”联盟; 1990 年 5 月 25 日成立“民主选择联盟”; 1990 年成立“民主楚瓦什”。民族主义团体组织(1989 年-“创意青年协调中心”; 1989 年-“楚瓦什社会文化中心”; 1991 年-“楚瓦什民族复兴党”)在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更为严苛。非正式组织的活动引起了苏共州委的强烈不安。在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期间, 这些组织立刻被戴上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帽子。1990 年 2 月州委全会通过了几项决议, 极力对这些非正式组织作负面的渲染。他们被称为动摇共和国内政治和社会局势的破坏

---

① Кузнецов В. Сама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Хрон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1988-1995). С. 16.

性因素<sup>①</sup>。与此相反，在 1990 年 3 月 4 日的选举以及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成立之后，政府当局迎来了一个强大的民族民主联合团体。

非正式组织给各地州委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州委之外的非正式组织不仅成了第一批公开宣称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与官方立场不一致的政治组织，而且，早在 1989 年选举苏联人民代表时，他们还曾力推自己的候选人。苏共梁赞州委审议《关于苏共州委对社会政治运动的立场》的报告绝非偶然<sup>②</sup>。报告中不无担忧地指出：“政治多元化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是很自然的”<sup>③</sup>。这样说当然是有其根据的。医学院党委书记 В·А·尤金 (В.А. Юдин) 1990 年 3 月 24 日在州委全会上的发言中，严厉批评了州委第一书记的专制以及梁赞州克格勃管理局局长的反民主性。这一事件在梁赞州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场立刻有人批驳道：“不知羞耻！他在乱讲些什么？”<sup>④</sup>。应该采取某些措施以应对这种局面。于是梁赞州知识分子协会“文化”于 1990 年 3 月 23 日应运而生。该协会是由州委组建而成，同时是对强大的、而且还未注册的运动组织的一种抵制<sup>⑤</sup>。

坦波夫“纪念碑”<sup>⑥</sup>是国内最早成立的、最为著名的民主组织之一，推行具有说服力的生存战略和发展战略。协会由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师生发起，其创建想法萌生于 1989 年 1 月 17 日，并于 1989 年 3 月 18 日正式宣告成立。在这之前，代表坦波夫 25 个组织和机关的 104 人加入了该协会。协会有 52 位高校的代表，58 名苏共党员、20 名共青团员、26 名党外人士。“纪念碑”协会成立之初，其成员是一群年轻的、学识渊博之士，要是谈及其领导层，该协会在当时称得上是一个颇有名望的组织。作为一个历史启蒙组织，它迅速转变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了州委的一个劲敌。而且，还是一个不仅积极防守、而且还展开猛烈攻势的劲敌。该组织的领导人预先取得了苏共中央、苏联总检察院及司法部的支持，要求协会登记注册，该组织的主张按照复杂的、具有进攻性的逻辑而发展。其逻辑为：1. 指出任何只要稍微坚

---

① Мацузато К., Шабунин Д. Чуваш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Хрон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й в ЧР (1989-2001 гг.)//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хроника 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Т. 8: Республика Марий Эл, Чуваш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Slavic Research Center Occasional Papers: Special Issue). Саппоро: SRC, Hokkaido University, 2000. С. 125.

② ГАРО. П-3. Оп. 113. Д. 48. Л. 2-5.

③ Там же. Оп. 110. Д. 88. Л. 3.

④ Там же. Д. 6. Л. 10-11.

⑤ Там же. Р-3251. Оп. 40. Д. 10. Л. 10.

⑥ Сельцер Д.Г. Тамб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 (1989-1995): Развит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Хроника 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Т. 1: «Красный пояс»: Центральное Черноземье. Саппоро: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1997. С. 83-157; Он же. Тамбовский «Мемориал» 1989-1999 гг.: элитистский аспект//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мысль, движения и партии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Четверт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1-2 ноября 2001 г. в г. Брянске. Брянск: БГУ; «Курсив», 2001. С. 137-140.

决的组织，其政治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公开宣称于1989年3月18日）；2.捍卫改革（1989年3月13日）；3.从与斯大林主义作斗争的抽象思维转向与机构的斗争（1989年9月23日）；4.权力不是要来的，而是夺来的（1990年1月）。

研究证明，假使在短暂的“纪念史诗”最初阶段，“纪念碑”的领导人没有顺利迫使州委和市委书记初与他们进行对话，没有竭力使协会顺利注册，那么，一切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市委也曾表示，一直在为双方对话做准备，同时也表达了其坦诚的态度。1989年2月，由苏共州委发起，“纪念碑”协会领导人与市委书记会见，州委书记В·Е·兹韦列夫(В.Е. Зверева)同时也出席了本次会见。会谈的实质在于，各党委揭露有关斯大林肃反的情况并提议协会作为顾问加入到工作中来。该组织领导人В·Н·科瓦利(В.Н. Коваль)立刻拒绝了这一提议，声明在这件事上不能有两个中心，“历史细节”是很重要的，但仍是协会工作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要建立起对官僚领导阶层、甚至更广泛的是对政权的社会监督机制。而至于协会的注册问题，他们已不再坚持。相反，这成了调动群众与机构作斗争的重要手段，而且没有人想失去它。

如何将上面所说的与官僚领导阶层的人事变动联系起来呢？州委的食堂、干部们的诊所、别墅、汽车（这些设施被认为是庸俗之人所享受的）引起了公众批评，这种批评增强了对州委干部政策的批判（这些设施直接导致了党的机构的解体）。

当知识分子代表在媒体上发表讲话，要求在讨论苏联历史时广泛的公开性和开放性时，摩尔多瓦于1988年初发生了反对共和国领导层的运动。这里同样成立了“纪念碑”协会萨兰斯克市分会。1989年在“电气整流器”厂创办了“民主倡议”社会政治俱乐部。随着“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捍卫改革委员会”的成立，1990年蓬勃的群众性集会浪潮推动了“民主俄罗斯”思想的普及。摩尔多瓦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给州委带来了如此残酷的政治竞争，这使得州党组织内部出现了分裂，并与其盟友-苏共市委、区委第一书记结成同盟，使得多年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А·И·别列津(А.И.Березина)的离任<sup>①</sup>。

1988年5月，古比雪夫成立了“透视”社会政治俱乐部。正是该俱乐部发起的群众集会导致了州委第一书记Е·Ф·穆拉维约夫(Е.Ф. Муравьева)的离任。由民主派非正式团体组织（“透视”、梁赞及坦波夫“纪念碑”、“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捍卫改革委员会”、乌德穆尔特“民主运动”、楚瓦什“民主选择”）发起的1989-1990年间的群众集会，显示了其强大的力量及目标的明确性。他们直接

---

<sup>①</sup> Полутин С. Республика Мордовия: Хрон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1989-1998). С. 155-157.

促使了官僚领导阶层的干部数量的减少，并推举那些与过去的官僚领导阶层毫无关系的新人进入地区政治中心。

民族共和国党的精英开始迅速地被非正式组织挤出了现实的政治舞台。各州委第一书记不得不参加反对派的群众大会，因为他们无法忽视来自反对派的这股强大的民族文化冲击。然而，反对派并未打算与他们对话。1990年2月25日，在切博克萨雷举行了近万人的群众集会。事实上，他们并未给第一书记 А·П·彼特罗夫（А.П. Петров）说话的机会。

在各州并不存在民族因素。官僚领导阶级从前没有过这样令人不安的竞争者，于是他们努力适应新的现实，比如，群众集会的力量，已经“整倒”了我们所列举的三位州委第一书记（А·И·别列津，А.И. Березин）、Е·Ф·穆拉维约夫（Е.Ф. Муравьев）和 А·П·彼特罗夫（А.П. Петров）。在梁赞州和坦波夫州集会也同样取得了成功。

**解释 10** 地下出版物以及独立刊物与官方媒体竞争。地下出版物以信息公报的形式兴盛起来，如《促进》（坦波夫）、《四月的风》以及《自由之街》（梁赞）。如果不是这样，显然，也就不会发生 Т·胡多彼娜（Татьяна Худобина）轰动一时的举动——当时她是梁赞州电视台的通讯记者，在1989年12月11日采访了 Н·В·马罗特科夫（Н.В. Молотков）。

**解释 11** 1990年春因地方选举引发的冲突导致了官僚领导阶层内部的重大变化。对现象的具体分析将在下一章给出。这里只是指明这种趋势，不会作更多介绍。

**A 方案** 成功的领导人于1988-1990年被调到党的“前线”（成为市委或区委第一书记），后被选举为苏维埃主席。

**B 方案** 成功的领导人于1990年被选举为苏维埃主席，后成为苏共市委或区委第一书记。

**C 方案** 将苏共机构的工作人员安置到苏维埃。在这种意义上，1988年9月8日由戈尔巴乔夫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可以看作是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一种预兆，会上讨论了其1988年4月24日《党的机关改组问题》的报告。自1989年2月起，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开始被派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几十人的工作有了着落。（例如，1991年5月安置了超过60人的工作）<sup>①</sup>。在各州党委、区

---

<sup>①</sup> Архивы Кремля и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делу КПСС». Аннотированны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й в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й суд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делу КПСС»/ Сост. И.И. Кудрявцев; Под ред. В.П. Козлов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1995. С. 200, 201, 228, 235, 261, 262.

党委、市党委这一活动始于 1990 年春。各市区委书记、各部门负责人开始在苏维埃任副主席，普通职工转入各苏维埃机构工作。

占有两个职务的第一书记首先要面对选择，要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失去了第一书记的职位并未使其失去苏维埃主席的职位。但错过或是失去代表的位子，则不可避免地让他告别党内的仕途。因此，党组织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在有利于苏维埃权力重新分配的情况下，主席的位子越来越具有吸引力。1990 年，各苏维埃的选举开始将旧的官僚领导阶层逐渐清除出党的机构，他们不能忍受竞争政策的环境或者感觉简直被竞争所折磨。

**解释 12** 官僚领导阶层开始寻求新的、适应即将到来的后共产主义时代条件的道路。这样的道路至少有两条：一、与企业、银行以及其他系统的利益疏通，待到时机成熟之时到那边去；二、进入到权力执行机构工作。按照旧的观点来看，这被认为是一种降职，而在 1990 年以后就不再这么认为了。

**解释 13** 党自身的商业化。在苏共中央 1990 年二月全会通过有可能性向多党制转变的决议之后，紧接着的便是实施金融组织方面的计划。可以认为，管理苏共中央事务的 Н·Е·克鲁奇娜(Н.Е. Кручина)和领导国家中央法律部的 А·С·巴甫洛夫(А.С.Павлов)的报告《鉴于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90 年)的结论，论研究党的活力的若干法律视角的必要性》是其开端。数千万卢布的款项从苏共预算中被划拨用于创办小型企业和合资企业。这些资金要么转到国外，要么转入“共产党银行”存款账户<sup>①</sup>。预先划拨土地，租赁房屋、利用特殊的关系，保障信息。中央机构派了负责人前往国外进行谈判(奥地利、美国、法国)<sup>②</sup>。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 1991 年 7 月 11 日 10/2 号决议《关于党委和党机关的生产经营活动》<sup>③</sup>标志着商业化的结束。

地方上的这类事例我们只知道一个。1991 年 2 月，苏共坦波夫州委成立了一个名为“改革”的小型企业，苏共坦波夫市委书记 В·Ф·瓦洛特尼科夫(В.Ф. Воротников)于 2 月 14 日成为该企业经理<sup>④</sup>。他一面担任市委书记，一面从事商业活动，而在苏共解散后他仍继续留在商界，《设计》的监督人——苏共州委党的组织和人事工作部部长 В·П·洛加乔夫(В.П. Логачев.)也是如此。

党的商业化瓦解了官僚领导阶层及罗名制度。出现了新的仕途发展方向，同样，也出现了许多先前未曾经历过的诱惑。党的工作本身，以前被认为是生活的意义，现在被视为获得财富的手段。在地方上，能够把党的钱转为私有财产或是“毫无愧

① Архивы Кремля и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С. 231, 235, 256.

② Там же. С. 217, 238, 239.

③ Там же. С. 267.

④ ЦДНИТО. Ф. 1045. Оп. 50. Д. 1052. Л. 2.

色地”转而用于做生意的情况不可能很多。相应地，党的商业化在任何情况下对官僚领导阶层的瓦解都是有影响的。在苏联时期官僚领导阶层普遍规律的逻辑是起作用的。每个负责自己部门的党的领导人都有一定的机会可以使用上级交给他的资源。交换资源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只是在个人需求的范围内，不能超出这一范围。如果超出范围就会有必然的惩罚。惩罚可能是不同的：残酷的或是无情的，但更多是不严厉的，只是每次都会提醒官僚领导阶层：其权力有限。

罗名制度是一个网状整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关系网能够发挥作用，竭力提拔“自己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解决局部任务。频繁的人事调动、固定的集体领导制度，不允许官僚领导阶层扎根并占有主要的地位。总而言之，这个网不能将国家的东西私有化，不能代表国家说话。20世纪80至90年代之交，罗名制度不止是动摇而已。在提供给自己的干部们发财的办法之后，它开始急剧瓦解，丧失了发展及参与群众政治的能力。

所作出的评价没有一个是全面的，它们只是在整体上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各地，我们所提出的各种解释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整体上都是指向大刀阔斧的人事变动及自身的衰弱。

## 二、1988-1990年的党内选举

总书记的公开声明短时间内改变了对党的机关的要求及其形成机制，同时也改变了其成员构成。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通过差额选举来选举党委书记的决议。对于总书记及其周围亲信来说，选举制是改革极其重要的部分，是祛除邪恶的灵丹妙药，没有了选举制国家就没有了历史性的前景。在我们看来，“改革”、“选举”这两个术语，在戈尔巴乔夫政治实践中的某个时期是同义的。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党的机关如何理解并推广这一变化以及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选举？在这个意义上，从我们所举的事例中积累了怎样的实践经验？这又会导致怎样的政治后果？

戈尔巴乔夫关于干部问题的思想的中心，是被其称为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总书记并未试图对做解释，这引起了怀疑和误解。戈尔巴乔夫一贯的评论者——苏联驻波兰大使В·И·布洛维科夫（В.И. Бровиков）在1990年2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指出了“改革”概念的不明确性：“我们至今未能赋予这

一定义具体而又明确的内容”<sup>①</sup>。全会上，对于党要不要改组、是否已经开始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sup>②</sup>。对于改革的“建筑师”А·Н·雅科夫列夫（А.Н. Яковлев）来说，现实是改革的土壤<sup>③</sup>。而Н·И·雷日科夫（Н.И. Рыжков）则认为，改革是对历史的背叛<sup>④</sup>。

戈尔巴乔夫应该亲自作出解释。从他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里，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分析家有些内容也未必能明白：“现在人们经常谈论并写道，改革还未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他们会问，这一点何时才能实现。但改革并非是天上掉馅饼……”<sup>⑤</sup>。最后，在1990年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终于声明说，改革是党内群众的权力，这一点在当时以及后来都不会遭到反对。俄共领导人И·Ж·博罗兹科夫（И.К. Полозков），在1991年8月6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富有自我批评精神地说道：“……党的改组工作进行得还不太好，还没有体现党内群众的最高领导地位”<sup>⑥</sup>。

与此同时，关于改革的定义仍然没有定论。在1991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我们发现，这是党历史上最后一次会议），最后一次对术语问题进行了讨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Ю·А·普罗科菲耶夫（Ю.А. Прокофьев）指出，改革是党内高层，某种程度上包括对改革方案作出贡献的自由主义科学精英（党内高级科学人士）发起的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sup>⑦</sup>。

戈尔巴乔夫继承了列宁对改革的解释：改革就是所有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的改变，就如同曾经的新经济政策。他又进一步地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改革就是“发生在1953年、1965年、1966年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使我们内心剧烈震荡的事件，整个社会都沸腾起来了”<sup>⑧</sup>。

可以理解，在各地，基本定义的不明确、不具体，一定会引起各种冲突。苏共坦波夫州委第一书记Е·М·波多利斯基（Е.М. Подольский）呼吁党内干部更加严格地遵守规定和所提出的改革方针<sup>⑨</sup>，向党的机关引进能够打破常规思维、不抱残守缺

---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Пленума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5-7 февраля 1990 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 С. 84.

②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90. 5, 6 июля.

③ Яковлев А.Н. Реализм – земля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Избранные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и статьи.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

④ Рыжков Н.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М.: Новости, 1992.

⑤ Материалы XIX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28 июня – 1 июля 1988 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С. 41.

⑥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91. 8 августа.

⑦ Там же. 27 июля.

⑧ Там же. 28 июля.

⑨ ЦДНИТО. Ф. 1045. Д. 1371. Л. 41.



的革新者，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创造性地推行路线方针<sup>①</sup>，但这一切都还没看到成效。基层领导试图弄明白，“改革”的实践意义是什么。党、苏维埃以及经济部门的领导人义务汇报自己对改革所作出的个人贡献<sup>②</sup>，而在职务责任范围内——应对改革的速度负责<sup>③</sup>。在党的会议上要仔细查明，这个或那个领导是否进行了改革<sup>④</sup>，是否对改革付出了很多努力<sup>⑤</sup>。因此，对于领导们来说，改革的定义已不再具有难以理解的、抽象思辨及形式上的意义。现在他们所要操心的，不仅是宣传部门里的工作人员。如果连同你自己及周围的人都不明白什么是改革，那么你改革了吗？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一点。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解释。其中一种说法是（坦波夫区）：改革——就是拒绝区委的过分的要求，拒绝庸俗无能的干部和繁冗拖沓的空洞的会议<sup>⑥</sup>。在尼基弗罗夫区《俄罗斯》集体农庄全体会议上，当讨论可能的主席候选人时，其中一个发言者朴实的抱怨很具有代表性：“时下所有人都在说改革，但到底怎样改革，我们却不知道”<sup>⑦</sup>。或者摘录《列宁旗帜报》（热尔杰夫卡区）记者的一段话：“在候选人选举中占有优势的人，并非因为他的职业属性，也非他的官阶高低，而是其捍卫我们现在所谓的改革事业的决心”<sup>⑧</sup>。对这些专门名词的定义总免不了要落入俗套：改革——就是一种客观必要性<sup>⑨</sup>。

我们认为，对于戈尔巴乔夫的创新有双重反应。各地区党的领导人中相当一部分人都隐藏了自己的想法。各种报告和文章中都是一致支持的声音。对此都是持谨慎观望的态度。基层则完全处于最为糟糕的境地当中。一方面，“总书记”的命令铿锵有力，要求打破常规。但另一方面，各州委第一书记却是明显的毫不作为。因此，所有在各基层进行的事件都拖拖拉拉，甚至是反常。

中央委员明白这些吗？毋庸置疑，答案是肯定的。1990年12月11日在苏共中央有关部的副部长——组织部Н·佐洛塔列夫（Н. Золотарев）、意识形态部А·杰格佳廖夫（А. Дегтярев）以及社会经济部Н·斯塔申科夫（Н. Сташенков）——写给中央委员会书记Ю·А·马纳耶恩科夫（Ю.А. Манаенков）的分析报告中，我们似乎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记载。在报告作者们看来，许多地方党组织处于复杂的、愈来愈坏的环境当中，他们不能从茫然慌张的状态中走出来，他们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足够

---

① Тамб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 1987. 24 марта.

② ЦДНИТО. Ф. 1045. Оп. 44. Д. 246. Л. 510.

③ Свет Октября. Гавриловка, 1987. 10 апреля.

④ ЦДНИТО. Ф. 85. Оп. 25. Д. 62. Л. 24-25

⑤ Там же. Ф. 189. Оп. 32. Д. 231. Л. 8.

⑥ Там же. Ф. 1045. Оп. 50. Д. 894. Л. 39.

⑦ Там же. Оп. 51. Д. 1370. Л. 19.

⑧ Ленинское знамя. Жердевка, 1990. 3 марта.

⑨ Коммунист. Моршанск, 1987. 21 февраля.

进行独立政治斗争的力量。他们转而求助于上级党的机关，等待上级明确的态度以及关于众人所关心的改革问题的指示。这种对党组织的支持是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提供的<sup>①</sup>。

1991年1月4日，苏共中央民族政策部部长В·米哈伊洛夫（В. Михайлов）和党建及干部工作部副部长Ю·雷若夫（Ю. Рыжов）也是这样写的，似乎是针对苏共中央书记А·Н·吉连科（А.Н. Гиренко）。他们认为，由中央委员会书记马纳叶恩科夫（Манаенковий）和吉连科领导的协调小组能够帮助地方机关抵挡破坏性力量所带来的严重压力以及摆脱已经产生的茫然状态。小组成员可以是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员，报纸、杂志、克格勃、内务部、司法部及总检察院的党员工作人员。小组应负责进行政治形势的深入分析、地方党委的定位和协调工作。在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读到吉连科（Гиренко）写给中央委员会书记О·С·申宁（О.С. Шенин）的批语：“我认为，在这些提议中存在有某些东西”<sup>②</sup>。

我们认为，实际形势加速了官僚领导阶层的实用主义化进程。说些空洞的话是毫无意义的。来自中央的含糊其辞和不明确性，迫使官僚领导阶层严肃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前途和生活。如果不是从谁说的和说了什么出发，而是从谁做的和做了什么出发，那么，我们认为，以下的结论是正确的：在那种策略形势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试图通过基层组织的选举和压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使政治体制民主化、削弱党机关的权力。

1989年2月11日公布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组织的工作报告和选举的总结》的决议<sup>③</sup>。在仔细分析文件后得出的两点结论，可以说明很多问题：1.在该决议中可以看出，运动的显著特征是公开性、对党员甚至是党外人士的广泛吸引力。“党外人士与我们在一起”这一口号的提出成为1989年的新事物，在这种形势下，毫无疑问，这同时也成了官僚领导阶级在基层瓦解的一个标志。

2.各级党委开始更多地选拔能够在新条件下工作的干部，然而同时要指出，在区、市以及基层各级组织中党的活动的改革伴随着明显的困难，这些地方都缺乏专职的党务工作者。这种认识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的。先前希望在党的事业上谋求高升的人非常多。1989年仍在继续吸收这样的人。在一个原则性的“但是”下，希望新吸收的党务工作人员能有更高的素质。

该决议对选举运动也给予了政治性的评价。起初，不顾党的传统，是从负面进

---

① РГАНИ. Ф. 89. Оп. 11. Д. 70. Л. 1, 2.

② Там же. Д. 71. Л. 1, 3.

③ Об итогах отчетов и выборов в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1 февраля 1989 г.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 12-17.

行评价的。各级党委机关的改组及结构的变化未能对其工作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苏共普斯科夫和堪察加州委第一书记、76 位各市党委和区党委第一书记没有选出来。主要原因是领导层的专制作风和干部选拔中的错误。

同时，决议也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在政治局委员们看来，党的权力机构领导人的选举在民主的氛围下进行，符合苏共中央新的工作细则<sup>①</sup>。党的上级机关候选人由下级组织提名产生。候选人名单在报纸、广播上予以公布，并对党员和党外人士进行询访、展开问卷式调查以及利用其他方式以获取社会意见。三分之一的党小组长、差不多半数的车间和基层党组织书记、1117 名市、区党委书记（其中有 269 名第一书记）、8 名边疆区党委、州党委书记，从两个及两个以上候选人中被选为新一届领导人。各区党委、市委人员的更新率约为 62%，而各州委和边疆区委则为 58.6%<sup>②</sup>。

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 Г·П·拉祖莫夫斯基（Г.П. Разумовский）也谈到了在 1988–1989 年的总结及改选运动过程中干部队伍明显更新的情况。各边疆区、市委、区委有 1433 名新书记，各州委、边疆区委有 66 名（其中三位为第一书记）新书记走马上任。党的一些理论杂志也对总结及改选运动进行了分析<sup>③</sup>。毫无疑问，在代表会议、委员会、各级党委全会上，尤其是在党的刊物上 1987 年一月全会以后，展开了对决议的热烈讨论。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报告<sup>④</sup>，尤其是关于完善选举制度的构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sup>⑤</sup>。认为这是行动的指南<sup>⑥</sup>，是向民主的激动人心的转变<sup>⑦</sup>，是对过去经验<sup>⑧</sup>和列宁标准的回归<sup>⑨</sup>，是“正直人们灵魂的呐喊”<sup>⑩</sup>，是加速改革的手段<sup>⑪</sup>。同时，普通党员也明显地表现出对先前党内一些从不给下属任何好处的领导人的不满。各地的共产党员不仅将自己定位为党的一员，而且还是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当然，他们赞成新办法的实施：“现在普通劳动者将会享有更多的权利”<sup>⑫</sup>。

---

① Инструкция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выборов руководящих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ов утверждена ЦК КПСС 12 августа 1988 г. и конкретизировала положения XIX партконференции о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ой жизни.

② Об итогах отчетов и выборов в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1 февраля 1989 г.//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 15.

③ Важный этап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жизни парторганизаций (О некоторых итогах отчетно-выборной кампании)//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1989. № 4. С. 11-17.

④ Заря коммунизма. Уварово, 1987. 29 января.

⑤ Новая жизнь. Мордово, 1987. 5 февраля.

⑥ Коммунист. Моршанск, 1987. 6 февраля.

⑦ Серп и молот. Первомайский, 1987. 10 февраля.

⑧ Народная трибуна. Бондари, 1987. 26 февраля.

⑨ Трудовая новь. Рассказово, 1988. 2 декабря.

⑩ Мичуринская правда. 1987. 4 февраля.

⑪ Коммунист. Моршанск, 1987. 24 апреля.

⑫ Маяк. Токаревка, 1987. 5 февраля.

从讨论的氛围看，从哪里首先实行新的选举制呢？最初，是在各级经济部门领导人的选举中实行：一下子选出各个级别的领导人<sup>①</sup>；企业经理<sup>②</sup>、工作队长及工长<sup>③</sup>。苏共乌瓦罗沃市委第一书记Н·И·波诺马廖夫（Н.И. Пономарев）评价选举制度是在深化民主集中制和民族自治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他坚持必须要对企业、车间、工作组领导人进行选举<sup>④</sup>，而不再对更高阶层的人实行选举。而地方官僚阶层在等待建立一种对更上一层进行选举的标准——中层专家、基层组织的书记、地方苏维埃代表，企业经理则很少经选举产生。苏共加夫里洛夫卡区委第一书记В·П·戈列梅金（В.П. Горемыкин）将专家素质不高解释是由于选举不成熟的。<sup>⑤</sup>

除少数例外，地方高层官员没有实行竞争选举。1990年6月8-9日，举行了苏共乌德穆尔特州委第一书记的差额选举。当时的在任书记是 П·С·格里先科（П.С. Грищенко）。

由于其完全的合理性，新的选举制被批准用于坦波夫州的基层党组织书记的选举。莫尔尚斯克的95个党小组、勒扎克萨区（Ржаксинский）的65个党小组、萨斯诺夫35个党小组以及邦达里区的书记选举都是差额选举<sup>⑥</sup>。但还是有推广该实践的计划：1988年8月，萨斯诺夫卡区委规定，在全会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地区党的领导人<sup>⑦</sup>。

人们如何评价区委和市委选举的最初结果呢？在彼尔沃迈斯基区就响起了胜利的捷报（集体经济和民主选举的发展对生产力的状况产生了实质性影响<sup>⑧</sup>），如今也只是让人付诸一笑罢了。而在穆奇卡普斯基（Мучкапский），正相反，选举实践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区委提出——所有人都要进行投票<sup>⑨</sup>）。

普通党员将选举视为一种监督形式，“为了每个领导人、每个官员都意识到自己受选民的制约”<sup>⑩</sup>。他们提议，对被选出者党内任职的期限做限定<sup>⑪</sup>，并在提拔党的领导人职务时考虑党内基层组织的意见<sup>⑫</sup>。

---

① Ленинская правда. Сосновка, 1987. 5 февраля.

② Ленинский путь. Котовск, 1987. 3, 5 февраля.

③ Свет Октября. Токаревка, 1987. 1 февраля; Заря коммунизма. Уварово, 1987. 29 января.

④ Заря коммунизма. Уварово, 1987. 9 апреля.

⑤ Свет Октября. Гавриловка, 1988. 10 сентября.

⑥ Коммунист. Моршанск, 1988. 7 сентября; Знамя труда. Ржакса, 1988. 22 октября; Ленинская правда. Сосновка, 1988. 8 сентября; Народная трибуна. Бондари, 1987. 10 ноября.

⑦ Ленинская правда. Сосновка, 1988. 9 августа.

⑧ Серп и молот. Первомайский, 1987. 5 марта.

⑨ Заветы Ленина. Мучкап, 1988. 7 июля.

⑩ Коммунист. Моршанск, 1987. 6 февраля.

⑪ Звезда. Строюрьево, 1988. 2 июля.

⑫ Мичуринская правда. 1987. 12 февраля.

兹纳缅斯克区卡里昂—斯特罗戈诺夫车站的党员会议在讨论了1987年一月全会通过的决议后，向该地区的党员提出倡议，要在调整迅速对即将到来的列车卸车的问题上影响领导。对于普通党员能够真正地实际理解干部决议，这一消息是一个象征性的桂冠<sup>①</sup>。

现在我们再来看那些地区层面党内选举事实上也是以差额选举的方式进行的事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伊热夫斯克市组织第42次代表会议分了两个阶段进行（1990年6月2日和1990年10月20日）。在市委第一书记无记名投票选举的公报上列有两位候选人：担任造纸机械科研生产联合公司副总工程师的Г·П·西博洛夫（Г.П. Зиборов）和担任苏共伊热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的М·И·库兹涅佐夫（М.И. Кузнецов）。投票结果如下：Г·П·西博洛夫：赞成票167票，反对票360票；М·И·库兹涅佐夫：赞成票346票，反对票181票。

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可以认为是实行差额选举次数上的领先者之一。以这样的方式选举出了阿拉特里、卡纳什、新切博克萨尔斯克各市委第一书记，伊布列西、共青城、马林斯克—波萨斯克、莫尔高希、雅里奇斯克各区委第一书记，加里宁（切博克萨雷市）、马林斯克—波萨斯克、齐维利斯克以及亚德林执行委员会主席。而且，苏共雅里奇斯克区委第一书记是从五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的<sup>②</sup>。

是什么加快了党的民主化进程？以坦波夫为例，无论有多么奇怪，在州委甚至是党中央领导层干部身上还是发生了一连串的丑闻。

表 5：引起反响的坦波夫州党组织的丑闻

年份	对坦波夫党组织领导人的惩处
1986	所有米丘林斯克的高层领导人均被撤职、基尔萨诺夫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 州委第二书记被免职
1987	莫尔尚斯克和佩尔沃迈斯基区委第一书记被撤职
1988	兹纳缅斯克区委第一书记被撤职并开除党籍
1989	摩尔多瓦区委第一书记被撤职

1988年6月1日，区委召开了通报干部错误的全体会议。会上讨论了师范学院党小组的来信。会议赞同信中提出的要求，并解释了工作中的漏洞是由于党委和书记处在干部选拔时的疏忽造成的。在会上为审查提拔已损害自己名誉的干部的情况

① Сельская новь. Знаменка, 1987. 10 марта.

② Шабунин Д. Чуваш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Хрон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й в ЧР (1989-2001 гг.)//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хроника 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Т. 8: Республика Марий Эл, Чуваш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Slavic Research Center Occasional Papers: Special Issue). Саппоро: SRC, Hokkaido University, 2000. С. 125-126.

成立了委员会<sup>①</sup>。后来，有人写了揭露违反党纪情况的文章。有人批评个别书记，要求党在录用干部时不要作硬性指派<sup>②</sup>，“让群众参与到领导的选举中来”<sup>③</sup>。

差额选举在那些第一书记被撤职的地区迅速展开。对于州委领导来说重要的是用新的价值证明他的忠诚以及将干部问题的重担转交到地方党的工作者肩上。地区间的干部调动逐渐成为过去。当地人，毫无疑问，只会选当地人。正式是因此，可以说，丑闻和冲突对改革起了加速作用。

1988年6月10日召开的苏共州委机关负责人会议（是由波多里斯基主持的）上指出的，在差额选举的基础上选出了1600位领导人。但14名被替换的人中只有两人是区委和苏共中央书记。党组织工作部部长В·П·洛加乔夫（В.П. Логачев）承认：“我们并没有通过民主选举方式选出城市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及副主席、市党委以及区党委书记的范例”<sup>④</sup>。不过，该州积累的经验也不多。

1987年3月28日，莫尔尚斯克区委通过了《关于莫尔尚斯克区委第一书记的选举问题》的决议。1987年一月全会指出，党机关民主选举机制的形成，是提高党的活力、增添新鲜力量的必要条件。第一书记的选举应该以投票表决而非公开表决的方式进行，并应有提名多个候选人，这样才“符合党目前执行干部政策、确立民主管理原则方面的方针”<sup>⑤</sup>。1987年3月31日召开了全体会议。第二书记В·А·斯洛热尼金（В.А. Сложеникин）和区执行委员会主席В·И·古谢夫（В.И. Гусев）竞选第一书记一职。В.А.斯洛热尼金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获选。

一年后展开了苏共莫尔尚斯克市委第一书记的选举活动。征询了各市委委员的意见。大多数人都表示支持Е·В·萨谢托夫（Е.В. Соседов），他在1988年3月1日当选<sup>⑥</sup>。

1988年3月24日，兹纳缅斯克区委临时会议解除了来自外地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差额选举：第二书记П·Ф·巴拉诺夫（П.Ф. Баранов）获得40票中的13票，区执行委员会主席П·В·布德尼亚克（П.В. Будняк）获得40票中的27票<sup>⑦</sup>。为巩固“民主成果”，区内也进行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差额选举。

1988年11月10日，旧尤里耶夫区委扩大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书记。受邀出席会议的有监察委员会各委员、各基层党组织书记以及各企业负责人。此前不久，11月5日，进行了关于58名区委委员及候补委员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了区执委会

① Сельская новь. Знаменка, 1988. 2 июня.

② Там же. 28 мая, 7 июня.

③ Там же. 21 июня.

④ ЦДНИТО. Ф. 1045. Оп. 55. Д. 119. Л. 1.

⑤ Там же. Оп. 50. Д. 429. Л. 49.

⑥ ЦДНИТО. Ф. 1045. Оп. 50. Д. 939. Л. 34-46.

⑦ Сельская новь. Знаменка, 1988. 26 мая.

主席А·С·舒瓦耶夫(А.С. Шуваев)(31次被称为具有潜力的第一书记人选,6次被称为是具有潜力的第二书记人选)和人民检察委员会主席И·А·伊格纳托夫(И.А. Игнатов)(15次被称为具有潜力的第一书记人选,23次被称为是具有潜力的第二书记人选)的领先地位。随后,州委指导员与区委工作人员、生产部门领导人及党组织书记等举行了座谈会。根据保存的记录显示,这完全不是毫无意义的走过场。许多被调查者指出了舒瓦耶夫性格孤僻、人文素养不足的缺点。总是能听到:“这并不是一个人们会去找他的人……然而,他却是一个领导人”;“他曾担任过农工联合公司主席,……在那儿没留下明显的痕迹”。应该提名谁呢:是领导人舒瓦耶夫还是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伊格纳托夫?指导员的观点倾向于后者<sup>①</sup>,区委则提名舒瓦耶夫,而在会议过程中伊格纳托夫选择了放弃。通过无记名投票,舒瓦耶夫被全体一致选举为第一书记<sup>②</sup>。

1989年11月4日,摩尔多瓦区委全体会议进行了第一书记的选举。在会议之前交流了意见,确定了三位候选人:区委第二书记В·А·季什科夫(В.А. Тишков)、区执行委员会主席И·Д·费多罗夫(И.Д. Федоров)和列宁国营农场场长В·В·多尔吉赫(В.В. Долгих)。季什科夫和费多罗夫自动放弃。两者均以领导经验不足为由来解释放弃候选人这一举动。多尔吉赫通过无记名投票当选。在了解了候选人的初步讨论记录之后,事情变得颇为有趣。列宁国营农场党委的各委员把多尔吉赫——自己的顶头上司、被提名的区领导人描述成一个举止粗鲁、脾气暴躁、冷漠无情、喜欢发号施令的人。国营农场总工程师С·А·克利缅科(С.А. Клименко)总结道:“在这样的压力下很难工作”。总农艺师А·В·罗曼诺夫(А.В. Романов)对多尔吉赫的意见能说明很多:“性格上他是一个革命者,区里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人”<sup>③</sup>。多尔吉赫于1991年7月22日,即在叶利钦签署了去党化命令的两天后,放弃了职务,成为最早回到农场的许多第一书记中的一员<sup>④</sup>。

1990年3月20日召开了索斯诺夫卡区党委全体会议。早在2月14日成立了提出倡议的小组,负责在区里及区外提出第一书记候选人<sup>⑤</sup>。研究的同时会考虑到基层党组织和劳动集体的意见。有26名候选人被考察。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了任州委农业部指导员的Н·И·库利科夫(Н.И. Куликов)为区委第一书记<sup>⑥</sup>。

① ЦДНИТО. Ф. 1045. Оп. 50. Д. 537. Л. 45-47.

② Звезда. Староюрьево, 1988. 12 ноября.

③ ЦДНИТО. Ф. 1045. Оп. 50. Д. 1058. Л. 21.

④ Там же. Л. 41.

⑤ Там же. Ф. 479. Оп. 37. Д. 155. Л. 15; Ф. 1045. Оп. 50. Д. 760. Л. 46.

⑥ Ленинская правда. Сосновка, 1990. 22 марта.

1990年4月22日，乌瓦罗沃市委成立了由14人组成的委员会，研究党员关于第一书记候选人的意见。委员会的组成相当民主。进入委员会的只有一位市委工作人员、还有各基层组织书记，领导人少有，主要是普通党员。委员会成员走访了大多数企业。1990年5月26日，在全市党员代表会议上进行了选举。无记名投票公报上列有四位候选人：市委部长Н·Г·戈列洛夫(Н.Г. Горелов)、化工厂党委书记С·А·格拉西莫夫(С.А. Герасимов)、企业经理М·И·伊万诺夫(М.И. Иванов)以及最后以显著优势胜出的佩尔沃迈斯基区委第二书记М·В·尼斯特拉托夫(М.В. Нистратов)<sup>①</sup>。

各基层领导人的竞选也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然而并没有选各州委第一书记时的行为准则和严格要求。从现代经验的高度来看，这可能看上去像是一种走过场式的伪选举。比如，兹纳缅斯克区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选举工作是由州委组织工作部筹备的。也进行了问卷调查：50份问卷中有20份推举第二书记П·Ф·巴拉诺夫(П.Ф. Баранов)为候选人，26份则推举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Н·Ф·波利亚科夫(Н.Ф. Поляков)为候选人。在区苏维埃会议上，州委指导员提名两位候选人，并就两位候选人列入6月15日的公报向州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州委会提出申请<sup>②</sup>。1987年7月1日，摩尔多瓦区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选举同样在一个更为糟糕的方案下进行<sup>③</sup>，象征性地进行了两次莫尔尚斯克市委第一书记的毫无可选性的选举(分别为1988年3月1日和1990年5月26日)。1988年能说明民主性的事件仅在于通过邀请基层党组织书记和企业负责人，扩大了市委全体会议参加者的成员。而在1990年，则就在于对28位市委委员和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进行了调查询问<sup>④</sup>。

### 三、结 语

苏共领导层“干部的迭次更换”可以用各种利益和政治形势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是一种为了变动而变动的干部更迭。对于苏共来说，政治干部队伍的更新换代、寻求“现代化的火车头”<sup>⑤</sup>——从领导人队伍中给党的机关加快注入“新鲜血液”，归根到底，对于消除罗名体系是极其重要的。

---

① Заря коммунизма. Уварово, 1990. 28 апреля, 29 мая; ЦДНИТО. Ф. 1045. Оп. 50. Д. 823. Л. 23.

② ЦДНИТО. Ф. 1045. Оп. 51. Д. 1310. Л. 46, 47.

③ Там же. Оп. 50. Д. 488. Л. 30-31.

④ Там же. Д. 939. Л. 45-46; Д. 1019. Л. 13-17.

⑤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Вех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М.: Интеллект, 1998. С. 339.



这一趋势已显露出来，并导致了党内官僚阶层干部的急速更迭。该趋势被赋予了一个鲜明的标记。同时，书记的选举、首先是党和国家内部机关书记的民主选举这一具有吸引力的思想，为总书记赢得了社会的支持。

总书记及其周围的亲信积极地不断地推广形成选举制、党的机关竞选机制的思想。党的选举被他们描绘成是改革的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没有改革国家就不会有历史前途。

选举很少能摆脱派别间的冲突和相互矛盾的政治方针。在同一个文件中，一面会要求提拔党外人士，提拔达到了民主化和公开化的所有人，然而同时又要加强政治警觉性、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维护保密制度<sup>①</sup>。时代的政治矛盾就在于此。总体上可以这样总结，党内选举的组织进程，是潜在的、但却是实质性的对精英招募动员模式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符合向民主转变的逻辑。

此时需要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两个举动——干部迭次更换和选举——急速地动摇和瓦解了苏联共产党。不论是“干部的迭次更换”还是选举，都破坏了传统的官僚阶层的实践。这些并未给领导阶层引进新人，却促进了党内生活的非神圣化。毫无疑问，也促使了苏共和苏联的解体。

这是国家去党化的第一次浪潮。第二次将是在 1990 年，伴随着各级苏维埃的选举、权力从苏共向苏维埃的转移、一人身兼多职政策的开始（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州委第一书记——州苏维埃主席、市委第一书记——市苏维埃主席），以及决议权从党的机关到苏维埃机关的转移。第三次管理系统的去党化浪潮将始于 1991 年 6 月 12 日的俄联邦总统选举后，叶利钦(Б.Н. Ельцин)当选总统以及 1991 年 7 月 20 日公布其《去党化》命令之后<sup>②</sup>。关于这些内容，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讨论。

(李小霞 译 班婕、孙晓倩 校)

---

**【Abstract】** The policy on election and nomenklatura system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from 1985 to 1990, adopted by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Gorbachev, ha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A series of pressing issues of political discipline could find answers by studying the changes on leadership of the nation and regions (take seven federal subjects as example). How did Gorbachev form the hierarchy of position in the Party?

---

① ЦДНИТО. Ф. 1045. Оп. 44. Д. 246. Л. 4, 13.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СФСР «О прекращени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х структур,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и массовы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движений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ах, учреждениях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РСФСР». 20 июля 1991 г.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lite Project”? What kind of interrelation is between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cadre policy and innovation intention? In fact, Gorbachev’s cadre policy is a kind of combination of the “cadre replacement” and election within the Part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two systems resulted in the rapid collaps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which also was the first wave of non-Party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 Gorbachev, “Nomenklatura System”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cadre policy, non-Party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Аннотация】** В стать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политика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М.С. Горбачева по подбору и расстановке кадров руководяще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 КПСС в 1985-1990 гг. (д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ов в марте 1990 г.). Исследовав союзны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на примере 7 субъектов РСФСР) уровни власти, автор ответил на ряд актуальных дл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вопросов. Какими методами формировал М.С. Горбачев партийную иерархию? В чем смысл его «элитной инженерии»? Каково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ых и инновационных интенций в его кад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Автор статьи говорит о кад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М.С. Горбачева как о сочетании «кадровой чехарды» и 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ых выборов. Обе схемы отправления кад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разваливали КПСС. На взгляд автора, это была первая волна департизаци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СССР.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М.С. Горбачев,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КПСС,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департизация аппарат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

(责任编辑 封帅)

## 苏联解体：影响篇

# 中东欧独联体政治经济转型 20 年： 约束条件与转型政策、策略选择\*

徐坡岭 韩爽\*\*

**【内容提要】**回顾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转型的方式和路径受制于转型的约束条件。其中，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的相互制约关系尤为复杂。在复杂的约束条件下，转型的政策空间是受限的。转型目标、转型的策略选择与次序安排相互制约，共同规定了转型的基本方向和演进轨迹。

**【关键词】**转型 政策空间 策略选择 约束条件

**【中图分类号】**K512.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5-0090-(15)

经过 20 余年的转型实践之后，关于转型的许多问题，如转型目标、任务及其实现路径的政策安排是如何确定的，是否存在合理的转型策略以确保转型向既定目标收敛，等等，我们仍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已有的研究文献之所以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系统性的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转型作为一种复杂的系统性制度变迁，我们对其约束条件和内在机制的理解还相当肤浅。同时，无论单纯从哪个侧面去解析转型，我们所拥有的合用工具也相当有限。特别是当我们致力于把政治和经济转型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时候，更是如此。

从中东欧独联体国家 20 余年的转型实践看，转型决策通常遵循以下原则：学者们通过理论抽象设定一个理想的社会系统蓝图，确定明确的转型目标，进而根据当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强国战略’的经济内涵及对中俄经贸关系的影响”(04BGJ012)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转型政治经济学导论”(项目批准号：10JJDGJW009)的阶段性成果。

\*\* 徐坡岭，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爽，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时亟待解决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向政治家提出相应的转型政策方案。在这些政策设计中，多重转型任务的相互分离和对社会演进的单向性刻画，往往是其内含理论逻辑的重要特征。然而在实践中，无论是政治民主化转型还是经济市场化转型，其走向常常并不收敛于理论逻辑所确定的状态。尤其是，当我们把转型轨迹演化作为观察对象时，我们发现，转型的政策空间、策略选择以及转型路径演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并均受制于一系列约束条件。本文尝试对这些具有系统性特征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一部分讨论转型的政策空间及其决定因素，第二部分辨析转型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第三部分探讨政治经济双重转型条件下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的相互关系，第四部分探讨多重任务和复杂约束下的转型策略选择问题，最后是简要结论。

## 转型目标、任务与转型政策选择集

如果把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作为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的基本目标，那么，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怎样的政策？在转型的每个阶段是否都存在一个政策选择集，以使得影响转型的各利益方有可能在不同政策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转型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组织的，而且在转型过程中存在议事日程的主导力量，那么推动转型的主导力量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和研究不同国家的转型所必须予以关注的。

一般而言，完成一项任务的工具和手段取决于要达到的目标以及面临的约束条件。任务的性质决定了工具和手段的类型和数量，面临的约束条件则决定在诸多工具和手段中哪些是可以被选择的。要治疗一个身患重病的患者，药品和治疗方案可以有很多种，至于如何选择，要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进行优化。同理，转型的目标和约束条件决定了政策空间以及政策空间内的政策选择及其政策组合，不合理的政策选择及其组合将会付出代价。

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关于转型的目标并没有明确一致的表述，这主要是因为在实践中民主政治的组织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并没有固定的统一模式。各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是多样化的，而且难以判定孰优孰劣。那么，对于转型国家来说，转型的目标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一点，尽管学者们看法不一，但关于要建立的未來制度框架的一些基本特征，共识还是多于分歧：

——政治民主化方面。通过在政治领域实现政治生活的可参与性与政治权力的非垄断性，解决政治权力配置的不合理问题，提高社会的公平性；引入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平衡关系，解决政治透明度和权力滥用问题；建立具有

包容性的政治权力结构，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和配置不公，促进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

- 经济市场化方面。<sup>①</sup>通过引入有弹性的相对价格，并创造出对世界经济开放的竞争性市场，纠正计划经济的扭曲，从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稳定宏观经济，为价格体系的正常运作从而发挥价格的资源配置功能创造条件；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和公司治理安排，使企业能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这方面的关键问题是通过私有化或民营化厘清产权，同时鼓励新的企业进入市场和创造企业家阶层；创建对市场来说“适度”的政府。政治和制度稳定，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来自政府和社会犯罪的侵犯），保护纳税人不受利益集团寻租行为的损害。
- 对外关系方面。融入国际体系，寻求更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和利用外部资源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 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推动并保障社会走向民主、文明和富裕的制度结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转型的目标设定有着丰富的内涵。如果把转型看作是治疗和重建的过程，那么针对不同的任务性质就有不同的方案和工具选择。

就政治民主化转型而言，它属于政治制度改革和重建。政治转型是政治结构的根本变化和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可能甚至必然会触及社会矛盾，并引发利益对抗。这样，政治转型就存在两个根本对立的途径：或者旧政权自我更新和改革，实现温和的民主化转型；或者发生政权的骤然转移，通过两个途径实现：或者是旧政权自动让位，或者是以发生“革命”的方式实现。具体地讲，路径与方案如下：

**表 1 政治转型的目标、路径与方案**

目标	方式	途径	手段	速度	
政治民主化	政权转移	和平转移	全民公决/选举	起点： 快或慢	过程： 速度发 生调整 和变化
		非和平转移	革命/暴动		
	政权不转移	改革	自我实施，比如通过		
		改良	领袖更迭实现		

经济转型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主要由两个层面的机制和体制构成：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机制、激励和约束机制。前者的核心是竞争和自由价格形成机制，后者的核心是产权与契约法律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制约、相

<sup>①</sup> 热诺尔·罗兰对此进行过相关讨论。参见[比]热诺尔·罗兰著：《转型与经济学》，张帆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互补充进而共同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经济人对未来有稳定预期，这就要求规则体系完善明确，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因此，经济转型在政策上将有以下可选方案：

表 2 经济转型的政策集

目标	领域及内容	途径与方案		次序	速度特点
经济市场化	信息传递与处理	价格自由化		各领域政策同时展开，或分领域逐次展开	起点：激进或渐进 过程：速度会有调整
		市场准入与竞争			
	激励与约束	产权及保护	民营化		
			私有化		
	稳定预期	财政货币政策			
法律与规则建设					

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阵营，其发展和安全都受制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为这些国家重新定位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位置提供了机会。从而，融入国际体系成为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其目的是寻求更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和利用外部资源促进国家发展。这方面的政策集可以作如下概括：

表 3 融入国际体系的途径与方案

目标	途径	方式	手段
融入国际体系	全方位开放	不结盟政策 或 加入集团化组织	平衡外交 加入国际组织 加入国际政治军事安全组织 参加区域一体化制度安排
	有限开放		

如果把上述三方面的政策进行类型化组合，并赋予其具有标示性的名称，可以有以下分类：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组合和制度演化主义的政策组合；民粹主义转型政策和开放性转型政策。<sup>①</sup>上述政策组合在现实中可以找到案例，如波兰、俄罗斯启动转型的“休克疗法”可以被看成是新自由主义和开放性转型政策的代表；匈牙利的政策组合则更带有制度演化主义和民粹派的痕迹。上述转型初期的政策组合、转型过程中的政策调整与转型的约束条件密切相关。

① 参见贝拉·格雷什科维奇的分析。[匈]贝拉·格雷什科维奇：《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张大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164页。

## 转型的约束条件与政策空间

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分析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公式化分析逻辑。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投入产出静态分析中，绝大多数的经济决策都可以归结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即投入和技术既定条件下的产出最大化问题，或者技术和产出既定条件下的成本最小化问题，抑或是市场既定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问题。<sup>①</sup>把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分析逻辑应用到转型问题的研究中，转型道路、目标、次序等方面的政策选择就成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分析。许多学者在转型研究中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这种分析逻辑。但遗憾的是，关于转型约束条件的探讨还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也不够严谨，从而研究结论的说服力难免大打折扣。

### 1. 转型的初始条件与约束条件

迄今，无论是模型化的理论分析还是基于实证经验的归纳探讨，往往不加区分地使用“转型的初始条件”与“转型的约束条件”这两个概念。但如果深入思考就会感觉到，对于转型研究而言，这样做在理论上是有失严谨的。关于转型约束条件的描述或罗列，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用“转型的起点”或“转型的初始状态”来表示。在我们看来，这是对转型约束条件的简单化理解，因为这样的概括，即使详尽和周到，充其量也只是给出了转型列车出发地的客观状况，并没有指出转型列车行进途中的轨道状况。我们认为，转型的约束条件是两方面因素的综合，即“转型的初始条件”和“转型过程的约束条件”。<sup>②</sup>

转型的初始条件构成转型约束条件的第一个层面，它决定了转型启动的时机、转型方式的选择和转型目标的设定。从历史发展的断面作静态观察，转型的初始条件一般包括如下内容：

——经济形势：包括经济增长状况（一定年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经济稳定状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率、经济危机风险）、经济结构状况（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等）、消费品供应状况（相对于需求的数量与结构）、

---

① 在许多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中，都做出过相似的归纳。这种分析问题的逻辑方法在经济学的数学化发展中最表现得最为充分。如蒋中一和凯尔文·温莱特在其所著的《数理经济学基本方法》中，就重点阐述了运用数理方法进行约束条件下最优化分析的逻辑和方法。参见蒋中一，凯尔文·温莱特著：《数理经济学基本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第172-198页。

② 学者们一般都很重视对转型初始条件的梳理和描述，并从中分析转型的目标、转轨方式、转轨启动时机选择等政策背后的原因。但对于转型过程的约束条件则看法不一，即使有学者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往往并不把这方面的因素归结为约束条件，而是在其他分析层面上进行处理。罗兰（2000）是第一个把转型过程面临的总的不确定性、政策互补性和政治约束看作转型过程的约束条件，并作正规模型化处理的学者。参阅热诺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2002年，第25-26页。

收入分配状况（一定年份的收入变化及其趋势、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政府收入与管理控制经济的能力以及国际收支状况等；

——政治形势：政治权力结构（政治制度）、政治稳定性（包括政治冲突、反抗、游行示威、罢工等）、社会矛盾与社会安全（犯罪率等）、政党结构与政党竞争、意识形态状况（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意识形态体系的开放性、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号召力）、政府能力与政权的社会信任度等；

——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状况、民族状况、宗教文化状况等；

——历史条件：经济体制性质及其存续时间、经济改革史、政治制度演变史等；

——国际形势：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地位及处境、国际经济与政治形势等。

转型过程的约束条件是转型约束条件的第二个层面，是转型启动之后轨迹演变所面临的约束，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转型的政治约束与转型被逆转。转型存在着结果的总和不确定性，这与转型的动态演进性质和利益、权力再分配性质有关。由于转型过程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所有领域，在本质上又表现为制度变迁和权力、利益调整，因此，转型进程必然受到利益损失一方的阻挠和抵制。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再配置必然存在集团性利益冲突，这样，新生权力的合法性就决定了转型启动后能否顺利地存在下去。这样，转型启动后，是否会顺利进行？还是会停滞或被阻挠？都导致转型结果的总和不确定性。确保转型不被逆转，是转型进程面临的首要约束；

——转型演进中的效率与利益共享约束。经济转型的目的是实现效率增进，而经济效率的改善又为政治转型提供合法性。但转型的利益再分配属性意味着新经济制度下的转型红利不一定被社会大众分享。这样，转型后效率目标能否得以实现？效率目标达成后能否使转型红利被共享？就成为解释转型合理性的又一个决定性因素；

——转型的复杂性约束。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随着转型的深入，获利者倾向于保护既得利益，在一定时期内会成为进一步转型的阻力；另一方面，转型是各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过程，如果子系统转型缺乏互补性，可能阻碍整体转型的顺利发展。因此这就要求，在转型的总体设计和规划不变的前提下，有必要对转型的策略和阶段性目标适时地进行调整；

——国际环境变化对国内政治经济转型造成的约束。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与外部环境有关，外部环境是大规模转型的重要催化剂。但随着转型的深入，国际形势也可能成为一国转型的阻碍因素。

把上述两个方面的约束条件纳入到对转型问题的系统分析中，我们可以有一些



简单而且可靠的判断：启动转型的政策空间由转型的初始条件决定，同时需要考虑转型过程的约束条件；转型过程中新的条件变化决定了政策调整的方向和调整幅度。

## 2. 转型的政策空间

一般而言，转型都是有组织进行的，即使最开始的变迁带有局部的性质，但大规模的转型一定存在主导转型议程的组织力量，这种组织力量或者是通过政权更迭走上前台的，或者是既有政权通过政策的调整而被公共选择力量委任为转型的组织力量。无论如何，只要宪法秩序打开或提供了可以转型的空间，那就意味着转型已经被置于主导力量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生主导力量的更替）控制之下。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转型政策集内有多种可能的组合可供选择。但是，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将被选中并执行，这并不是转型组织者主观可以决定的，而是受制于转型的约束条件。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选择的政策方案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说，转型的政策空间并不很大。就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关系看，至少以下约束条件会制约政策选择：

首先，经济形势是重要的制约转型政策选择的基本约束。转型前经济形势的好坏，决定着转型的优先方向。非常恶化的经济形势一方面会加速转型的启动，另一方面也可能促成一些转型方面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着眼于近期经济目标，忽视制度结构的调整等。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形势不存在导致政权垮台的危险，也会导致制度转型的拖延。

其次，政治形势是另一个重要的制约转型政策选择的基本约束。权力当局会根据政权的稳固性相机选择，决定是否要进行转型，何时启动转型，确定怎样的转型方向和目标，以及考虑转型政策将对主要选民产生怎样的影响。转型有利于获取并巩固更大的政治支持，是转型组织者确定政策组合的重要考虑。

第三，社会结构是影响政策选择的第三个重要变量。这方面至少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社会的组织程度，比如是否存在自组织程度比较高的公民社会（如部分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就业结构和居民分布的地域结构；民族构成；工会或中间组织的力量等。根据社会结构的演变，初始的政策组合也会发生变化。

第四，政治文化与宗教习俗。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积淀反映在政治文化和宗教习俗等社会意识层面，决定了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生态。在转型国家，这方面的差别显著存在，比如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以及中亚国家等，它们的政治文化以及宗教习俗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选择的内容。

第五，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性冲突对政策的影响。转型启动后，由于利益平衡迅速转换，初期的转型政策引发社会冲突的概率非常高。这就存在对利益损失者的补偿问题。利益损失者的组织程度以及对补偿的反应，决定了转型能否继续或是被搁

置、拖延或暂缓。

第六，转型政策后果的政治反馈与政策调整的可能性。这是转型过程中制约后续政策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第七，新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不完善的。“干中学”的民主能否起到利益平衡器的作用，能否有效地为社会利益冲突提供合适的妥协和解决方案，会影响到民主化转型的后续政策。还没有有效组织并运转起来的经济制度的经济效应也是值得怀疑的，社会大众是否准备好了为未来而忍耐，也值得怀疑。这都成为下一步政策选择的较为刚性的约束。

## 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的相互关系

在系统性社会转型中，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之间的关系是影响转型进程、转型方向和转型绩效的关键性因素。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之间的相互制约或协同关系，是转型过程的重要约束条件。

由于无论从转型的动因还是从转型的发生机制看，抑或是从转型的社会效应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之间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一个系统性的社会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协同性、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前后时滞，必然要表现出一种复杂性。如果从中东欧独联体国家的转型来看，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之间的协同关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背后的原因有待探讨，但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并不否定在转型过程中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多样性。<sup>①</sup>

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在转型启动时点上，由于各转型国家面临的初始条件不同，导致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先后次序及其相互关系复杂多变；第二，在转型过程中，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轨迹演变的非单向性导致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关系复杂多变；第三，就转型绩效而言，由于各转型国家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宗教习俗以及其他人文社会资源和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差异，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对综合转型的时间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

尽管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个关于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相互关系复杂性的经验样本，但从抽象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可以从总体上对二者的关系加以把握。

### 1. 政治转型决定经济转型的边界和可能性，政治转型的发生概率低于经济转型。

---

<sup>①</sup> 如果我们把转型的视野扩大到拉美、东南亚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更加明显，当然，这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政治制度虽然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但它一旦建立，就通常表现出相对稳定性，并决定着经济制度创新和变迁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转型的概率一般要低于经济转型。

首先，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政治制度比经济制度表现出更加稳定的特性，从而政治转型也比经济转型的频度更低。<sup>①</sup>这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各自的特性和决定因素有关。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它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前进开拓道路。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力的特征决定的，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时候，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生产关系将被迫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诸方面的综合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上层建筑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等。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的产生、发展和变革都不能从它本身来解释，而只能由它的经济基础来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表现在：（1）当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刚刚建立起来时，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同自己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尽管存在不完善的环节和方面；（2）经济基础是变化的，当它处在相对稳定的阶段，在量变和部分质变的时候，也要求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和进行局部的调整；（3）当某种社会形态已经走向腐朽，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就会同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经济基础的变革的客观要求形成尖锐的对抗。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对上层建筑加以根本性的变革，以建立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的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的诸特征，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特征。如果我们把经济制度转型看作是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革，把政治制度转型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政治制度将表现得更加稳定，经济制度的调整频度更高。特别是，在历史长河中，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一种稳定的政治制度可能会容纳多种形态的经济基础。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制约和引导着经济基础的调整与发展。

如果用形象的方法刻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稳定性与变

---

① 不包括同一性质政治制度下的政权更迭和朝代更替。

革，生产力的快速变化和上层建筑的缓慢演进可以说是社会历史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也许可以更加细致地刻画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以道德价值观为核心的文明样式是社会最高层次的特征，在宗教、文化、习俗等社会意识中蕴含的价值观决定了以政治架构和经济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中，物质技术生产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我们得到的是关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四层次关系：在这种四层次结构中，意识形态因素成为最高层次的环境因素，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分别成为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组织结构框架，以技术水平为核心的物质生产受上述三种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效率层面、利益配置层面和社会价值与财富观层面对物质生产起到引导和约束作用。

其次，由于政治制度是配置法定政治权利的社会、政治安排，<sup>①</sup>具有划分和设定社会阶层和集团利益的作用，因此，它决定着经济制度变迁是否被政治权力认可，并决定着制度创新的边界。

政治制度表现为权力在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配置与组织，经济制度则更多地表现为对个体权利边界的划分。经济制度创新直接产生效率和利益，并改变权利边界。政治制度转型则对社会阶层的相对地位重新界定。经济制度的变迁直接受技术生产力的推动，政治制度则为经济制度的变迁设定了基本边界。被政治制度认可的制度变迁将被纳入到现有制度体系中，并且不改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相对均衡。超出政治制度许可的制度创新和变迁将被压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只要政治制度结构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制度弹性，它将在自身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容许经济转型的发生。<sup>②</sup>仍然也可以得出结论，政治制度比经济制度更加稳定，发生根本变革的频度相对较低。

## 2. 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先后次序是不确定的。

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发生的先后次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弹性和开放性。依据政治制度结构的弹性和开放性差异，将会出现两种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先后次序。

首先，在政治制度结构缺乏弹性且政治权利框架缺乏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条件下，政治转型将先于经济转型发生。

经济制度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其效率状况决定了自身转型的必要性。但其转型的可能性却要受到政治制度的制约。在不同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下，要求有

---

① [美]达龙·阿塞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著：《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马春文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② 这一点在下面的问题中进一步展开。

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是资源配置方式中最为典型的两种，其效率与不同的生产技术状况以及经济形势（比如危机还是繁荣）有关，但与道德价值观、政治制度性质的关联度则要低一些。如果政治制度不能提供经济制度调整和转型的足够空间，那么，在效率恶化引发社会冲突、社会冲突的利益表达又无法在现有政治框架内实现与调和的话，必然会使得经济转型的诉求累积成政治转型的压力，从而导致政治转型先于经济转型发生。或者，两者几乎同时发生，因为在政治转型为经济转型打开空间的刹那间，前者的立即发生一下子变得非常容易。中东欧独联体国家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的次序，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情况。

其次，如果政治制度具有足够的弹性和开放性，就有可能在政治制度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发生经济转型。

如果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观察和剖析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我们将发现，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分别具有自发性局部制度创新的帕累托利益分享性质与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利益再配置属性。如上所述，经济制度虽然也是利益关系的配置和界定框架，但它在更大意义上规定的是个人权利的状况及其相对位置，并以效率为基础。也就是说，生产组织方式首先是以效率为目的，并取决于生产力技术水平，其次，生产组织方式才具有再分配意义。<sup>①</sup>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形成稳定的均衡关系之后，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格局基本确定，此后，在经济制度的调整没有发生质变之前，特别是其调整还带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时候，政治制度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如果此时政治制度结构具有足够的弹性，政治权力架构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那么，即使经济制度发生了系统性转型，政治制度也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性。<sup>②</sup>中国和越南政治、经济转型的实践就基本属于这种类型。

## 政治经济转型的策略选择与次序安排

政治经济转型至少要实现三重阶段性目标：确保向民主过渡，这其中包括不会发生逆转或向其他体制模式收敛；确保市场化方向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出水平；确保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良性互动，整体推进。而要实现上述目标，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这就要求在政治经济转型中具有高超的政策艺术和策略选择，政策的次序安排必须适当。

### 1. 确保向民主过渡需要多重条件，经济稳定增长至关重要。

---

① 不过，随着经济制度转型的展开，经济制度的利益再分配功能的重要性也会随之上升。

② 当然，随着技术进步对决策方式提出新的要求（比如现代信息技术要求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都具有分散化和可参与性），经济转型会要求政治制度做出相应调整。

如何保证民主制度成为威权体制倾覆后诸多可能的演化结果中被选择的政治制度，是政治转型的核心议题。民主是一种动态的自我执行制度，迈克尔·沃格姆斯（Michael Wohlgemuth）在其论文“民主：一种演化分析方法”中提出：政治偏好和主张是建立在不可靠的推测和理论之上的；民主主张的形成是从一个永无止境的相互学习和发现过程中产生的；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霸权，而是现有大多数主张的可争议性。<sup>①</sup>这意味着，民主是一种自我执行的制度。从而，作为一种制度，自我执行的民主的确立和巩固需要许多条件，特别是当威权制度瓦解后，在众多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阖之中，自我执行的民主并不是转型时期唯一可能的结果。已经倾覆的威权体制可能会卷土重来，或者出现新的专制。或者，政治民主化进程因为各种原因而被主导力量终止。即使民主体制已经建立，它也不一定就能维持下去。相互博弈的政治群体总是努力使自己成为主导力量，并把自己偏好的体制强加于其他政治力量，以强化自己的政治优势。所以，巩固的民主只是威权体制崩溃后众多可能的结果之一。<sup>②</sup>

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治制度的演变往往是在改革派推动下进行的。在很多情况下，民主化政治转型的推动力量并不一定是多种社会政治力量中占压倒性优势的主导群体，或者即使其政治影响和社会基础超过了其他各派，但也不一定能够在博弈中战胜其他力量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化进程受制于几个方面的因素：改革派推进转型的博弈策略选择、改革派推进转型的政策安排、转型的经济后果以及改革派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

这样，要确保向民主制度的顺利转型，执行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的政策应当是最优先的任务。在实际转型中，通过发展经济获取社会政治支持，和变革产权制度扩大民主化与市场化的社会基础，经常成为两难的选择，这和转型的速度、方式和次序有关。如果次序安排合理，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经济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和其他政治派别的暂时妥协在很多时候也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要确保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包括思想舆论资源和国际援助支持，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提供政治支持。

## 2. 市场制度得以确立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关键是竞争

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发挥作用是一个复杂过程。改革派建立市场制度的长期目标是改善经济效率，但从机会主义的角度看，议事日程和转型政策存在显著的政治目

---

① 转引自[美]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② [美]亚当·普沃斯基著：《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包雅钧、刘忠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的，那就是要确保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为此目的，如何在市场化转型的政策组合和次序安排中实现上述双重目的，成为民主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关键决定因素。

仅从市场制度本身看，如前所述，其发挥作用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自由竞争和自由定价体系，基于产权清晰的激励约束体系，提供稳定预期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为此目的，以上三个领域的转型政策就成为必须的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政策组合的实践顺序以及推出政策的客观环境会对政策效果产生决定性影响。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后果就说明了这一点。

首先，就自由化与私有化的次序看，界定清晰的产权制度结构是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市场经济的核心精神是竞争而不是私有制。俄罗斯“休克疗法”中的私有化措施的出发点是导出一个私法关系意义上界定清晰的产权结构，却并没有导出竞争的局面。相反，在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下来的高度垄断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前，私有化只是把过去的国家垄断换成了私人垄断。

其次，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要实现帕累托效率，必须具备竞争和私有制这两个条件（这是实现有效财富创造所不可缺少的两个条件）。很显然，如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能够同时让两个条件都具备，那将是最佳选择。然而，如果现实情况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兼得，而是只能暂时“二择其一”，那么，我们将如何选择呢？

从俄罗斯的例子来看，面对价格自由化后的通货膨胀局面和稳定经济的任务，应该优先予以考虑的是在经济中引入竞争，以便恢复供给，同时采取适当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抑制过度的社会需求，使经济恢复平衡，而不是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因为就当时俄罗斯在私有化工作方面的准备而言，它既没有对国有资产进行严格的价值评定，也没有一套公正可行的私有化执行程序，更缺乏私有化所需要的资金（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资金不足，外部资本进入受到限制或没有进入俄罗斯的激励）。事实上，国有资产的确很快大部分转到了私人手中，但并没有很快提高这些资产的使用效率。因为，“将国家资产简单地送出是件挺容易的事，特别是送给自己的朋友和亲戚。这样做的激励机制很强，特别是如果实行私有化的政客们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竞选献金的形式得到回扣。”<sup>①</sup>他们本来期望，即使一开始得到这些资产的人不能有效使用这些资产，随后市场力量也会把这些已经属于私人的资源配置给那些更有效使用它的人。但俄罗斯的二级市场是如此弱小，而且被操纵在少数与官僚关系密切的能够获得发钞许可证的垄断力量手中，这些期望也就无法实现了。

俄罗斯转型的推动者忽略了转轨过程中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细节问题，这导致转

---

① 斯蒂格利茨：“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经济管理文摘》，2002年第2期。

轨措施的设计和执行在许多方面流于形式。在过程中追求形式上的“最优”却没有很快改变经济竞争的状况，导致了经济形势恶化。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后果及其后来的政策调整说明，一些看似次优的安排，如果能够促进市场制度子系统之间的契合，并使市场制度发挥作用，那才是政策组合的“最优”。

## 简要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政治民主化为经济转型打开空间，并决定着转型的方向和边界。反过来，经济转型的深化和发展一方面为政治转型提供基础和合法性解释，另一方面也要求政治制度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因此，转型的总体效果将取决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转型的相互配合。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的整体推进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制度转型的角度看，政治和经济的整体转型是从制度结构的稳态均衡到制度系统的动态均衡的转变。动态均衡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因此需要在方案设计上考虑到各领域政策相互配合的问题。

第二，经济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存在低水平均衡与良性互动两种可能。必须防止转型推进过程中利益集团对转型的阻碍，以防转型落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这些利益集团涉及到旧的集权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也涉及到转型过程中新产生的利益集团。旧的利益集团的反扑一般会被重视。实际上，更可怕的是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利益集团，它们有可能用自己获得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胁迫转型陷入低水平均衡。

第三，社会冲突的利益表达与政治制度的安全阀作用。转型进程中的剧烈结构转换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的相对社会地位的调整，并伴随着新的社会矛盾的产生。因此，新的经济制度在促进效率的同时，也必须保障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新的政治制度则必须发挥安全阀的作用。在新的制度体系中，社会冲突的利益基础应该得到有效协调。

第四，就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先后顺序而言，至少有三种选择：同时进行、政治转型先行和经济转型先行。哪种次序最终被选择，这取决于各转型国家自身的条件。从理论上讲，渐进的制度调整可能更符合系统演进的要求，但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可能并不存在这样的条件。由此，基于各自的条件，选择不同顺序的可行性与缺点是相互依存的。比如在有些国家，经济转型没有发生逆转的原因可能仅仅是政治民主化转型滞后保留了强政府，它防止了转型逆转。但政治制度转型滞后不会成为经济转型进一步深化的障碍，显然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就目前来看，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转型的良好配合还不能说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同时被引进，原因仅仅在于它们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由于危机和经济转型的影响，民主体制只能在牺牲其某些本质特性的情况下才能稳定下来。相应地，经济转型只能在牺牲其速度和激进性的情况下才能保持其可行性，而其许多不完善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变革的民主体制框架所致。经济与政治体制达成一种均衡状态，事实上存在着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的差异。<sup>①</sup>

---

**【Abstract】** With retrospect of the path in the transition of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IS, it is found that the pattern and path of transition are subjected to constrained conditions of the transition, among which, the check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top the complicated ones. Provided the intricate constrained conditions, the political space of transition is limited. The basic direction and evolution track are commonly ruled by the transition objective, strategy selection and order arrangement of the transition, which are mutually checked.

**【Key Words】** transition, policy space, strategy selection, constrained condition

**【Аннотация】** Делая обзор пут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 странах СНГ, можно заметить, что способы и пут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испытали на себе влияние условий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Среди них особенно сложными являются отношения взаимн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В таких слож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ограничено. Цел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выбор стратегии и механиз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заимно сдержива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а также совместно определяют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и траектории их эволюц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ыбор стратегии, условия ограничения

---

（责任编辑 姜睿）

---

① 贝拉·格雷什科维奇以匈牙利的例子讨论了上面提到的问题，详见贝拉·格雷什科维奇：《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第210-222页。这里的探讨借鉴了贝拉·格雷什科维奇的一些分析。

##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国民心态

庞大鹏\*

**【内容提要】**俄罗斯的复兴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还在于国民心态的进步。开放的、国际化的、健康的国民心态，有利于俄罗斯更好地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俄罗斯现代化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国民心态的现代化。俄罗斯的国民心态必须要拥有广泛而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这样的国民心态才能更好地应对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国民心态 现代化战略 国家形象

**【中图分类号】**K512.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5-0105-(13)

### 一、引言

俄罗斯的复兴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还在于国民心态的进步。开放的、国际化的、健康的国民心态，有利于俄罗斯更好地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俄罗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并提出，新政治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国民心态的现代化。

《俄罗斯，前进！》体现了梅德韦杰夫对于俄罗斯所面临的战略任务的认识，也是他对俄现状与未来的思考，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献。在该文中，梅德韦杰夫认为：“决定俄罗斯命运的不应是原料市场，而是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对我们的历史及未来的认识，我们的才智，对自我的清醒评价，我们的力量，自我的尊严感以及进取心”。有鉴于此，梅德韦杰夫认为，“社会中广泛存在家长式作风。相信所有问题都应由国家解决，也许还依靠别的什么人，但就没有想到要立足自身。一步一步去争取个人的成功，这不是我们民族的习惯。由此出现首创精神和新思想的缺失，问题久拖不决，社会辩论水平低下，尤其是批评性的言论。用沉默来表示同意和支持，

\* 庞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表达反对意见时又经常意气用事，言辞激烈，说话流于表面，缺乏责任意识。”<sup>①</sup>

俄罗斯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梅德韦杰夫的上述表述，反映了他的全面现代化的理念，即既包括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首先是指国民心态的现代化。国民心态的现代化在当代俄罗斯的政治研究中尚属薄弱环节。梅德韦杰夫的官方表述也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论证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在参照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提出一个分析框架，并按照这个研究框架分析俄罗斯的国民心态。俄罗斯的国民心态必须拥有广泛而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这样的国民心态才能更好地应对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俄罗斯的国民心态可以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就共时性而言，俄罗斯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各种要素的流动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引进卓有成效的现代管理模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促进国家崛起，但如果国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现代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固守陈旧心态、缺乏创新意识的国民手中大打折扣。<sup>②</sup>就历时性而言，俄罗斯走在深具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上，当前的国民心态是历史发展脉络的自然反映。心态史学属于法国年鉴学派的重要分支，因而又可以根据年鉴学派代表学者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从三个视角对国民心态进行分析。第一个视角是人与环境关系的心态史，这是一种在长时段内不断重演、反复再现的周期性的历史。第二个视角是根据一个中时段的历史事件感受社会心态的节奏，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心态的研究。第三个视角是短时段中的心态史，是对具体时间段内特定历史事件的直接反映。这三个视角分别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相对应，它揭示的是系统论条件下的整体历史发展。因此，对国民心态的分析应该从结构和事态的心态史开始，这是国民心态赖以发生的基本场所和历史背景。

因此，本文所论述的国民心态，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既有别于现代性、公民身份以及社会心理、社会心态等概念，又与上述概念紧密相联，其基本涵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地理时间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应该从影响俄罗斯人的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制度结构和文化氛围入手，讨论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征。在地理时间

---

①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Россия, вперед!// [http://www.gazeta.ru/comments/2009/09/10\\_a\\_3258568.shtml](http://www.gazeta.ru/comments/2009/09/10_a_3258568.shtml)

② 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意义上的“国民心态”实际上与“国民性”和“民族性格”等概念有很重要的相关。国民性是将国民视为一个较稳定的整体，从与其他国家国民的区别性角度进行概括，因此更注重文化、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因素，而不是从社会心理状态的形成、表达及其与个体之间的心理关系的角度进行概括。<sup>①</sup>

第二，从社会时间意义上讲，“国民心态”的涵义与“社会心态”接近，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感受、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社会心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了解社会心态不仅对于了解社情民意、社会热点以及公众情绪非常重要，而且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崛起的前提。<sup>②</sup>我们认为，对于俄罗斯而言，社会时间意义上的国民心态，主要是指俄罗斯社会对于苏联历史以及苏联解体以来政治转轨的认识与看法。

第三，从个别时间意义上讲，肇始于美国并迅速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俄罗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不仅重创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打击了俄罗斯外交的自信心，也比较彻底地暴露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弊端，从而促使俄罗斯精英与民众全面反思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因此，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俄罗斯的国民心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是个别时间意义研究的体现。而地理时间意义和社会时间意义的国民心态则奠定了俄罗斯国民心态的基础，是俄罗斯复兴背景下国民心态的历史背景和潜在动力。

## 二、俄罗斯国民心态的基本概述

### （一）共时性层面的俄罗斯国民心态

就共时性层面而言，俄罗斯实现国民心态现代化的要求与其他后发展国家是相似的。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全球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变迁与人的变迁之间将形成怎样的关系？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俄罗斯面对现代化进程将做出怎样的应对选择？在社会心理和人格心理方面，俄罗斯人能不能从传统俄罗斯人演变为现代俄罗斯人？而现代俄罗斯人会不会等同于现代世界人？上述这些具有普遍共性的问题要求俄罗斯不断探索，需要从传统社会心理走向现代社会心理，即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宽容，从僵化走向活跃。

社会变迁与人的变迁的关系这一课题早就被纳入西方学者的视野。从1962年起，

---

<sup>①</sup>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sup>②</sup> 王俊秀等：“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fenleisuoyin/fenzhishehuixue/%20shehuixinlixue/2007-05-26/2041.html>

在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实施了较大规模的题为“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研究”的计划。该课题对于个人现代性,尤其是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的个人变化,“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英克尔斯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现代化历程对个人所造成的影响。通过对大量研究资料的分析,他发现,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现代性强的人在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具有十分相似的特征。<sup>①</sup>英克尔斯的核心观点就是,“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这些标准同样适用于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俄罗斯,也是俄罗斯国民心态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主要特征。

俄罗斯在政治发展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人的现代化以及由此相伴相生的国民心态现代化的重要性,并就此做出了国家战略层面的积极布局。俄罗斯领导层提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发展。普京认为,“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基本目标和必要条件。这在今天和长远的将来都是国家绝对首要的工作。俄罗斯的未来和成就将取决于人们的教育和健康,取决于他们自我完善和发挥聪明才智的诉求。这是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公民的创新行为、每个人的劳动产出,都将决定着俄罗斯的未来。”<sup>②</sup>梅德韦杰夫也指出,“作为一个民族,俄罗斯现在不仅是自由的民族之一,而且已成为负责任的、了解这种社会自由价值的民族。国家的全部社会活动和经济工作的目的应该是,挖掘有责任感的人的创造潜力来发展人力资源。俄罗斯将为人的才干和能力投资,为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投资。现在只有人,才应成为政治发展的主要角色,成为国家投资的主要对象。”<sup>③</sup>

总之,在共时性层面,俄罗斯国民心态的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和所采取的战略部署是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合俄罗斯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所追求的发展目标。

---

① 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 12 个方面: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准备迎接社会的变革;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个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效率;重视生活和工作的有计划性;尊重事实和知识;对人及社会具有可信赖性;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乐于让自己及其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主张非权势和平等相处,追求自由和民主;了解生产及过程。英克尔斯提出的这些特征常常被用来评定人是否现代化的标准。参见杨宜音:“社会变迁与人的变迁:杨国枢等人关于个人现代性研究述评”,<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xlx/P020031028477906095381.PDF>。

②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расширен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О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до 2020 года», 8 февраля 2008г.[http://tours.kremlin.ru/appears/2008/02/08/1542\\_type63374type63378type82634\\_159528.shtml](http://tours.kremlin.ru/appears/2008/02/08/1542_type63374type63378type82634_159528.shtml)

③ Медведев.Только дееспособная и успешная власть может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ой. <http://www.edinros.ru/text.shtml?4/3757,%5Bbruid%5D>

## （二）历时性层面：地理时间意义上的俄罗斯国民心态

在俄罗斯最高领导层看来，珍视俄罗斯传统的价值观，同时又要实现国民心态的现代化，是复兴俄罗斯必须统筹考虑的根本问题。俄罗斯在重视传统文化对于复兴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既尊重又取舍借鉴的国民心态。“基本文化模式在世界不同地区又比基本政治结构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文化沉淀物——文化传统，具有比政治结构更大的稳定性，成为影响历史动向的潜在深层结构。”<sup>①</sup>地理时间意义上的国民心态，体现在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上。事实上，反思俄罗斯历史，探寻俄罗斯文化，对于理解俄罗斯的发展与崛起十分必要。因为过去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有许多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俄罗斯的自身状态决定的，将来也是如此。<sup>②</sup>

如果没有价值观，任何一个自尊的国家都无法生存，更何况俄罗斯这样的对国际社会担负着历史所赋予的作用和责任的重要国家。主要问题是，如何让俄罗斯的民族传统与一整套基本的民主价值观相融合。一方面，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传统，恢复了本国文化的价值。正是这些使民族的东西得到认同，它们也是整个世界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俄罗斯已经有了自身很有价值的东西。建立公正的国家，发展强有力的公民社会，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也是一种基础。围绕这种基础可以形成关于民族思想的观念。<sup>③</sup>

可见，俄罗斯坚定地认为，只能是建立在自身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国民心态现代化，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

## （三）历时性层面：社会时间意义上的俄罗斯国民心态

就社会时间意义上的国民心态而言，俄罗斯面临着如何调整国民心态，以适应因新旧体制的转型而引起的问题。前文已述，从社会时间意义上讲，“国民心态”的涵义与“社会心态”接近。社会心态是社会不断演进过程中的社会主观精神状态，因其变动不居和现实可感而常常成为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在常见的社会科学表述中，社会心态常常与价值观相提并论，这是因为无论是价值观还是社会心态，都是一个社会共同的精神现象或主观表征，并且广义的社会心态也常常包含了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不过，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有相互区别的一面：前者是一个社会的成员用以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观点，并因此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深蕴性；而后者则是一种弥散而变动的社会心理状态，是价值观赖以形成的一般心理基础。概括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9页。

② [俄]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上卷），杨晖、王大伟等译，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③ Медведев. Только дееспособная и успешная власть может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ой. <http://www.edinros.ru/text.shtml?4/3757,%5Brubrid%5D>

而言，社会心态具备宏观、动态及与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相关联等特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sup>①</sup>在这个层面的俄罗斯国民心态具有以下特点：

价值观念两极分化。约 41% 的被调查者认为，家长制更适合于俄罗斯，他们支持社会平等。对政权怀有宗教般的崇敬，对领袖有着很高的期望值，认为他应该严明治国，主持公道，关心民生。这些人被称为“传统派”。另有约 26% 的受访者信奉个人至上原则，具有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希望社会尊重个人自由及发展。此类人被视为“现代派”。余下近三分之一的民众属于过渡阶层，但其中大多数人的想法跟传统派更为接近。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全盘否定相比，人们对苏联和苏共的认识更趋理性化。认为经历苏联解体是人生悲剧的俄罗斯人的数量有所增加。他们感到失落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变革造成了原有理想支柱的轰然崩塌。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因私有化改革而受益，但却觉得压力重重。如果说在 1998 年的民调中，怀旧思潮开始初露端倪，那么现在这种情绪得到了进一步的蔓延。

认可国家资本主义。仅有 25% 的俄罗斯人愿意生活在自由社会中，而 54% 的人选择了平等社会。主张社会平等的大多数是“传统派”。他们对法制国家的概念相对模糊。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优秀的领导人比完备的法律更重要。他们坚信国家会捍卫民众利益，期望通过强权来保障人身安全，而不是获得民主。不少人是共产主义信念的拥护者，或是希望俄罗斯走自由发展之路。“传统派”中，仅有 25% 的人对市场经济持肯定态度，38.4% 的人拥护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不足 50% 的人认为企业家是推动俄罗斯发展的新兴力量。在众多俄罗斯人心中，理想的经济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无论年龄、世界观、居住地、职业和教育水平的差异有多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是习惯于国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模式。

报国意识趋于淡漠。在怀念昔日大国荣耀的同时，祖国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却日益动摇。一方面，俄罗斯人固守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对国家的认识更趋理性。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应当居住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哪怕是异国他乡。这一观点在当代俄罗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认为人只能有一个祖国，应当以国家为重的观念正在悄然弱化。82% 的年轻人将个人发展置于为国效力之上。<sup>②</sup>

从上述社会调查可以看出，虽然俄罗斯政府在政策上以对外开放为导向，尽量

---

① 周晓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 年夏季卷。

② 此处调查结果参见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研究所与艾伯特基金会联合推出的“今日俄罗斯公民：自我意识及社会理想”报告。该报告以 1994-2004 年间进行的数次大型民调为基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Кем мы себя ощущаем и в ка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хотели бы жить? [http:// www.russia-today. ru/2005 / no\\_01/01\\_topic\\_1. htm](http://www.russia-today.ru/2005/no_01/01_topic_1.htm)

在各个方面都与世界接近，但是就社会心态的层面而言，总体上封闭的心态并未有大的改善。而俄罗斯的顺利发展，不仅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转变的基础之上，还需要有社会心态，包括政治文化与心理改变的基础。

俄罗斯公民可能对他们国家制度的运转方式感到不满意，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拒绝民主价值观本身。虽然大多数人仍然对苏联 1991 年解体感到遗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强有力地支持民主准则。同时，俄罗斯人不仅仅是赞成民主这个概念而已，还更加坚决地支持实际上的民主做法。<sup>①</sup>

#### （四）历时性层面：金融危机特殊时间背景下的俄罗斯国民心态

一方面，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俄罗斯重新思考发展道路的选择。只有精英阶层形成历史的和国际的眼光、以及全局的和战略的思维，才能引导国民心态的健康发展。俄罗斯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仅仅只是站在国家真正复兴这条艰难道路的起点上。<sup>②</sup>与此同时，俄罗斯认为自己仍将是独立的力量中心，以东正教为基础，带有自己的文明标记。从一系列数据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俄罗斯属于一流国家。俄罗斯是一个能源大国不是一种发展构想，而是事实，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占全球能源总出口量的 17%。俄罗斯仍是核大国，未来 10 年实际上仍将是航天大国。俄罗斯还是资源大国。俄罗斯的原料资源占世界原料资源的 30%以上。俄罗斯近千年来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处于危机之中，俄罗斯正在实行的现代化，朝着使俄罗斯在社会经济方面也达到世界强国水平的方向前进。<sup>③</sup>

另一方面，紧迫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的程度本来就低，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后，俄罗斯对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警惕心理更加严重。这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边缘徘徊的局面难有改观。俄罗斯经济一体化程度浅，包括与技术链的联系和对生产全过程的参与。俄罗斯出售自然资源和武器与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之间，几乎产生不了什么联系。俄罗斯制成品的出口量不到总出口量的 10%。碳氢化合物和其它自然资源，在俄罗斯的出口和国家收入中占绝对主要的份额。俄罗斯精英往往把全球化与美国化相提并论，常常把它看成是对俄罗斯未来的威胁。俄罗斯对全球化接受程度低，是阻碍它崛起为一个商业和制造业大国的关键原因。

---

① Timothy F.Colton and Micheal Mcfall, "America's real Russian allies",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1,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864>

②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6 апреля 2007г. [http://tours.kremlin.ru/appears/2007/04/26/1156\\_type63372type63374type82634\\_125339.shtml](http://tours.kremlin.ru/appears/2007/04/26/1156_type63372type63374type82634_125339.shtml)

③ Вячеслав Никон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новые реальности//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8, Август 2009г



俄罗斯抵制一体化使其难以克服对资源的依赖。<sup>①</sup>

例如，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战略，首先就需要俄罗斯打破思想的禁锢。俄罗斯需要破除犹豫与观望的态度。俄罗斯对全方位的开发战略持有警惕的心态。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一国的发展在立足于自身力量的同时，也需要利用国际的市场和资源；既要立足于本国实际，又应该有世界眼光和世界胸怀，在本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完成强国富民的战略任务。

正是基于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思考，抓住大危机下的大机遇是俄罗斯当前国民心态的突出特点。在 2009 年的国情咨文中，梅德韦杰夫直截了当地提出：俄罗斯在 21 世纪重新需要全方位的现代化。这也将是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基于民主价值观和民主体制的现代化经历。<sup>②</sup>

### 三、俄罗斯健康国民心态的培养

#### （一）坚持循序渐进发展的心态

创新型经济发展战略是俄罗斯崛起的唯一发展道路。普京团队寄希望于通过创新型经济实现赶超，但赶超不代表冒进。俄罗斯需要培养坚持循序渐进发展的心态，避免速度情结和跳跃思想。

在 2004 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提到，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俄罗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 90 年代初起，俄罗斯在发展中走过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打破过去的经济体系，习惯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被打破，出现了尖锐的政治和社会冲突，社会经历了严重困难。第二个阶段是清除旧建筑坍塌的废墟，同时成功地制止了最危险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那些年作出的决定不都具有长远性。更确切地说，联邦政权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应对严重威胁。实际上我们是在不久前才开始走向发展现代化俄罗斯国家的第三阶段，才有可能高速发展，有可能解决大规模的社会性问题。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经验和必要的手段，可以为自己提出真正长期的目标。”<sup>③</sup> 普京并没有具体指出三个阶段的时间划分，但是他指出了三个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而且可以看到，普京认为在其执政的八年内，俄罗斯主要经历了稳定与发展两个阶段。稳定阶段主要是清除俄罗斯发展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实现政治稳定；发展阶段

---

① Harley Balzer, “Eager dragon, wary bear: Why China and Russia have parted way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24,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09/24/opinion/24iht-edbalzar.1.7616634.html?\\_r=1](http://www.nytimes.com/2007/09/24/opinion/24iht-edbalzar.1.7616634.html?_r=1)

②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ноября 2009г.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5979>

③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6 мая 2004г. [http://archive.kremlin.ru/appears/2004/05/26/0003\\_type63372type63374type82634\\_71501.shtml](http://archive.kremlin.ru/appears/2004/05/26/0003_type63372type63374type82634_71501.shtml)

主要是指俄罗斯在社会与经济领域高速发展，实现现代化。发展阶段与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时间点是一致的。

按照普京的设想，俄罗斯在 2004 年后应该是一个社会与经济建设高速和集中发展的时期。为此，普京也通过积极的政治运作和努力，确保了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 2003 年 12 月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 2/3 以上的多数席位，目的就是要顺利出台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展开大规模的社会建设。然而，2004 年 9 月的别斯兰人质事件，暴露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也打乱了普京的战略部署。随后在乌克兰等一些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让普京团队不得不去关注政权稳定这一首要问题，一系列改革也被迫推迟。普京政权意识到：俄罗斯政治体制还需要继续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俄罗斯社会与经济发展。普京政权不得不继续在政治权力运作完善与提高的问题上深入调整。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是为了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因此，当 2005 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完成的时候，俄罗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发展问题上。不仅如此，普京提出以“主权民主”思想团结俄罗斯民众，集中一切资源谋求发展。2007 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俄罗斯在普京执政的八年中，在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复杂问题的同时，创立了新的发展模式。现在俄罗斯处在国家真正复兴的艰难道路的开始阶段。俄罗斯社会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够更快、更有信心地走过这段艰难的道路。

类似的言论普京在第二任期之初曾经表达过，在其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又再次高调提出，反映了普京像俄罗斯历史上其他领导人一样所具有的速度情结。俄罗斯总是具有一种理想主义，想要全面地和不受羁绊地进行社会与经济发展。这种追求速度的思想同样存在于知识分子阶层。俄罗斯著名政论家特列季亚科夫（В.Т.Третьяков）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时，依然摆脱不了俄罗斯历史上一以贯之的跳跃思想。他认为俄罗斯最终“跳入”西方文明，需要实现最后的跳跃，跳过最近的历史深渊，跳过失去大国地位的深渊。他认为，在方法上应当有一整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措施来实现俄罗斯的战略飞跃。<sup>①</sup>

## （二）统筹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心态

在俄罗斯最高领导层看来，珍视俄罗斯传统的价值观，同时又要实现国民心态的现代化，是崛起的俄罗斯必须统筹考虑的根本问题。

梅德韦杰夫曾经表示，普京八年俄罗斯的政权已经发育成熟，成为主轴支撑着整个国家。但政权并非是权力机构所需，其存在是为了确保公民社会的生机。只有国家发达强大，才能出现强大的公民社会。这两个概念并不矛盾。他相信强大的政

---

<sup>①</sup> Третьяков В. Россия: Последний прыжок в будущее: Тезисы программы для но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траны//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4 Февраля 2000 г.

权和强大的公民社会是不可分割的，需要让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与国家的成长同步。<sup>①</sup>但是，进一步来看，强大的政权与强大的官僚体系并不是一回事。

就社会时间意义上的国民心态而言，俄罗斯面临如何调整国民心态的变化以适应各自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在转型过程中，新体制往往都继承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不仅在于其虚弱的民主制度基础，而且还有那些仍然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残存的意识形态。人们对许多事物抱有很奇怪的两分法观点：多数人准备接受，而且事实上也积极地渴望拥有民主、拥有有保证的公民自由、市场经济、竞争和私人财产安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渴望新政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旧政权所没有履行的承诺。一个根深蒂固的残留物是向政府索取父爱主义的关心，渴望政府保护个人免受转轨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所有冲击。同样残存于人们头脑中的还有平均主义思想情感，它们导致人们对市场经济和私人部门扩大所带来的不平等现象感到痛苦和反感。<sup>②</sup>

在现实的时代条件和深远的历史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既借鉴西方积极的价值取向，又注意本民族的“寻根”，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和谐发展，才能造就俄罗斯的真正崛起。俄罗斯较好地处理了主流政治价值观与国民心态之间的关系。虽然主流政治价值观的内容不一，但是都重视对国民心态的回应与塑造。主流政治价值观本质上体现的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安排和制度的内在约束性，而国民心态则是国民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政治实践和意识的特殊形态。主流政治价值观与国民心态之间基本的学术预设是对国家与社会互动进行宏观考察的框架构建。虽然民众的政治实践和意识与他们自身的日常生活境遇息息相关，但是与国家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指引与约束也有密切关系。

### （三）重视软实力并打造健康国家形象的心态

对于俄罗斯而言，正如梅德韦杰夫所指出的，要学会引起伙伴的注意，吸引他们一道工作。为此要改变自己，放弃偏见和错觉。这指的自然不是单方面让步的政策。优柔寡断和无能为力既无法赢得尊重、得到感谢，也没有好处。幼稚地认为西方是成功的，不会犯错，认为俄罗斯永远不够发达，这种概念是无法接受的、侮辱人的，也是危险的。但是，相互对抗、自我孤立、彼此吹毛求疵、总是心怀不满同样危险。决定俄外交政策的不应是怀旧情绪，而应是俄现代化的长期战略目标。<sup>③</sup>

俄罗斯学者甚至极端地认为：无论是俄罗斯的国家活动，还是业已形成的商业和社会道德准则，俄罗斯没有任何对其他文明国家的公民富有吸引力的东西。俄罗

① Беседа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С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24 января 2008г. [http://www.medvedev2008.ru/live\\_press\\_01\\_24\\_smi.htm](http://www.medvedev2008.ru/live_press_01_24_smi.htm)

② [匈]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03页。

③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Россия, вперед! [http://www.gazeta.ru/comments/2009/09/10\\_a\\_3258568.shtml](http://www.gazeta.ru/comments/2009/09/10_a_3258568.shtml)

斯虽然是一个有着伟大传统文化的国家，精神力量和巨大潜力毋庸置疑，但是俄罗斯必须正视现实，即俄罗斯如何建设软实力，如何摆脱消极的国家形象。<sup>①</sup>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让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对其他国家产生感召力和吸引力，也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问题。<sup>②</sup>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问题，不可能只依靠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组成部分就能提高影响力。需要系统性地解决问题，即从国家政治、国家计划到公民社会、企业、艺术、宗教等各个环节着手解决问题。当今的世界在影响力、思想、市场、智力等领域都有激烈的竞争，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可能导致在其他环节上多年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

俄罗斯建立的垂直政权无法在官僚中反腐败，其经济也逐渐成为其他国家的能源附庸，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俄罗斯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对外政策能力。俄罗斯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品牌和形象。没有这一点，俄罗斯就不可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受人尊敬的和有威望的国家。要想让全世界喜欢和需要俄罗斯，首先需要发展的不是伊斯坎德尔导弹，而是俄罗斯的软实力。因为一个国家受欢迎，就得到了最好的保护。这个形象包含许多内容：从俄罗斯政治家善于令人信服地和吸引人地与世界对话，到强大的俄罗斯艺术；从建立对旅游者有吸引力的基础设施到现代化的医疗和教育体系；从在所有的世界影响力中心都有俄罗斯的展示平台，到有开放的和透明的司法体系。不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将被边缘化。<sup>③</sup>

2010年2月，俄罗斯成立了两个新的外交组织：公共外交援助基金会和国际事务理事会。两组织的任务是改善俄罗斯在西方的形象。公共外交援助基金会负责向非政府组织分配赞助款，促使非政府组织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合作和外交活动。俄罗斯外交部是该基金的成立方，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和自愿捐款。国际事务理事会由外交部、教育和科学部共同发起成立，参与其活动的有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圣彼得堡大学、科学院和俄罗斯和平基金会。该理事会是为了使俄罗斯社会与科研单位更积极地协作，促进在俄罗斯的国际问题研究，更好地培养国际问题专家，建立科研中心和提高那些负责国际和地区合作的人的能力。这两个组织都是为了改善俄罗斯在西方的形象。<sup>④</sup>

---

① Юрий Магаршак. Страна печ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а-Есть л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что-нибудь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е// 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 13 ноября 2009 г

② [美]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实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③ Николай Злобин. Секрет силы//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4 июня 2009 г.

④ Даниил Айзенштадт, Вентиль имени А. М. Горчакова, [http://www.gazeta.ru/politics/2010/02/03\\_a\\_3319613.shtml](http://www.gazeta.ru/politics/2010/02/03_a_3319613.shtml)

2010年4月，梅德韦杰夫在回答“现在的俄罗斯应当是什么样的国家形象？”这一问题时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友好的现代化的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实现技术创新。第二，建设将政治现实和历史结为一体的现代化政治体系。第三，完善法律，为现代化法制体系创造基础。完善司法工作。法官具有最优秀的职业水准，人们信任法院的裁决。这也是俄罗斯新面貌的一部分。第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应当是一个富足安康的国家，可以为人们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sup>①</sup>

#### 四、俄罗斯国民心态发展的特殊性

2011年9月24日，梅德韦杰夫提名普京参选2012年总统大选。梅德韦杰夫对于他为什么决定不参加竞选解释说，普京是最有权威的政治家，他的支持率更高。遵从民意也就意味着尊重社会占多数的民众的选择，而社会多数人选择了普京，也就表明俄罗斯多数民众依然认可普京的主权民主理念及其代表的政治经济体制。

尽管梅德韦杰夫的全面现代化理念深深影响了俄罗斯的政治生态，但是从俄罗斯的国民心态来看，俄罗斯深具强人色彩的政治体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首先，当前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在普京八年需要维护国家统一的特定阶段起到了积极作用。俄民众尤其为重获大国自豪感而认可普京进而支持普京建立的体制。事实上，俄罗斯的这种政治人格化现象对于国民心态的健康发展并不是一个积极因素。其次，从地理的基本要素来看，俄罗斯幅员辽阔加上人口稀少的因素导致它在国家治理上需要集权体制才能更好地集中资源，而建立尽可能大的缓冲区是俄罗斯寻求安全的惯性思维，这使得中央集权变得更加必要。再次，俄罗斯政治转型与石油资源之间存在特殊的联动关系。资源民族主义与民主化之间的反向关系也影响了国民心态的进步。

政治阶层通过强力维持对国内的控制是俄国历史上政治演变的常态，这决定了政治体制发展的路径依赖。当前政治体制的合理性证明了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具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政治转型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民心态的改造与培育也任重道远。实现人的现代化，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基本目标和必要条件。但是，俄罗斯国民对于皇权和权威的崇拜、对国家的依赖由来已久。如何让民众实现自我完善和更好地发挥聪明才智，依然是俄罗斯发展的迫切需要。

虽然梅德韦杰夫提名普京意味着竞选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但是调整与变革将是俄罗斯未来一个时期的基调。基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梅德韦杰夫全面现代化理念对于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冲击和影响，观察未来俄罗斯形势发展的关键是看普京在当

---

<sup>①</sup> Интервью датской радиовещательной корпорации. 26 апреля 2010г,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7559>

选总统后如何调整国家战略以适应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要求，这其中也包括如何实现俄罗斯国民心态的现代化。

综上所述，一个致力于实现现代化战略的俄罗斯也需要国民心态的现代化。俄罗斯必须塑造符合时代要求和国内需要的积极健康的国民心态。这种国民心态必须要拥有广泛而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只有这样，俄罗斯才能更好地应对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俄罗斯国民心态的再思考和再引导是俄罗斯真正崛起的必由之路。

---

**【Abstract】** Russian rejuvenation is embodied not only in the achievement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but also in the progress of national mentality. Open, international, and healthy national mentality benefits Russia of being a real world power.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Russian modernization strategy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mentality. The national mentality of Russia shall embrac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foundation which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and be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nation, time, and openness. Only with this national mentality can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modernization be better met.

**【Key Words】** national mentality, modernization strategy, national image

**【Аннотация】**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России отража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достижениях, но также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 прогресс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менталитета. Открыт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ированный, здоров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енталитет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превращению России в настоящую мировую державу. Россия выдвинула стратегию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одним из основ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етс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менталите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енталитет России должен обладать широкой и глубок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и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ой, научностью,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эпохальностью, открытостью. Только та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енталитет способен лучшим образом отвечать основным требованиям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енталитет, стратеги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образ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从俄罗斯全球战略视角剖析俄哈关系安全模式

郑润宇\*

**【内容提要】**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后苏联空间”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整合分散的“后苏联空间”，最大程度地推动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次区域一体化，是俄罗斯多年来一贯推行的方针政策。在“后苏联空间”中，哈萨克斯坦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俄哈关系构成俄罗斯重塑“后苏联空间”的一个重要环节。俄罗斯追求在世界上“最大行动自由”与哈萨克斯坦确保自身“自主性”的互动过程中，俄哈之间构建出特有的安全模式。通过对俄哈之间存在的三种复杂安全模式进行全面的梳理，同时以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安全模式为参照系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可以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俄哈两国的战略关系，并有助于评估俄哈安全合作的现状及前景，以及这种安全模式对整个欧亚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安全模式 “美国—加拿大”安全模式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1)05-0118-(15)

在俄罗斯全球战略中，“后苏联空间”不仅始终是其拓展大国影响力的重要舞台，也是其推进符合俄罗斯意志的新国际安全秩序的重要试验场。但是，由于俄罗斯自身国力有限，其对“后苏联空间”力量的投入只能是有选择地进行。在“后苏联空间”众多的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始终是俄罗斯长期可靠的战略伙伴。

俄哈战略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整个“后苏联空间”都有重要意义。它既是两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也是两国决策层评估自身国家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内容。俄哈间的安全关系是否可以视为俄罗斯建立新的“俄式”双边及多边安全模式的尝试？我们有必要对其存在及发展的可能性作深入分析与评估。

针对俄哈关系在“后苏联空间”的特殊地位，笔者尝试从两个角度对俄哈间的

\* 郑润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讲师。

安全模式进行解读：梳理俄哈关系中存在的集体安全模式、共同安全模式、合作安全模式这三种复杂交错的安全模式；通过“后苏联空间”中的俄哈关系与“美洲空间”中的“美国—加拿大”关系进行比较，评估俄哈战略合作关系是否会形成一种俄版的美加关系形态。

## 一、从俄罗斯对“安全问题”的思考谈起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在国家利益及国家安全问题上出现了巨大变化。传统安全角色发生新的变化，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针对这种情况，俄罗斯决策层及学术界不断调整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在探索中逐步搭建俄罗斯全球战略架构，寻求通过整合各方资源来实现自己的对外战略目标，最终确保俄罗斯在未来的世界中能实现“最大的行动自由”。

但是，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由于其自身发展的复杂性与不成熟，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各个学派对“安全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俄罗斯“安全问题”本身作为单独的知识领域并未形成，对“安全问题”这个领域的系统研究仍在探索期，对安全问题的概念、领域、方法论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学派。但由于俄罗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不断丰富着新形势下的国际安全知识，这便刺激了俄罗斯学术界对安全问题的研究与反思。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仍存在分歧，但在国际安全模式的性质与规律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共识。在学术认知储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俄罗斯学者与政府的重要决策部门经常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各类型的高水准智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直属于总统及有关部门的智库（如“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等）、重量级专家组成的独立智库（如“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等）、国际著名智库的俄罗斯站点（如“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等）。这些智库的成员往往不仅进行学术研究，同时直接参与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他们经常针对俄罗斯的国际活动提出具体应对性的智力支持，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俄罗斯国家战略思想的形成，以及对内对外国家安全政策的确立。

2008 年俄格冲突的爆发直接促使俄罗斯对自身的安全战略进行重新思考。国家层面原先在车臣战争背景下制定的 2000 年版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环境。为应对新挑战，俄罗斯学者、智库、政治精英很快设计了俄罗斯新的战略安全构想，这就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于 2009 年批准的《2020 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下文简称《2020 安全战略》）。这是俄罗斯政府评估与应对自身“安全问题”的综合性文件，它体现了俄罗斯学术界与决策精英层对俄罗斯安全问题的认知，也展示了俄罗斯应对安全问题的思路 and 手段。结合俄罗斯学者与决



策层对国家安全的共同思考和执行路径，有助于梳理和把握俄罗斯的安全诉求，了解其对外战略布局的执行轨迹。

## 二、“后苏联空间”的战略定位

在俄罗斯全球战略视线中，“后苏联空间”仍然是俄罗斯的重要战略依托。确保对“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影响力，是其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从安全角度来看，“后苏联空间”既是俄罗斯国家外部安全的重要缓冲地带与传统利益区，又是对俄罗斯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外部不稳定区域，诸如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势力等渗入俄罗斯的活动主要存在于这个地带。这个区域的安全与稳定对俄罗斯有着重要意义。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积极开展多边活动，动机不仅仅是希望解决该区域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更主要是希望以此获得并提升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整合分散的“后苏联空间”的力量，最大程度地推动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次区域一体化，是俄罗斯多年来一贯推行的方针政策。俄罗斯在双边层面组建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重要区域组织，在双边层面则有选择地加强与“后苏联空间”中颇有影响力的国家的关系。

然而，“后苏联空间”各国独立 20 年来的发展趋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区域层面的差异加大，“后苏联空间”的完整性已经不复存在。在现实中，“后苏联空间”更大程度上只是由历史遗产、经济联系、相似的政治体制联合起来的国家集合体，作为单独的完整的地缘政治主体正处于消失的过程中。俄罗斯对整个区域缺乏明确的战略性布局 and 安排，没有明确的战略角色定位，完全从俄罗斯的自身利益出发推行区域安全合作，因此显得行动迟缓而问题重重。首先，尽管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其他国家的关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有关安全合作的多边及双边问题也有清晰的规范，但在实际安全合作中，更多的还是以俄罗斯与具体国家的信任关系为主要考量标准；第二，虽然在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中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上海合作组织这两个选项，但俄罗斯明显倾向于前者，而对于更有安全合作潜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则兴趣较低；第三，俄罗斯对外军事援助不再是无条件的，俄罗斯希望通过一种以低投入、低成本的方式维持其在地缘政治中的优势；第四，俄罗斯特别对中亚国家保留下来的苏联时期的军备及相关基础设施表现出兴趣，希望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与这些国家的军事联系，并使俄罗斯的军事存在能顺理成章地驻扎在这些国家。<sup>①</sup>

俄罗斯的国力目前已无法做到对“后苏联空间”各国的全面支持。因此，力量

---

<sup>①</sup> В.Парамонов, А.Строков, О.Столповский.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лити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кономика. <http://www.easttime.ru/reganalitic/1/147.html>

的投放只能是有选择的。俄罗斯权威智库“俄罗斯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在给俄罗斯总统撰写的咨询报告中明确提出：俄罗斯既要重视“后苏联空间”，但又不应把自己的大国角色仅限制在“后苏联空间”。“后苏联空间”不再是俄罗斯无条件的工作对象。“俄罗斯将把与‘后苏联空间’地区国家的关系转到传统的大棒加胡萝卜的国际关系模式上”。因此，也可以这么说，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区域战略设计，正如俄罗斯战略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И·兹瓦杰利斯卡娅（И.Звягельская）所说：“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内并没有完成真正的政治整合与一体化，俄罗斯还不可能对这个区域形成一种明确的战略，目前主要是通过俄罗斯与有关区域国家建立双边关系来实现。”<sup>①</sup>

### 三、俄罗斯对外安全视线下的哈萨克斯坦

在“后苏联空间”中，哈萨克斯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俄哈关系始终是俄罗斯寻求整合“后苏联空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哈萨克斯坦既强化“自主性”建设，又发展与俄罗斯的特殊战略关系。俄哈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哈萨克斯坦的“自主性”建设进程，而且对整个区域的安全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从俄罗斯的全球视野关注俄哈关系，同时结合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视线审视和研究俄哈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20年，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大幅提高。在推进自身现代化进程中，哈具备成为区域综合实力强国的条件。哈萨克斯坦还通过各种战略对话的形式，发挥其在区域及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桥梁作用，并显示出其寻求确立自身为中亚政治核心国的雄心。哈萨克斯坦已经成为“后苏联空间”地区发展的领头羊。哈萨克斯坦能否真正扮演好区域大国的角色，进而通过俄哈之间的合作，形成双引擎带动整个区域发展，一个重要前提是哈萨克斯坦本身的安全环境得到充分的保证。哈萨克斯坦的安全内容，可以从其国内安全与外部安全两方面来观察。

从内部安全层面来看，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经济恢复良好，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政治转型的不彻底性。虽然在法律及政治架构上已经建立起民主体制，但在实际的国家动作中仍然惯性地沿用苏联时期的许多政治动作模式。哈萨克斯坦的政治改革在缓慢中前行，存在诸多问题，并没有达到较为合理的民主政治生态，其发展还有待提升。此外，“后苏联空间”国家因为政治转型不彻底而形成的问题一贯被强调

---

<sup>①</sup> Мария Янов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икто ничего не хочет. Не может. И не будет?.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348>

是内政，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不接受外来的解决方案与干涉。在这个层面，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有一定的共识，即双方都不评价对方涉及政体方面的国内安全问题，更没有明确的行动在这方面促使其改变。

与俄罗斯始终充满不安全感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相反，哈萨克斯坦认为其自身并不面临明显的外部威胁，这可以从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最重要的几份文件中看出，如：1997年在《哈萨克斯坦 2030 战略》<sup>①</sup>中，国家安全被称为“第一号任务”；10 年后的 2007 年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与补充，即《关于进一步落实哈萨克斯坦 2030 战略的有关措施》<sup>②</sup>，文件中明确指出：“在目前和不久的将来，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不会遭遇直接的军事侵略和领土完整的威胁。无论中国、俄罗斯、西方和穆斯林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动机来侵犯我们。”哈萨克斯坦认为，世界正逐渐放弃军事对抗，竞争正从军事转移到政治和经济领域。“我们希望这种趋势将占主导地位，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促进和平与睦邻关系的建立。”此外，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其国家安全的战略要素，哈可以通过能源外交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安全。

但是“在任何自助系统中，单元都对自身的生存感到忧虑，而这种忧虑限制了它们的行动。”<sup>③</sup>哈萨克斯坦的安全危机意识主要来源于自身。哈萨克斯坦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有可能自觉或不情愿地卷入各种地区冲突，“可能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派等不可预知的国家漩涡。”哈萨克斯坦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其成为在贸易和运输上连接欧亚的天然走廊，具备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的巨大优势。但这种特殊的地缘优势，也使其本身可能成为区域不稳定因素的一个中转站，例如毒品、武器、危险物资走私、贩卖人口、有组织犯罪等的输送通道。<sup>④</sup>此外，中亚区域激进主义势力，在往东向俄罗斯境内渗透、往西与阿拉伯激进势力联系、往南与阿富汗激进势力的接触中，哈萨克斯坦也是一个过境的空间。这些都是构成对哈萨克斯坦安全威胁的重要外部隐患。哈萨克斯坦周围安全局势不断出现新的情况，应对这种潜在的危机，更迫切的是需要建立有效的监测系统。因此，哈萨克斯坦在对外政策中将安全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并主动发展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正是在这种需求下，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将安全重点更多地放在建立地区安全结构上。《哈萨克斯坦 2030 纲要》强调与自己的重要邻国俄罗斯加强关系，发

---

① “Strategy Kazakhstan 2030”. <http://www.mod.gov.kz/mod-en/index.php/333>

② О дальнейших мерах по реализаци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до 2030 года. [http://www.akorda.kz/ru/kazakhstan/kazakhstan2030/on\\_further\\_measures\\_on\\_the\\_strategy\\_s\\_implementation](http://www.akorda.kz/ru/kazakhstan/kazakhstan2030/on_further_measures_on_the_strategy_s_implementation)

③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139页。

④ Olga Oliker, “Kazakhstan’s Security Interes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S.-Kazakh Relationship”. [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new/docs/CEF/Quarterly/May\\_2007/Oliker.pdf](http://www.silkroadstudies.org/new/docs/CEF/Quarterly/May_2007/Oliker.pdf)

展与中国的关系，推动中亚一体化进程，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这是其对外构建安全结构的首要层面。与此同时，它也加强与世界主要“工业民主国家”的关系。

正如纳扎尔巴耶夫在 2010 年国情咨文中所强调的，“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方针将以《对外政策构想》为基础，我们将采取积极、务实和平衡的对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国际声望，巩固国家、地区和全球的安全。”<sup>①</sup>正是在这种安全认知背景下，在邻国中寻找一个可靠的盟国，成为哈萨克斯坦长期的外交主题。在“后苏联空间”，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关系极为密切。俄哈之间建立的“牢不可破的团结”的双边战略关系，是两国共同利益的需要。“尽管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在国际政治中有了更多的外交选择，但是俄罗斯对于哈萨克斯坦仍然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sup>②</sup>对于俄罗斯来说，加强对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影响力，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推动俄哈一体化的进程，是维护本国安全和维系俄在独联体势力范围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在保持政治独立性的同时发展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避免成为俄罗斯政治附庸，这是民族独立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在不破坏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与俄罗斯发展更为紧密的联盟关系也符合哈萨克斯坦的战略利益。

#### 四、俄哈之间存在的三种安全模式

俄哈两国关系发展的总体态势缓慢而平稳。随着俄罗斯对“后苏联空间”影响的降低，俄罗斯对加强俄哈关系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俄罗斯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对哈有很强的影响力，但是随着哈萨克斯坦的逐步强大，对俄绝对依赖性正在逐步下降。从哈萨克斯坦的角度来说，尽可能配合俄罗斯的有关战略安排，支持俄罗斯仍然在此区域扮演重要角色，促进在“后苏联空间”中形成俄哈双引擎的局面，以此用低成本提高哈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其对俄关系的基本思路。

在俄罗斯追求在世界上“最大行动自由”与哈萨克斯坦确保自身“自主性”的互动过程中，俄哈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安全模式。在“安全”问题上，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有着不同的声音，但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相较于 2000 年版的纲要，俄罗斯新的战略安全构想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时期对“安全问题”的视角。在新的战略安全构想中，安全问题的核心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它不再关注国际上方方面面的安全问题，而是从自己的实力出发，有选择有重点地

---

① Н.А.Назарбаев, Ов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нов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дъем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Казахстана.[http://portal.mfa.kz/portal/page/portal/mfa/ru/content/reference\\_info/messages/message2010](http://portal.mfa.kz/portal/page/portal/mfa/ru/content/reference_info/messages/message2010)

② 杨雷：《俄哈关系论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第 284 页。

进行布局。俄罗斯学者 А·А·谢尔古宁 (А.А.Сергунин) 在研究俄罗斯对外安全关系时, 着重提到三种模式: 集体安全模式、共同安全模式、合作安全模式。这三种模式也反映在俄哈之间的关系中, 体现了学理思考与现实操作的结合。

### (一) 集体安全 (collective security)

集体安全模式是针对外敌使用武力进行侵略而建立的。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集体安全被认为是针对国家间正式的战争。它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体系, 其中每一个国家都承认其他国家的安全就是所有国家的安全, 他们同意并且愿意对侵略者作出集体反应。按照集体安全理论, 加强联盟力量的途径是聚集更多的国家来参加这个体系。

俄罗斯的帝国模式习惯于运用集体安全来构建一种对外安全结构。这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思想以及俄罗斯传统的政治文化、历史记忆有关。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 总是以地缘边界扩张为主要特征, 从地缘安全角度出发, 在军事上构建“缓冲地带”及“势力范围”, 以此确保自身安全。即使在“后苏联空间”, 俄罗斯及中亚的独联体地区依然习惯于按照这种思路构筑一种集体安全。

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极其重视集安组织在集体安全中的作用, 加大防御纵深, 以空间争取时间, 以此支撑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推行的地缘取向的安全观。但从安全的内容来看, 俄罗斯打破了传统安全观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的限制, 把安全的内容从军事领域扩展到经济、内政、社会、信息、边界、生态和国际等诸多领域, 从而实现了安全内容的综合化。

《2020 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 “依靠建立高新技术和多功能边防综合设施, 特别是与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交界处的边防综合设施, 提高边防的有效性, 特别是俄联邦北极地区、远东和里海方面边防的有效性, 完成确保俄联邦边防安全的任务。”<sup>①</sup>

尤其是在集体安全的军事方面, 俄在中亚“享有更大的软实力”, 目前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替代。以中亚实力最强的哈萨克斯坦为例, 尽管哈萨克斯坦在经济上不断探寻出具有自主性的发展空间, 但在军事上, 哈萨克斯坦的国防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靠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哈武装部队的军事编制、军官培训、武器装备等主要依靠俄罗斯。除了在传统军事安全领域俄罗斯在俄哈集体安全结构中拥有主导性的优势外, 核能及航天等领域 (拜科努尔发射场) 的合作也构成俄哈间集体安全的重要内容。

哈萨克斯坦积极推动集体安全层面开展的战略对话。哈萨克斯坦设计的安全结

---

① “Strategy Kazakhstan 2030”. <http://www.mod.gov.kz/mod-en/index.php/333>.

构是注重集体安全策略，强调与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战略同盟关系，参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框架下的活动。其中哈萨克斯坦全力配合俄罗斯组建具有实战能力的集体安全快速反应部队，就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内容。但这个层面的集体安全模式，目前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作为一个安全共同体，他们都意识到没有直接的外来威胁，但对于涉及成员国内部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以及成员国之间可能存在的安全危机却全然没有行动能力。<sup>①</sup>

## （二）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

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这一概念最早源于欧洲，主要是针对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局面，试图通过增加东西方之间的合作，建立信任措施来缓解由战略核威慑带来的欧洲冲突和紧张局势。瑞典的帕尔梅委员会（Palme Commission）在题为《共同安全：一种生存蓝图》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这一理念并使之概念化：“避免战争，尤其是避免核战争，是一种共同的责任。”帕尔梅委员会报告所提出的共同安全，其实质是与对手一起获得安全，而不是针对对手的安全。因此，共同安全反对威慑原则及其思维方式，认为以“威慑”观念为基础的战略思想和联盟体系会引发循环性的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从而产生更大的不安全。同时，共同安全倡导非刺激性防务和非进攻性防务，也有其积极作用。欧安会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共同安全”强调抛弃零和思维，其核心思想在于这样一种安全信念：真正的安全只可与敌手一起获得；国与国之间的生存与安全是相互依赖的，避免战争尤其是核战争，需要靠各国的共同努力；摒弃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升级和“安全困境”的“威慑”思想。

在推行欧亚一体化理念上，俄哈正是从建立一种共同安全的思路进行的，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俄罗斯强调抛弃原先冷战时期存在的所有机制和架构，建设一套新的欧洲安全游戏规则。在2009年、2010年欧安组织会议上，俄罗斯就提出了“新欧洲安全”的设想。而哈萨克斯坦则选择遵循现有的游戏规则，对秉承共同安全理念的欧安组织给予积极的配合，并寻求通过这个平台，使自身也能实现一种近乎“脱亚入欧”的状态。在与欧洲建立共同安全的过程中，哈萨克斯坦除了支持以共同安全思想为核心理念的欧安组织，还以共同安全为理念在亚洲推动“亚信会”的建立。哈萨克斯坦认为有必要提出欧洲大西洋地区和欧亚大陆安全的不可分割性。纳扎尔巴耶夫明确提出，“柏林墙倒塌以后，柏林，欧洲已经实现团聚。今天我们要拆除欧

---

<sup>①</sup> 在2010年吉尔吉斯内部骚乱中，集安组织完全回避直接干涉，更加显示出集体安全模式在后苏联空间中解决成员国内部问题上的无力。

洲和亚洲之间的墙，并实现真正的欧亚共同安全”<sup>①</sup>。这种完全通过营造共同安全来实现自己安全的思路，在俄罗斯学术界有一定的市场，但俄罗斯的决策层却并不完全认同。2008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新欧洲安全框架”方案，但他想打造俄版新的共同安全架构的提议完全得不到西方的任何积极回应，这就使得俄罗斯高层对这种理念的可行性更加失去了兴趣。

欧洲主流倡导普世民主价值观是共同安全建立的基础，然而俄哈并不认同这一点，他们认为共同安全的前提是国内稳定，“稳定”与“安全”是直接关联的。因此，当共同安全涉及到俄罗斯或哈萨克斯坦国内政治层面时，这种共同安全就无法推进了。

### （三）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

1990年9月，加拿大外长约·克拉克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合作安全”这一具有开创性的理念，即通过合作实现安全。它所主张的是磋商而非对抗，是友好而非威慑，是透明而非秘密，是预防而非纠正，是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合作安全相对于前两种安全模式而言，敌我性、冲突性不是其重要的考虑内容，其基础是平等的参与。

合作安全更综合地考虑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寻求更为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国际问题。合作安全的前提假设不是基于“零和思维”而是“合作”的战略关系，其预期结果是使参与者获得共赢。“合作安全”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新型模式，与其他的安全模式相比，它更具有包容性、渐进性、预防性和灵活性等特点和优点。合作安全设想了一种更为渐进式的发展多边机制的途径。合作安全在安全概念上也更为灵活，既重视传统安全结构的重要性，又认为应使多边主义以较为特别的、非正式的和灵活的过程向前发展，寻求通过制度化的多边主义来构建一种安全环境。因此，这种安全结构对于中小国家更有吸引力。中小国家可以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在互相交叉的利益结合中，确保自身的安全与国家利益的维护。

俄哈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越来越多地尝试采用合作安全的模式。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以及在维护共同经济安全中寻求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努力等。俄哈两国在共同推进有别于西方的欧亚一体化进程中，通过有效的机制及组织来实现合作安全。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安全模式引入了中国因素，对哈萨克斯坦而言，是构建了一种相对平衡的区域格局，推动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平台。

合作安全由于并没有有力的约束机制，更多地显示为一种共同参与的模式。俄

---

<sup>①</sup> Roman Muzalevsky, “Kazakhstan: From Regional Discourse To Global Security—Analysis”. <http://www.eurasiareview.com/kazakhstan-from-regional-discourse-to-global-security-analysis-21032011>

罗斯在这种模式中仅仅充当参与的角色，无法发挥他的绝对优势，因此，俄对此种安全模式就缺乏足够的热情。哈萨克斯坦对通过合作安全寻求一系列国际机制来维护地区安全一直非常积极，并作出了一些尝试。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参与建立国际社会集体安全体系并承担义务，是哈萨克斯坦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哈萨克斯坦寻求在推进战略对话的过程中发挥其地缘优势的潜力，同时促进其他行动者的利益，推进包括欧安组织、上合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间安全的对话与交流，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此外，哈萨克斯坦积极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参与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框架内的部分活动，加强同美国与北约的军事合作。同时，哈萨克斯坦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活动，发展与中国在军事技术和反恐方面的合作。

合作安全只是一种预防机制，不是一种危机处理机制，在应对诸如北高加索至中亚的恐怖主义威胁、打击大规模毒品贸易等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应对能力。特别是在预防机制没有健全起来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危及安全的严重形势，合作安全的协商机制就可能显得很软弱，甚至无能为力。

## 五、俄哈之间安全模式的评估：共性、分歧、希望

俄哈之间存在多重安全模式，未形成一种稳定的运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原有双边合作的一种惯性前进，也体现了俄哈共同在世界变局中寻求自我最安全状态的一种探索。从俄方角度来说，俄哈间的安全模式一定程度上是俄罗斯“全球渗透”的一个新的出发点和重要尝试。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独立智库——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政策项目主任费奥多罗夫（А.В.Федоров）曾撰文提出“全球渗透”（глобальное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е）概念，认为独联体框架下的集体安全模式显然已经过时，独联体的潜能实际上已消耗殆尽，事实上已形成了“文明方式的离婚”。费奥多罗夫认为，俄罗斯需要的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独联体，而是应该通过实际有效的双边关系及协议，来维护俄罗斯在这一区域各个层面的利益<sup>①</sup>，强调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机制的建立，主动地、有重点地向全球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主任Д·特列宁（Д.Тренин）也曾撰文指出“现在俄罗斯对融入西方一体化的欲望大大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希望恢复其全球影响力，至少是一个区域的

---

<sup>①</sup> 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Федоров. Стратеги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оздание нового механизм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лияния России в мире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http://www.ng.ru/ideas/2007-10-31/15\\_strategy.html](http://www.ng.ru/ideas/2007-10-31/15_strategy.html)



核心国家，并假设未来克里姆林宫能再次对抗北约。”<sup>①</sup>由此我们发现，俄罗斯不再把全部重心投放于“后苏联空间”，而且对原有的安全模式缺乏足够的信心，因此在不断探寻一种创新型的安全模式。

在俄哈之间存在的三种安全模式中，俄罗斯较为熟悉的是前两种模式的运作，并且在寻求一种更具突破性的安全架构。相对而言，哈更重视后两者，因为这使得哈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以主人的身份参加。显然，在与俄罗斯关系紧密的集体安全架构中，哈萨克斯坦很难担当主角，而只是一个配合俄罗斯的小伙伴。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出于自身国家安全的需要，更愿意将美国、中国等国引入该区域，从而设置该区域新的游戏规则，但这正是俄罗斯所担忧的。哈萨克斯坦寻求建立的是一种多元的集体安全方式，即通过一定程度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体安全体系，尤其是通过积极参与欧安组织等方式，间接寻求一种既能进入北约安全保护范围、又不开罪于俄罗斯的游离状态。哈萨克斯坦整体上并未面临大的安全威胁，主要依靠俄罗斯主导的联合军事力量来保障国家安全，目前仍然对独联体集安组织有着明显的依赖。

哈萨克斯坦尽可能地在政策层面支持俄罗斯，尤其是在集体安全层面，与俄罗斯在重大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持一致性，促进与俄罗斯建立一种合作安全的模式。哈萨克斯在军事安全上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积极推动者，在军事装备、快速反应部队共建、军事理念等方面与俄罗斯保持一致。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集安组织内军事合作的“双引擎”。而这种军事合作，也是哈萨克斯坦以较小的成本取得俄罗斯信任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共同安全合作领域，虽然俄哈都有热情并且积极参与构建，但具体的侧重点却存在一些差异。共同安全导致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内部的安全态势。相对于集体安全，它不具有防御性、进攻性的特征，共同安全体更多的是解决内部的安全问题。俄罗斯所主张的欧亚区域的共同安全，更强调的是另起炉灶，完全重新建立。但俄罗斯在欧安组织提出的欧洲安全条约并没有人理会。

合作安全模式还适用于对俄哈都有战略意义的能源问题。俄哈都是能源大国，能源安全在两国的国家安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围绕油气的开采和运输，俄哈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维系着传统的共同利益。但是，俄哈同属能源输出大国的身份，必然使得双方存在着在能源领域的竞争与潜在冲突的可能。

能源在俄罗斯国家发展以及维护俄罗斯大国地位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所明确规定的：独联体是俄罗斯国际能源合作的重

---

<sup>①</sup> Dmitri Trenin, "Russia's New Place in NATO". [http://www.carnegie.ru/publications/?fa=40630&zoom\\_highlight=common+security](http://www.carnegie.ru/publications/?fa=40630&zoom_highlight=common+security)

点方向。俄罗斯希望将独联体特别是中亚国家的天然气等能源资源长期、大规模地吸收到自己的燃料能源体系中。<sup>①</sup>俄罗斯在独联体能源活动的重要方向是解决里海问题，包括准备关于里海法律地位问题的公约也是合作的重点方向。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可以看出，能源安全有可能上升为军事问题，俄罗斯特别强调，不排除运用军事力量解决里海与中亚的能源争夺问题。

## 六、假设：俄哈战略关系——俄语世界的“美加关系”

评估俄哈之间的安全模式，如果仅限于“后苏联空间”以及传统的地缘安全逻辑，是很难看出其真正的前景的。但过于关注俄罗斯追求的新的安全秩序，也无法真正认识现实的俄哈安全结构。针对俄哈之间存在的这种变化中的安全模式，笔者尝试对比另一大陆上类似的两个国家的安全模式，即北美的美国—加拿大之间的安全模式，并以此为参照理解俄哈之间安全合作的现状及前景。

美加关系是当代世界上最成功的国际关系范例之一，如果能效法美加的安全模式来经营俄哈安全合作架构，不仅对俄哈两国的安全有益，也会使整个欧亚区域安全更有保障。俄哈之间与美加之间是否存在可比性？笔者认为，在文化根基、价值取向、国家利益、对外关注重点，以及各自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与冲突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可比性。俄哈之间建立一种类似“美加模式”的安全关系是可能的。

加拿大地广人稀，并且由于殖民时期的相似经历，它和美国一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加拿大和美国签署了防卫协议，加拿大的安全由美国来保护，加拿大则主要以发展经济为主，并不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目前，美加两国是盟友关系，但实际上加拿大在军事安全上很大程度依附于美国。俄哈与美加间的可比性就在于，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才第一次真正成为独立的国家，但它与俄罗斯存在着文化相近、地理相近、历史相近、经济联系密切的特点，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美加安全格局的态势。在俄哈国家建设中，由于体制的接近，也具备美加之间诸多国家层面的共性，如政治文化的共性，国家利益评估、对外关注重点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俄哈之间在国家力量上的不对称性，在很多层面非常类似于美加之间的力量对比。

俄哈之间安全合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存在于美加之间。诸如哈对于俄主导的一体化的忧虑，非常类似于加对于美所主导的泛美组织的看法；俄哈所存在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问题，同样也与美加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似点；在俄哈存在直接分歧的里海资源分配的纠结中，美加之间在北极圈的争夺也有相同的态势；而俄哈间

---

<sup>①</sup> 张宁：“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现状”，[http://www.mlz.gov.cn/zljc/201006/t20100604\\_150976.htm](http://www.mlz.gov.cn/zljc/201006/t20100604_150976.htm)

在对诸如格鲁吉亚这种热点问题上的态度，更像是俄版的“古巴问题”上美加之间的分歧。

与美加稳定成熟的安全模式相比，俄哈安全关系存在着明显的不稳定性，比如原有的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失败，以及民族主义和原生态宗教的复兴。因此，虽然政治文化相近，但俄哈间深层的文化差异在拉大，尤其是俄罗斯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复活以及哈萨克斯坦伊斯兰文化的复兴，都影响着两国在深层安全合作中是否能真正同心协力。作为苏联解体后政治转型不彻底的表现，俄哈的威权体制结构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其所受到的复杂的外部影响，而且参与者本身有强大的力量如美国、欧盟、中国等。对俄罗斯而言，在整合“后苏联空间”中，最主要的依靠对象就是哈萨克斯坦；而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国家安全有诸多选项，俄罗斯并不是唯一选项。

相比美加之间的亲密关系，俄哈之间强调的“战略伙伴关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决策者简单的“贴标签”的方式上，更需要拓展和加固他们在国际合作中的空间。俄哈都要防止回避讨论双方间存在的“棘手问题”。

## 七、结论

笔者认为，俄哈间的安全战略关系，是以俄罗斯主导、哈萨克斯坦配合为主要形态。在俄哈安全合作的进程中，俄罗斯强烈依赖传统经验，同时又处在极力追求一种理想安全状态的探索试验阶段。俄哈双边安全合作的内容是俄罗斯推动整个“后苏联空间”安全格局转变的重要一环。俄罗斯把“后苏联空间”作为其恢复大国地位的重要依托，以此为起点来争取在未来世界中最大的行动自由。哈萨克斯坦则在强化自主性建设的过程中，与俄罗斯维持一种既亲密又保持距离的安全关系，在确保独立的前提下，实现自主性的发展。

俄哈之间安全合作的理念随着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不断调整，而在实际的运作中，俄哈间统一的安全构想和行动更多的是一种惯性的前进。在这过程中，俄哈之间的安全模式混合着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多重模式。俄罗斯从国家利益出发，倾向于熟悉的集体安全与共同安全模式。出于多边合作的需要，俄对合作安全也存在一定兴趣，但主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性地参与。从哈萨克斯坦视角来看，其更偏重于合作安全与共同安全模式。哈既配合俄罗斯主导的各种双边及多边区域安全建构设想，又对区域安全新模式主动融入自己的想法。这主要表现在，哈萨克斯坦不断寻求建构一种多重架构的安全体系，探索通过一种多向度的模式促进

合作安全的形成。

俄哈之间这种动态的安全合作模式，随着双方经验的共同积累，以及应对危机过程中逐渐形成有效的机制，将会对欧亚格局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俄哈安全合作的加强，将产生一定的辐射效应，加强松散的“后苏联空间”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力度，并进一步凝聚俄罗斯的持久影响力。随着俄哈间在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具体合作的深入，原先独联体区域安全合作组织的机能将有可能再次被激活。由俄哈牵头，在“后苏联区域”双边及多边层面的具体安全合作的行动能力将大为提升。俄哈在打击恐怖主义、激进主义、贩毒等领域将有可能发挥“区域维和宪兵”的角色，对区域内潜在的不安全热点因素真正实行有效的控制。最后，俄哈之间安全模式的运作，有可能促进“后苏联空间”许多国家，如中亚以费尔干纳为核心的诸多国家建构有效解决安全问题的渠道，从而为整个“后苏联空间”真正的安全稳定创造有利的环境。

---

**【Abstract】** A noticeable group is emerging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of Russia, which is entitled as “the transitional poor” ( compared with the poor before the transition, the group is referred to as “the new poor”), not only specially composed but also in large numbers. The majority of this group comprises the intellectual, civil servants, and key skilled workers, who were of the core group of the middle class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poor resulted in over half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being in pover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form in Russia. The new poor shall be classified as relatively poor or the marginalized poor in light of their social professions and life characteristics.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reflects deep-rooted problems embedded in the system during the Russian transition, among which, a series of structural factors, for instance, the inequality of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widened income disparities between industries, and the shortage of safeguard measures, constitute the main causes of this; meanwhile, some individual factors to poverty, for example, the group itself failing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well also play the roles.

**【Key Words】** Russia, Kazakhstan, security mode, “U.S.-Canada” security mode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сегда занимало и занимает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важное место во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максимальное поощрение суб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интеграции разбросанного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руководящей политикой Росси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роводимой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многих лет.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Казахстан всегда играл важную роль, а российск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ой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ей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оссия стремится к интерактивному процессу «большой свободы действий» в мире и к гарантии Казахстаном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автономии», а также к построению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азахстаном конкретной модел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анализа трёх сложных моделе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азахстаном проводитс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с модель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еверной Америки «США — Канада» в качестве образца, это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лучить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е и глубо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азахстаном, может помочь оценить настояще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 также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этой модел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всё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я, Казахстан, модел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дел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ША — Канада»

---

(责任编辑 韩冬涛)

# 俄罗斯大事记

(2011年7-8月)

## 7月

- 1日 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 (Anatoli Serdiukov) 宣布俄将建立两个北极军事旅的计划。  
俄外交部指责欧洲单方面中止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谈判。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 (Dmitry Medvedev) 责成总理普京 (Vladimir Putin) 起草加速私有化进程的建议。
- 2日 在欠款问题解决后,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命令政府恢复对白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俄国有铁路公司总裁邀请中国参与该公司的私有化进程, 并在其投资 300 亿美元的高铁项目中进行合作。
- 3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向白俄罗斯总统发去贺电, 庆祝白俄罗斯独立日, 并称, 与俄更紧密的关系将有助于白俄罗斯的发展。
- 4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 (Sergei Lavrov) 在索契召开的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会议后表示, 俄和北约无法就反导合作的经济方法达成一致协议。
- 5日 俄总理普京呼吁开展大型研究项目, 以阻止俄罗斯人才外流。
- 6日 国家杜马四个派系一致通过了将杜马代表的门槛要求从达到议会选举总票数的 7%降低到 5%的议案的一读。  
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 (Alexandr Bortnikov) 提议建立国际安全组织, 以便在 2014 年索契冬季奥运会举办之前以及举行期间相互交换可能的恐怖威胁的信息。  
俄军事检察官称, 已对 6 月 3 日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境内起火并爆炸的军火库主管及副手进行刑事立案。  
白俄罗斯总理米亚斯尼科维奇 (Mikhail Miasnikovich) 宣布了与俄达成的协议, 白俄罗斯将向俄借款, 在格罗德诺 (Grodno) 地区建造耗资总额约为 93 亿美元的核电站。
- 7日 在埃里温 (Yerevan) 举行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STO) 合作委员会禁毒会议上, 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同意三国的特种部队将联合开展禁毒斗争。  
俄司法部门解除对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 (Boris Nemtsov) 和米洛夫 (Vladimir Milov) 的旅行禁令。
- 8日 俄总理普京称, 俄石油产量持续增长, 今年可能增长 1%。
- 9日 南苏丹宣布独立后,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向该国总统基尔 (Salva Kiir Mayardit) 发去贺电。
- 10日 从博尔加尔驶往喀山的保加利亚号游轮在俄伏尔加河沉没。
- 11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批准了一套简化俄白哈关税同盟国家移民居留手续的协议。
- 12日 俄总理普京表示, 组建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旨在建立世界经济的新极地。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 俄罗斯与美国近期将签署一份签证协议, 并认为俄美之间实行免签证制度是“实际的目标”。
- 13日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会晤后宣布, 俄美将继续就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进行对话。
- 14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俄联邦内河水上交通法典》修订案。新法允许悬挂外国国旗的船只在俄境内的水道航行。  
俄总理普京在对外经济银行监事会会议上表示, 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发展基金会在 2015 年前将拨出至少 700 亿卢布为各种项目融资。
- 16日 俄气 (Gazprom) 同德国最大的电力公司 RWE 公司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家公司表示,

将开始谈判成立合资公司的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总理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ev）致信俄罗斯总理普京，希望其考虑恢复高辛烷石油的供应。

- 18日 俄联邦安全局（FSB）称，该机构挫败了一起阴谋对莫斯科地区实施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计划，并拘留了一组四名来自北高加索的武装分子。
- 19日 俄中央选举委员会称，由于国际机构已是不可信任的观察员，其将自己监督国家杜马的选举。
- 20日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加入了普京领导的全俄人民阵线。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关于国家调节酒类产品生产与销售的联邦法律，啤酒被列入酒类，将被禁止在售货亭和摊位销售。
- 21日 俄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将俄罗斯总统选举日定为2012年3月4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律，违反能源安全规则的行为将受到行政和刑事双重处罚。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修改税法的联邦法律。根据法令，对于黑海和鄂霍次克海大陆架累计开采量分别在2000万吨和3000万吨的油田、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境内的油田，以及最初可采储量低于500万吨的油田，将免征自然资源开采税。
- 22日 俄媒体大亨列别杰夫（Alexandr Lebedev）将其节目献给其刚加入的全俄人民阵线。
- 23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就政治狂热分子枪击青年人事件向挪威方面致慰问电。
- 25日 俄大使馆宣布，由于休假期间谈判官员缺席，将与白俄罗斯天然气运行商的谈判推迟到秋天。
- 26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赞成在国内广泛推广调解程序，以便减轻司法系统负担并提高司法效率。  
他还表示，由于俄罗斯司法制度不断完善，俄罗斯的投资环境也在改善。
- 27日 俄政府总理普京在国防采购工作会议上表示，俄今年国防采购额将达7500亿卢布，是2010年的1.5倍。
- 28日 俄首富利辛（Vladimir Lisin）接替副总理谢钦（Igor Sechin）成为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公司董事会主席。  
俄总理普京在与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Barroso）电话交谈时，讨论了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并指出要加紧谈判进程。
- 29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近期还将从内务机关解雇和解职4.8万人，内务部整个改革过程计划裁员22.69万人。

## 8月

- 1日 俄外交部表示，国际社会应制止在叙利亚针对平民和政府部门代表动用武力的行为。
- 2日 俄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Arkady Dvorkovich）透露，叶卡捷琳堡市将申办2020年世界博览会。
- 3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命令，任命7名总统驻联邦区副全权代表以及一名驻中央联邦区全权代表助理为投资代表。  
俄总理普京呼吁向包括北高加索青年在内的年轻人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参加12月份的选举并进入下届国家杜马。
- 4日 俄总统助理德沃尔科维奇表示，总统已经批准了政府有关扩大私有化计划的建议。俄政府将扩大私有化计划，彻底放弃13家国有公司。  
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Anatoly Serdyukov）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
- 5日 克里姆林宫新闻局发布消息称，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电话交谈中详细讨论了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进程的情况。双方都认为，俄可以在年底前入世。
- 8日 俄全面取消进口欧盟国家蔬菜的禁令。

- 9日 俄与韩国海上边防军联合演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彼得大帝湾展开。此次演习的主要内容是向海上遇险船只提供援助，以及搜索和拦截违规船只。
- 10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中东局势调解问题上的立场，即巴勒斯坦谋求加入联合国并非其与以色列和谈的替代性选择。
- 11日 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应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邀请，到索契对俄进行工作访问。  
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正在完成总理普京有关保证市场流动性的要求：财政部准备向银行提供 1600 亿卢布的预算资金。
- 12日 俄方表示不接受乌克兰以“3+1”形式（以非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乌克兰只能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加入关税同盟。
- 15日 俄与白俄罗斯联盟国家部长理事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俄总理普京在会议结束后透露，俄自 2012 年起对白俄罗斯供气的价格将会递减。
- 16日 俄航天署署长波波夫金与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总裁殷礼明举行工作会晤，讨论包括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建通讯卫星系统在内的俄中两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计划。
- 17日 第十届俄国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MAKS-2011）在莫斯科近郊开幕，俄第五代战斗机（T-50）首次亮相。俄总理普京在开幕式上表示，俄政府将继续支持俄航空航天综合体的发展，这是国家的战略优先方向。
- 18日 俄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高技术通讯卫星“Express-AM4”，但之后该卫星失去联系，可能已经丢失。
- 19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会见达吉斯坦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萨拉姆·穆罕默多夫（Magomedshalam Magomedov）。梅德韦杰夫在会晤中表示，达吉斯坦需继续同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作斗争。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Sergei Sobyannin）承诺，将进一步裁减莫斯科市政府官员。
- 20日 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开始访俄之旅。
- 22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举行工作会晤。
- 23日 俄气的出口量增幅大减，7月份的出口量同比增长了 14%，而 8月份的增幅却只有 7%。  
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副主席刘延东时表示，俄总理普京将于 2011 年 10 月份访问中国。
- 24日 俄与南苏丹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乌克兰应当无条件履行俄乌天然气协议，同时乌克兰可以效仿白俄罗斯，在统一经济空间的条件下提出降低天然气价格的要求。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会晤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双方就制定对韩输气管道铺设方案达成一致。金正日还向梅德韦杰夫表示，朝鲜已做好无条件重返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准备。
- 26日 俄总理普京签署命令，要求自 10 月 1 日起实行新的“60—66”石油行业征税制度。
- 29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命令，确定 12 月 4 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
- 30日 俄经济发展部预测，今年俄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均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俄已经连续两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而今年俄天然气的开采量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根据经济发展部的最新预测，今年天然气产量将达到 6710 亿立方米，比去年增长 3.4%，比历史最高的 2008 年（6650 亿立方米）增加 1%。

（胡彦辑）



#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1年第5期

(总第171期)

##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致本刊读者与作者

《俄罗斯研究》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读者和作者的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正是由于这种关心和支持,十几年来,《俄罗斯研究》获得了坚实的进步与发展。编辑部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年来,在世界形势发生广泛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这对我们办好刊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本着办刊宗旨,《俄罗斯研究》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际形势和俄罗斯问题的各方面人士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作为核心学术期刊,《俄罗斯研究》将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体现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和水平的重要平台之一,为推进我国的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外,为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俄罗斯研究》还将把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作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与我国俄罗斯问题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适应,《俄罗斯研究》除了继续关注重点放在俄罗斯现状以外,还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栏目设置也将更加多元。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各方面学者专家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工作,不吝赐稿。

《俄罗斯研究》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继续对本刊提供批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赐稿者如需了解本刊的有关规范,请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mailto: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http://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http://www.qikan.com.cn)

· 公开发行 ·

定价: 12.00 元